

# 近东危机 与柏林会议

The Eastern Crisis  
and the Congress of Berlin

朱瀛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

# 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

朱瀛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南京

035199

(苏)新登字 011 号

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

朱瀛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地质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80 千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305-02874-6/K·202

定价:10.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 前 言

1878年柏林会议作为19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欧洲大国会议曾引起外交史家广泛的研究兴趣,不仅因为它对国际政治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是由于想获得如何认识和处理复杂外交事务的借鉴。然而对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政治和东方问题的理解,与其从柏林会议上去寻找,不如从导致这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去探究。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自然成了被关注的课题。在这些研究中,能够毕其功而有建树的为数不多,B·H·萨姆纳、G·H·鲁普、R·W·赛顿-沃森等人的著作都是在一国政策或双边关系方面确立了在研究东方问题上的学术价值。但他们的著作存在着一个为其研究角度所决定的局限性,以致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近东危机所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多维结构,只限于某国政策或某组双边关系的研究,并不能获得对危机发展的整体性的认识,反过来也很难做到科学地估价和确定它们在所处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及其对整个事件发展的影响。柏林会议起因问题研究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有关国际体系在东方问题引起的危机中的一种动态的演变过程,因而问题往往只有放到结构关系的层次上思考才能得到较为适当的解决。在对柏林会议成因过程的探讨中,本书揭示的近东与欧洲两个大国关系结构之间的那种交互作用的联系,不仅在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依靠物质技术进步打破了地域的和心理的樊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

都卷到文明中来”的时代是如此,而且对于理解此后乃至当今国际政治的变化发展具有积极的认识论上的普遍意义。

近年来在美国出版问世的大型文件集《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简称)有关部分对于了解圣斯蒂法诺条约前的英国政策和大国关系很有价值。《德国文件》(简称)和《英国蓝皮书》仍然不失为是考察这次危机的有用材料,但后者使用时必须谨慎,有些文件作了关键性的删节。俄国方面材料的缺如已为R·W·赛顿-沃森的收集工作所弥补,他的《俄英关系文件》(简称)辑自俄国驻英使馆的档案,陆续自本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在《斯拉夫评论》上发表,C·杰拉维奇和B·杰拉维奇合编的《俄国在东方》中也集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信件。此外,E·赫茨尔特编的《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关于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的文件性传记都是本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文中涉及巴尔干领土变动的内容可参照《对照图》。

本书研究课题为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和博士点基金项目。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文史资料部、克莱蒙大学霍诺尔顿图书馆及有关工作人员,曾给作者在材料搜集方面提供了很大便利和帮助,谨此致谢。这里应特别提到王绳祖教授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宝贵的指导。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史是绳师学术造诣最深的领域,此课题也即我在师从先生时博士论文的选题。正是在先生的教诲、熏陶和不懈的鼓励下,作者才有可能走出被历来研究者视为艰途的东方问题的迷宫。他生前很希望看到本书的出版,惜未能如愿。有感于此,故略记片言,以铭对这位国际关系史学术界一代宗师的纪念。本书出版得到南京大学出版社和有关同志的大力协助,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b>第一章 对历史背景的一种整体性分析</b> | (1)   |
| 一、欧洲外交格局与三皇联盟            | (1)   |
| 二、奥斯曼帝国与克里米亚保护体制的解体      | (17)  |
| <b>第二章 近东危机第一年</b>       | (28)  |
| 一、波、黑两省起义和安德拉西照会         | (28)  |
| 二、从柏林备忘录到赖希施塔特协定         | (43)  |
| <b>第三章 战争还是和平</b>        | (58)  |
| 一、重建欧洲协调的努力              | (58)  |
| 二、君士坦丁堡会议、布达佩斯条约及其他      | (75)  |
| <b>第四章 俄土战争</b>          | (96)  |
| 一、“小和平”计划的失败和英奥谅解谈判      | (96)  |
| 二、阿德里安堡停战协定              | (112) |
| <b>第五章 被扰乱的平衡</b>        | (125) |
| 一、海峡危机和俄奥德三方会谈           | (125) |
| 二、圣斯蒂法诺预备条约              | (135) |

|                               |       |
|-------------------------------|-------|
| <b>第六章 冲突与妥协的十字路口</b> .....   | (148) |
| 一、英俄协定与英土塞浦路斯条约 .....         | (148) |
| 二、英奥协定和三皇联盟 .....             | (168) |
| <b>第七章 大结局：柏林会议</b> .....     | (184) |
| <br>                          |       |
| <b>本书参考书目</b> .....           | (205) |
| <b>人名译名对照表</b> .....          | (213) |
| <b>柏林条约、圣斯蒂法诺条约巴尔干领土变化对照图</b> |       |

# 第一章 对历史背景的一种整体性分析

## 一、欧洲外交格局与三皇联盟

战争常常产生未可预期的结果。人们在认识到时往往已经太迟而无法改铸既成的事实了。

1870—1871年普法战争给欧洲带来的明显结果，一方面是法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后争霸优势的旁落，另一方面是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从欧洲均势结构变化的角度看，这里不仅有一个大国优势的沉浮和移位的问题，还有一个那些处于“中介”状态的弱小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对大国关系影响的问题。普鲁士之在战争过程中兼并南德诸国，固然使大国在力量分配方面引起了新的变动，同时也使大国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某种相互制约和调节的缓冲因素。<sup>①</sup>这进一步表明：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中欧权力结构的安排已不复存在。过去德意志世界由于奥普并立、邦国纷争造成了力量内耗，无法形成对外部的威胁。普法战争以后情况全然不同。统一的

---

<sup>①</sup> P·W·施罗德：《失却了的中介国家：1870年对欧洲体系的影响》，见《国际史评论》，第6卷，第1期（1984.2），第1—27页。（P. W. Schroeder, *The Lost Intermediaries, The Impact of 1870 on the European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德意志帝国在人力资源、军事能力、工业发展潜力诸方面都在欧洲占有相对优势的地位，它因具有足够的力量形成对邻国的实际威胁而变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活跃性因素；与此同时，欧洲大国关系也因缓冲因素的减少而增加了导致不稳定的可能性和危险性。<sup>①</sup>

普法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局势的真正“缓和”。1871年5月的法兰克福和约虽没有使战争制度化，欧洲却从此进入了“武装和平”的时期。如果说1871年初凡尔赛预备和约签订前，法国首脑梯也尔为寻求外交支援遍游欧洲京都作秦廷之哭，欧洲各国政府尚能持壁上观的态度，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对德国或其他大国的举动再不能泰然安于事外。德国宰相俾斯麦作过一个比喻，说欧洲大国象挤乘在同一驾马车里的陌生旅客，面面相觑又满怀狐疑地互相戒备着，如有人将手摸向口袋里的手枪，其邻座则已做好了先扣动枪机的准备。<sup>②</sup>因此，理解战后国际局势的关键是：随着德帝国的崛起，欧洲国家对其优势地位和潜在力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忧虑，力图在大国关系中为自己谋取某种安全保证，以防止与德国或其他大国发生分歧和冲突。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战后德国如何消化普法战争的成果，巩固其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呢？俾斯麦虽然以铁血手腕实现了50年代以来的政治目标，经小德意志道路完成了统一大业，但胜利同时给德国造就了它的异己力量。一个是有形的：

<sup>①</sup> G·A·克雷格和A·L·乔治：《实力与谋略》，牛津，1983年版，第36页。（G. A. Craig and A. L.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sup>②</sup> C·J·H·海斯：《唯物主义的一代，1871—1900》，纽约，1941年版，第18页。（C. J. H. Hayes,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1871—1900*）

迟早要报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仇的法国；一个是无形的：对德国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欧洲。均势论者德里奥说俾斯麦合乎逻辑地从“拿破仑第三的弟子变为梅特涅的门徒”是个有见地的判断。<sup>①</sup>对于这位“自上而下”的容克贵族革命家来说，民族主义大纛下的战争政策已不具有吸引力。他一再说明德帝国是“满足”的国家，一方面当是为了安抚惴惴不安的其他列强，另一方面也是承认了一个现实：继续对外扩张不能给德国再带来多少好处，相反会使一切异己力量结成联盟，危及战后欧洲的既成之局。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外交的基本目标除了孤立法国，防止欧洲其他大国与法国结盟以外，很少还能有其他的选择。法国推翻法兰克福和约的裁决，只有在找到其他大国做盟国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否则它未必敢发动，即使敢发动也未必能成功地进行下一次对德战争。但法国利用欧洲均势局面结交盟国，组成反德敌对阵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sup>②</sup> 俾斯麦曾在一份备忘录中说：“这类结盟的恶梦对一位德国大臣而言始终是情理中事。反对我们的同盟是可以在西方大国加上奥国，抑或更可怕的是在俄、奥、法联合的基础上结成。”<sup>③</sup>

俾斯麦对于当时欧洲大国格局的设想，可从德帝国建立

① L·德里奥：《危险的均势》，伦敦，1963年版，第222页。（L.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② 见王铁崖、王绍坊编：《1871—1898年的欧洲国际关系》，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页。

③ 《欧洲各国内阁的重大政策》，柏林，1922年版，第2卷，No. 294。以下简称《德国文件》。（*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之初遐闻欧洲政坛的阿尼姆事件窥见一斑。<sup>①</sup>俾斯麦与阿尼姆(德国首任驻法大使)的争端涉及德国宫廷内部的权力纠纷,但两人在德对外政策方面确有严重的分歧。阿尼姆主张用干涉手段恢复法国帝制,但俾斯麦坚持保存法国共和制。俾斯麦的意图是采取政治隔离的办法,以一个联合起来的王朝欧洲包围一个不稳定的共和制法国,使其成为“孤岛”。俾斯麦1872年在一次上书皇帝的奏文中说:“我们将来的主要危险,系开始于法国再次作为一个可能的和合适的盟国出现在欧洲各国宫廷之时。这在法国目前不稳定和不一致的情况下不是事实。在甘必大或由他主持的任何政权下也将不可能。对一个联合的王朝欧洲来说,巴黎的火山(按:指不稳定的共和政权)一点也不危险,它将自燃自熄……。”<sup>②</sup>

因此,削弱法国的结盟能力,保持与欧洲君主大国的联合,对俾斯麦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在当时英国格拉斯顿内阁对大陆事务抱孤立主义倾向的情况下,关键的问题是处理好德国与奥、俄的关系。德俄之间依然存在着传统的王朝友谊。很大程度由于俄国1868年的“友好承诺”和1870年的“善意中立”,<sup>③</sup>普法战争才可能保障限在两个交战国的局部

① 参见N·里奇:《弗里德里克·冯·霍尔斯特因;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的政治与外交》,英国剑桥,1965年版,第1卷,第73—74页。(N. Rich, *Friedrich Von Holste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Bismarck and William I*)

② G·A·克雷格:《1866—1878年的德国》,牛津,1978年版,第105页。(G. A. Graig, *Germany, 1866—1945*)

③ W·N·梅特利科特和D·K·科文内编:《俾斯麦与欧洲》(文件集),伦敦,1971年版,第67页。W·E·莫斯:《欧洲列强与德国问题》,坎布里奇,1958年版,第306页。(W. N. Medlicott and D. K. Coveney edited, *Bismarck and Europe*. W. E. Mosse, *The European Powers and German Question, 1848—1871*)

范围内进行。也正是因为德国的周旋与支持，俄国才顺利地在其1871年伦敦会议上取消了1856年巴黎条约黑海条款对其主权的限制。德奥关系情况不同，两国君主联系因1866年战争冷却了。萨多瓦战役后俾斯麦坚持没有同意军方要求吞并奥境内日耳曼人居住省份的意见，主要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怕一百万奥地利的日耳曼人的并入影响普鲁士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可在对外政策方面，这不失为是吸引奥匈帝国恢复与德国王朝友谊的一张外交牌。所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施魏尼茨说，奥匈帝国的存在“纯粹应归功于我们的善意，因为我们对保持它的完整感兴趣。按我们的看法，它的完整对于欧洲的均衡甚至比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更为必要。”<sup>①</sup>俄奥关系由于彼此在巴尔干的对立利益而长期不和，但对欧洲大国关系的格局有重要影响，1868年曾因此使俄国站到普鲁士一边、奥国倒向了法国。<sup>②</sup> 俾斯麦并不打算与奥俄任何一国缔结正式同盟，问题是要控制奥俄关系的发展方向。他的目的是利用君主纽带把奥俄两个帝国团结到自己周围，在欧洲造成一个孤立法国、对己有利的均衡局面。可是，欧洲君主大国联合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与奥俄外交出现的变化有关。

奥国外交在普法战争后转上了与德国谋求和解的轨道。这在传统上认为应归功于奥国外交大臣安德拉西这位匈牙利马扎尔人政治家，其实则可以追溯到他的前任博伊斯特时期。从博伊斯特到安德拉西是政策转变的一个过程。由于南德诸

① 引自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牛津，1954年版，第212页。（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② 本书中“奥国”系1866年后奥匈帝国之简称。

国被归并以及法国惨败,奥匈帝国无法利用对它们的影响抗衡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君临德意志的梦想成了泡影。1870年12月博伊斯特对德国表示,不再坚持“与当前重大事件逻辑结果相抵触的布拉格条约规定的正式权利;通过这些事件,德意志领导权已落到普鲁士肩上。”<sup>①</sup>奥国不仅担心德国是否会夺境内日耳曼人居住省份,而且害怕德俄可能在近东巴尔干方面形成联合压力。1871年5月18日博伊斯特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备忘录指出:在报萨多瓦之仇无望的情况下宜与德国重修友好,避其锋锐;期待柏林采取反俄路线不切合实际,拟与圣彼得堡改善关系。<sup>②</sup>此后,奥德两国君主偕其大臣于8、9月间在伊舍尔、萨尔茨堡等地举行会见,大为消除了1866年“兄弟阋墙”战争以来两国之间的对立情绪。

1871年11月安德拉西出任帝国外交大臣。他对外政策的基础是谋求与德国的合作,但又力图使这种合作具有反俄倾向。他对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活动特别敏感,奥匈帝国已不能再在东方忍受一次像在意大利和中欧方面遭到过的沉重打击。故他上台伊始,即向德国和英国建议结成协约,共同维持近东现状,<sup>③</sup>用意当是针对俄国,然而均未得到响应。既然做不到使德俄分离,奥国可能的防患手段就是与俄国政府直接建立起维持巴尔干领土现状的谅解。安德

<sup>①</sup> 引自F·R·布里奇:《从萨多瓦到萨拉热窝》,伦敦,1972年版,第54页。(F. R. Bridge, *From Sadowa to Sarajero*)

<sup>②</sup> 见F·R·布里奇,同上书,第55页。

<sup>③</sup> H·坦佩尔利和L·彭森编:《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文件集),伦敦,1938年版,第343—345页。(H. Temperley and L. Penson, *The Foundation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拉西认为,奥匈帝国本质上是一个不能够从事领土扩张的“防御性国家”;匈牙利之舟“已经超重”,“不管再载上点什么,泥土还是黄金,都将倾复。”<sup>①</sup>因此在奥国对德和解政策的背后包含着复杂的心理:既想通过与德国的联合抑制俄国在巴尔干的野心,又害怕德国夺取奥国领土或德俄结成联盟。于是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俄国达成某种妥协,以改善自己的境遇。

俄国曾利用普法战争机会取消黑海中立化条款而获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成就,但在战后却遇到了一个原来并未充分估计到的问题:俄国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纵横捭阖于普、奥、南德诸国三个政治因素之间,施加对德意志事务的影响。俾斯麦不允俄国在欧洲凌驾德帝国之上,连英国驻德大使拉塞尔也觉察出,德国在战后迅速与奥恢复友谊表明俾斯麦是“想使新生的德帝国从沙皇一贯企图加于普鲁士王国的保护下解放出来”。<sup>②</sup>这引起了俄国老资格的首相哥尔查科夫的敌视情绪,俄国不甘让德国充当欧洲的新主人。然而,德俄传统友谊仍有实际价值。除了在波兰问题上俄德有共同利害外,俄国与其主要对手英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后在中亚和近东处于全面对峙状态,即使从战略观点着眼,俄国也应与德国维持友好以保证其西部边疆的安全。而在近东,俄国可能面对英奥两个对手,此时德国态度的向背就尤其重要。因此俄国在近东需要德国支持与在欧洲需要遏制德国优势,构成它对德政策的一对矛盾因素,经常制约着俄国外交的变化。

<sup>①</sup> A·迈耶道夫:《未刊印文件》,《斯拉夫评论》,第8卷,第22期(1929.6)第404页。(A. Meyendorff, Unprinted Documents, *Slavonic Review*)

<sup>②</sup> W·塔夫斯:《未刊印文件》,《斯拉夫评论》,第8卷,第24期(1930.3),第707页。(W. Taffs, Unprinted Documents, *Slavonic Review*)

现在问题是俄国面对德奥接近的形势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当然，德国身边有一个愤懑的法国存在，对俄国来说是件庆幸的事情，但法国战后政局不稳，力量有限，很难起到一个大国在外交上应有的作用，无法缓解因德奥接近而产生的问题。若德奥关系导致结盟，一则俾斯麦势必加强对欧洲事务的控制力，与俄打交道时将占更多的主动权，二则由于俄奥在巴尔干有严重的分歧，俾斯麦表示要报答俄国过去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的友谊，让俄国去“利用普鲁士在东方的全部影响”，将会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这就可能使俄国在近东危机再起时处于被孤立的困境。因此在哥尔查科夫为首的俄国政府看来，调整对奥政策是明智之举。<sup>①</sup>1871年秋天的德奥君主会晤表明，德俄传统友谊并不能阻止德奥改善关系，俄若继续与奥在巴尔干处于对抗状态，只会促使它加快投靠德国的步伐，不如转而谋求某种妥协以牵制德奥关系的发展。这样，俄国既可不必过分仰承德国的支持，而且还可有于牵制奥匈帝国在那里与英国的合作。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在外交部的一份年度报告中认为，俄国和巴尔干国家在民族、信仰等方面的联系是抗衡奥匈帝国取得过分优势的有利条件，“即使奥国势力有所发展，我们也看不出对东方基督教徒是一种危险，或者对我们的利益和威信构成攻击。”<sup>②</sup>官方俄国的态度是清楚的：只要巴尔干现状不被根本改变，俄奥达成某种妥协是新形势下最少损害俄国利益的可行性政策。所以，正是由于俄国企

①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牛津，1937年版，第87页。（B. H. Sumner, *Russia and the Balkans*, 1870—1880）

② G·H·鲁普：《动摇的友谊》，哈佛，1941年版，第8页。（G. H. Rupp, *A Wavering Friendship, Russia and Austria, 1876—1878*）

图改善它在欧洲因德帝国崛起而感到不利的地位以及保护自己的东方利益不受影响,俄国对奥关系中出现了转机。

上述普法战争后德奥俄三国外交的变化构成了他们通向三皇联盟的复杂背景。1872年至1874年间三国君主频频互访,其中以1872年9月德奥俄三方的柏林会晤和1873年6月俄奥签订的兴勃隆协定最为突出。后者在同年10月经德皇签字加入后成为三皇联盟的基础,标志着欧洲国际关系中一个保守主义政治结构的诞生。然而,重要的是三皇联盟并非是俾斯麦设想的孤立法国那种完整意义上的王朝欧洲的联合。

1872年9月6日—12日德奥俄三国君主在柏林聚会。按理说这是象征王朝欧洲团结的盛会,实际上他们只限于两两单独交换意见,没有产生政治协定,用哥尔查科夫的话说:“没有任何可能限制我们行动自由的正式义务,没有给外交档案留下任何东西。”<sup>①</sup>它原先只是德奥之间的一项双边安排,俄国闻讯后不邀自请,遂成三方会晤。俾斯麦觉得这是一个炫耀柏林地位的好机会,可是他并不能为所欲为,奥国对于德国是否会进攻奥地利日耳曼人居住的省份忧心忡忡,俄国声称“希望有一个强大而谨慎的法国,其未来对欧洲和平具有第一等重要重要性。”因此俾斯麦提出“排除各种具体问题和政治细节的讨论,会晤的原则只是为了维护未来的和平”,他希望“君主们象卡诺瓦三女神那样组成一个友爱集团”,“默默地站在一起”,用意是对法国作无言的警告。<sup>②</sup>然而,不无意义的倒是,

① A·迈耶道夫:《未刊印文件》,《斯拉夫评论》,第8卷,第22期,第401页。

② W·塔夫斯:《未刊印文件》,《斯拉夫评论》,第8卷,第24期,第703—705页。



奥俄两国大臣利用这个场合达成了若干口头谅解。根据哥尔查科夫9月9日致皇上的两份奏折,谅解内容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加里西亚波兰人问题,安德拉西解释了奥国立场,保证不支持波兰民族复兴事业,不允那个地区波兰人进行反俄骚动。二是巴尔干问题,两国均希望保持土耳其现状,答应对土耳其与它的基督教臣民的关系奉行不干涉原则。鉴于奥方对塞尔维亚可能改变巴尔干领土现状的担心,哥尔查科夫表示“塞尔维亚如果采取与现有塞土条约规定不相同的路线,将不会得到俄国的支持”,安德拉西则申明“关于奥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存在野心的说法没有丝毫根据。”<sup>①</sup>这些谅解成了奥俄第二年订立兴勃隆协定的前奏。

在奥俄兴勃隆协定订立前,俄德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插曲:1873年5月6日在威廉一世访问圣彼得堡期间两国军方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它规定缔约一方若遭某一欧洲国家的进攻,另一方应尽快给予二十万军队的援助。其原因俄方多在为准备征服中亚基发汗国作策应,德方多出自对法国局势的关注:法国因提前偿清战争赔款,即将结束被占领状态。然而哥尔查科夫和俾斯麦并不十分赞成军方的安排,坚持严守秘密以免泄露给英国或者法国。实际上这个协定假设的是一种不可能的情况,无论英国或者法国当时均不会成为进攻的一方,当然更谈不上缔约国需要军援一说。第二月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皇帝访问奥国,向奥国提出了内容相同的建议。奥国方面并不知道俄德已有成约,安德拉西推辞说这样的协定与奥国的

<sup>①</sup> A·迈耶道夫:《未刊印文件》,《斯拉夫评论》,第8卷,第22期,第402—408页。

宪法程序不符。奥国一则无意为此引起与俄国的手英国的手的隔阂，二则怕招怨德国，因为欧洲大国中显然只有德国最具备进攻奥国的条件。但是奥俄两国不愿失去签订一个保障自身安全的协定的机会，于是他们撇开军事协定，1873年6月6日在维也纳郊区兴勃隆另外拟定了一个政治协定——兴勃隆协定。而德俄军事协定未扩及奥国，后来也没有生效。

德国方面在同年10月22日加入这个政治协定而结成了三皇联盟，但这个联盟的真正建筑师是奥国的安德拉西与俄国的哥尔查科夫。关于奥俄缔结兴勃隆协定的动机，过去不少研究者如W·兰格、W·A·高尔德认为两国目的是应付近东问题，<sup>①</sup>但结合当时具体情况推敲条约原文，这样的认识似当修正。如果说条约第一款彼此约定磋商“某些特殊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一切扰乱”所指包括近东问题可以说通的话，那末第二款再作如是说就与情理相悖了。其第二款条文如下：“遇有第三大国的侵略危及欧洲的平时，两国皇帝陛下互相约定不寻求或者缔结新的同盟，他们之间将达成一项初步谅解，以便议定他们所应遵循的共同行动的方针。”<sup>②</sup>

约文中“第三大国”指的是谁？环顾欧洲，似非德国莫属；

<sup>①</sup> W·L·兰格：《欧洲的同盟与阵线》，纽约，1931年版，第24页。W·A·高尔德：《三皇联盟与东方问题，1871—1876》，见《英国历史评论》，第40期（1925.10），第207—221页。（W. L. Langer,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W. A. Gauld, *The Dreikaiserbundis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1871—1876,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sup>②</sup> A·F·普里布拉姆编：《奥匈帝国秘密条约集》，哈佛，1921版，第2卷，第184—187页。（A. F. Pribram, *The Secret Treaties of Austria—Hungary, 1871—1914*）

威胁欧洲和平可能性最大的是德法之间的再次冲突。奥俄两国显然希望通过这个协定彼此约束以保证不致使缔约的对方与德国结成联合阵线。他们在近东问题上虽然各自都想能争取到德国的支持,但究竟何等样的支持尚难逆料,如奥国驻德大使卡罗尔依曾估计,假使俄奥在巴尔干半岛发生冲突,“我们通过谈判得到的很难比德国答允‘友好中立’有更深远意义的承诺,反过来作为回报,我们将自然在德法之间发生新的战争的情况下承担同样的义务。”<sup>①</sup>显然,无论奥国还是俄国,都不愿承担这样的义务而被德国牵着鼻子走。因而奥俄协调他们在近东问题上的立场如条约第一款所示是可取的办法,它把1872年9月柏林会晤时两国的口头谅解通过条约形式含蓄地肯定了下来。

由此可见,三皇联盟发轫时是奥俄之间的一项安排,在欧洲方面是防备德国潜在威胁的一种警戒和自卫的手段,在近东方面是日后寻找协调和妥协的根据。德国欢迎并加入兴勃隆协定的原因是明显的,这样的联合符合俾斯麦关于加强王朝欧洲团结孤立法国的设想,同时有利于控制俄奥关系的状况。德国在近东没有多少直接利益,但俄奥关系变得过分亲密或者发生冲突,将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地位。特别是俾斯麦不愿在两者之间作选择而让法国得到一个盟国。奥俄若能在一个德国支配下的三皇联盟内协调彼此在近东的分歧,德国可不受束缚在欧洲均势的天秤上获得好处。然而,三皇联盟毕竟是以奥俄接近开始的松散联合,三方都可接受的共同点仅仅在

<sup>①</sup> 引自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新泽西,1976年版,第116页。(N. D. Bagdasarian, *The Austro-German Reapprochement, 1870-1879*)

维持法兰克福条约下的欧洲现状。因此，三皇联盟只是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国关系处于牵制状态的一种反映，而奥俄保持合作则是这个联盟的基础。

三皇联盟所反映的这种大国关系状况在1875年4月至5月的法德战争危机期间同样体现了出来，欧洲不允许法国再次被削弱而使优势进一步倒向德国一边。法德关系的紧张与俾斯麦在国内外开展的反天主教会斗争扩大化有联系，但实际上所谓在法、比、意、奥等欧洲各地存在着一个国际教权派联合反德的阴谋纯属俾斯麦构想中的神话。在以老毛奇为首的德国军界，多有主张趁法国未完全恢复之际对其进行预防性战争。1874年4月德国国会同意增拨军费并通过了军事预算七年计划。俾斯麦并非有意要再次发动对法战争，但他确在鼓励和使用一种战争恐吓政策，以便震慑住法国。当1875年初法国拟购买一万匹军马以及实行新的军队编制法的消息传出后，俾斯麦以强硬口气谈到，“假如法国按目前规模继续进行准备而且其进攻德国的意图不再有疑问的话，德国政府就明显有责任，在以有力手段制止战争方面采取主动行动。”<sup>①</sup>4月8日柏林《邮报》刊出“战争在望？”一文，指责法国在国际天主教阴谋活动的猖獗支持下准备复仇战争。欧洲其他国家普遍认为法国当时并不存在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因而有理由怀疑：这是否德国发动对法预防性战争的信号？至于法国真的相信德国侵略危险存在与否，这是个留待讨论的问题。历史学家曾从1887年巴黎《费加罗时报》的故纸堆里找出了

<sup>①</sup> W·N·梅特利科特和D·K·科文内编：《俾斯麦与欧洲》（文件集），第90页。

一篇法国驻俄大使莱夫洛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曾在法国总统那里见到过一份文件,谓德国“拟定在九月攻击法国”。该消息的渠道据说来自不久前访问过丹麦宫廷的英国威尔士亲王,而且他亲自得到了德国威廉王子的首肯。<sup>①</sup>不管事情真相如何,现在法国外交部长德卡兹决心呼吁欧洲其他大国共同抵制德国的侵略性政策。恰好此时,刚从俄京返回柏林的俾斯麦特使拉多维兹 4 月 11 日在英使馆宴会上对法国驻德大使冈多-别朗发表了一通不谨慎的谈话,这给德卡兹提供了新的口实。<sup>②</sup>拉多维兹讲到德国上层圈子中流行的想法:如果法国将复仇作为政策的固定目标,德国与其坐待侵略不如将选择进攻的时机留给自己。德卡兹把法驻德大使冈多-别朗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制成复本,分送欧洲各国,目的是在使俄英等国对时局的态度“明朗化”,从而表明法国面临德国威胁时可以保证从欧洲其他国家得到支持。这样,由于德卡兹以其外交伎俩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欧洲局势,这次法德争端具有了欧洲国际争端的性质。

问题既已迫在眉睫,英奥俄等国以不同方式进行干预。英国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政府 1874 年初上台后希望改变

---

① G·F·凯南:《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落》,新泽西,1979年版,第14—15页。(G. F. Kennan,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 1875—1890*)

② 1875年2月俾斯麦亲信拉多维兹曾出使俄京圣彼得堡。此行表面上为解决近年事务方面的一些小磨擦,实际上是谋求两国政治路线的一致性。据俄方档案揭示,拉多维兹在会谈中试图以支持俄国在近东行动自由,来换取它答应不声援法国,俄国没有上钩。(参见B·M·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三联书店,1979年中译本,第2卷,第54—55页,第63页。)在当时欧洲看来,这个不寻常的举动似乎表示俾斯麦在作某种外交准备。

格拉斯顿执政时期回避欧洲事务的形象,但实际上英国外交贯穿始终的传统特点之一是,当欧洲均势被某一霸权政策所危及时,他们至少会在政治上作出反应。这次德法边界两边的紧张状态因俾斯麦在宗教问题上对比利时发出威胁而更令人不安。于是英国照会欧洲各国,要求采取一致立场,用外交手段平息危机。同时英俄两国就中亚地区问题交换了和解性意向。5月9日英国驻德大使拉塞尔奉外交大臣德比之命劝告德国应消除对法国的所谓准备复仇战争的误解,以与俄国即将出面施加压力的行动相配合。<sup>①</sup> 奥国作为一个天主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国家,态度比较暧昧。一方面安德拉西没有公开响应英国建议,害怕德国灰狗正在追逐的野兔由法国引及自身,但另一方面他私下秘密授权哥尔查科夫表达奥国方面“与俄国同样的维持和平的愿望”,让俄国当出头鸟,去摘取维护欧洲已受到德国威胁的和平的桂冠。<sup>②</sup> 显然,这个三皇联盟的成员既想保护自己又不愿德国制服法国的企图得逞。较之英奥,俄国的干预最为强硬。当法国大使莱夫洛请求声援时,沙皇答允法国若有战争危险必先从俄国处得知。5月10日俄国皇帝和首相到柏林访问,使这场危机得以有一个悲喜剧性的结尾。哥尔查科夫几乎是以整个欧洲代表的资格向德方发出诘难,要求澄清鼓噪一时的战争喧嚣,俾斯麦便将责任推诿于法国方面以及报界舆论的错误宣传,否认德国有任何侵略意图。俄国首相离开柏林时致其驻欧洲各国使馆电文给人的印象是,

<sup>①</sup> H·坦佩尔利和L·彭森编:《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文件集),第414—415页。

<sup>②</sup>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173—174页。

俄国已索取到德国的和平保证。危机结束后，俾斯麦回到瓦尔辛的乡间庄园隐居达六个月。尽管俾斯麦对哥尔查科夫深为不满，可德国仍需要三皇联盟。

1875年的法德战争危机是俾斯麦外交的一次大挫折，但实际上并无真正的战争危机存在。历史的荒谬性仿佛是在俾斯麦被谴责他要筹划一场他并没有打算要发动的战争，德国统一及其优势地位给俾斯麦带来的巨大声誉在这里被异化了，然而正是在这种荒谬性的背后掩盖着当时欧洲外交局势的一个基本特征：没有国家愿意欧洲均势继续朝德帝国有利的方向转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感到俾斯麦的表现“恰如欧洲曾不得不联合起来将其按倒的拿破仑一世”<sup>①</sup>，这代表了欧洲普遍对德国怀有的心理状态。

以上说明，普法战争以后三皇联盟这个保守主义政治结构在欧洲大国关系中起着一种互相牵制的作用，俾斯麦借助三皇联盟孤立法国，客观上是受法国不得被进一步削弱这样一个前提的限制的。A·泰勒说“这个联盟设想保持欧洲的和平；事实上它只有在欧洲和平时才能存在”。<sup>②</sup>这番议论不无机智，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讲，在现有三皇联盟的结构下，欧洲西线无战事。1875年法德争端中俾斯麦在欧洲其他大国的压力面前迅速退却即说明了这一点。问题的症结是在欧洲的东方。三皇联盟虽然能维持法兰克福和约后的欧洲均势于牵制状态而不被打破，但是否也能经得起东方问题的痉挛呢？以

<sup>①</sup> G·E·巴克爾編；《維多利亞女王書信集》，倫敦，1926年版，第2集，第2卷，第405—407頁。（G. E. Buckle edit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sup>②</sup> A·J·P·泰勒：《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第221頁。

奥俄谅解为基础的三皇联盟是否具有足够牢固的合作程度呢？况且，在东方起支配作用的并非只是奥俄二国，当近东危机发生时，在那里有着重要利益的英国势必卷入，在这种情况下，三皇联盟的结构是否能够同时包容近东地区大国关系的变化呢？历史活动的轨迹并不服从人们意志的安排。法德战争危机刚刚平息，欧洲边缘巴尔干的地平线上已经积聚起乌云，因奥斯曼帝国衰落而引起的东方问题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

## 二、奥斯曼帝国与克里米亚保护体制的解体

在进入对1875—1878年近东危机的具体讨论前，有必要回顾一下那个地区大国关系结构的状况。

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京城君士坦丁堡座落在那片连接黑海和地中海水域的欧洲一侧，俯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山川地形的汇合经常意味着不同文明的撞击、渗透和交融。而对处于长期衰落过程中的奥斯曼帝国来说，这里无疑是欧洲列强侵略势力竞相扩张的交叉点。帝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曾试图参照西方体例进行改革，但终究不能求得这个帝国的复兴。1839年“花厅诏书”和1856年“帝国诏书”收效甚微，其原因并非只是这些颁布的改革措施常被当作做给外国人看的障眼术，便于防止外来势力的干涉，而主要是帝国内部弊端丛生，积重难返。<sup>①</sup>政治腐败，官吏低能，法纲混乱，军事

<sup>①</sup> R·H·戴维森：《1856—1876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普林斯顿，1963年版，第52—80页。（R. H.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组织落后,财政困顿,再加上复杂的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纠合在一起,使这个庞大的帝国如临深渊。而在外交上衍生出来的有关奥斯曼帝国及其臣民的命运的问题——东方问题,则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政治家所特别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欧洲列强企图利用奥斯曼帝国的衰弱状况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政治影响、战略利益、经济利益、甚至小块领土,另一方面它们无法估计奥斯曼帝国最后崩溃将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因为它们清楚地知道无论谁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拿到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遗产。由于欧洲列强在这个帝国的利益本质上不能相容,东方问题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正如英国近东事务一位外交家曾说的:“尽管人们曾冒险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推测与理论,尽管人们经常确信土耳其已濒崩溃的边缘,但还没有人能对奥斯曼帝国将变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或者对取代它的政治联合体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sup>①</sup>

英、俄、奥是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卷得最深的三个大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到这次危机发生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在近东有着不同的目标,它们的政策也经常受到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势力和集团的影响,可这三大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有共同点。既然这些列强无法就奥斯曼帝国崩溃时如何瓜分其遗产达成一致意见,既然它们无意放弃在近东追逐自己利益的机会,那么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和现状,避免东方问题发生新的危机,也就在习惯上成了一项方便的权宜之计。

在英国,帕默斯顿在克里米亚战争时诉诸武力支持土耳

<sup>①</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第171卷(1863),第41页。(Harsard)

其的政策已遭冷落。格拉斯顿任首相时说,那种政策“现在几乎普遍受到人们的极端蔑视,再一次为土耳其进行武装干涉的想法是荒诞不稽的”。<sup>①</sup>但英国需要利用奥斯曼帝国作为屏障防止俄国势力由海上向东地中海和由陆上向印度扩张的主导思想依旧没变。<sup>②</sup>苏伊士运河通航(1869年)增加了这种需要的重要性。因而英国对土政策的要点是督促土耳其政府实施改革以保持东方的平静,维护1856年巴黎条约与1870年伦敦条约的原则以防止欧洲方面任何大国不应有的干涉。

从俄国方面看,控制君士坦丁堡和确立有利的海峡体制一向是俄国近东政策的重要目标,而它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当时是与这个目标联系在一起的。<sup>③</sup>克里米亚战争给了俄国一个沉痛的教训,俄国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反对一个欧洲大国的联合。60年代起它即在国内进行改革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稳健的“养精蓄锐”的政策。<sup>④</sup>俄国1871年取消巴黎条约黑海中立化条款是通过外交渠道实现的。俄国此时并无黑海舰队,与其开放海峡不如加强对土耳其政府的影响,把它作为海峡对外国战船关闭的守卫。当然俄国内部还存在着一个主张冒险政策的集团,驻土大使伊格纳切夫认为应利用俄国与

<sup>①</sup> 引自 W·E·莫斯:《克里米亚体制的兴起与崩溃》,伦敦,1963年版,第164页。(W. E.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71)

<sup>②</sup> G·D·克莱顿:《英国与东方问题:从梅索朗吉希到加利波利》,伦敦,1971年版,第15—17页。(G. D. Clayton, *Britain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Missolonghi to Gallipoli*)

<sup>③</sup> 查尔斯·杰拉维奇:《沙皇俄国与巴尔干民族主义》,柏克莱,1963年版,第3页。(Charles Jelavich, *Tsarist Russia and Balkan Nationalism*)

<sup>④</sup> 查尔斯·杰拉维奇和巴巴拉·杰拉维奇编:《俄国在东方》,荷兰,1959年版,第44页。(Charles Jelavich and Barbara Jelavich edited,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奥斯曼帝国属地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天然联系”，把斯拉夫人从这个帝国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纳入俄国的轨道。<sup>①</sup>但俄国对土政策的主流仍是倾向维持现状，避免因东方问题引起新的战争而重蹈克里米亚复辙。哥尔查科夫说：“处理东方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全盘推倒重建，二是仅仅给予修补，让事情一古脑儿留给以后的年代处理。谁也不可能希望求得一项彻底的解决方案，谁都只想把事情尽可能地延长”。<sup>②</sup>

至于奥匈帝国方面，它的利益与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巴尔干的状况休戚相关。自60年代下半期奥国被排除出意大利和德意志事务以来，帝国扩张剩下的唯一方向是在东方。在奥国军界，从维也纳伸展到萨洛尼卡包括整个西部巴尔干半岛的大帝国的梦想很有市场。但是奥国政府多数政治家认为，兼并土耳其在巴尔干属地将会导致帝国内部斯拉夫人成分的增加，削弱建立在1867年奥匈协议基础上的政治平衡，这种政策只有在证明土耳其政府已无能力维持巴尔干领土现状时才可考虑采用；而最危险的一种情况是在奥国边境附近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它对帝国内处于骚动不安状态的斯拉夫民族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而动摇奥匈帝国的统治基础。<sup>③</sup>因此肢解奥斯曼帝国潜伏着对同样是由多民族成分组成的奥匈帝国的威胁。而且，奥国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也不适宜这样做，1870年奥国已与

①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73—75页。

② D·哈里斯：《1875—1878年巴尔干危机外交史：第一年》，斯坦福，1939年版，第165页。（D. Harr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Balkan Crisis of 1875—1878, The First year*）

③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185—187页。

法国获得修建一条从君士坦丁堡连接维也纳的铁路的租让权。安德拉西的态度反映了奥国对土耳其的基本立场,他说:“土耳其的存在对奥国几乎是一种天赐神助的安排。它保持小国现状,阻止他们的野心,这明显符合我们的主要利益。假如没有土耳其,那些沉重的义务都将落到我们的头上。”<sup>①</sup>

上述的情况表明,英、俄、奥三国追逐各自的近东利益基于一个立足点:奥斯曼帝国作为交叉重叠的大国关系中的一个缓冲国是列强所可以接受的。只要奥斯曼帝国存在,列强便都能够为自己保留一块地盘;只要东方问题延续下去,列强面前便洞开着各种不同的诱人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竟成了欧洲的一种需要。而奥斯曼帝国则极力利用大国的矛盾,以便在列强争斗的夹缝中求取自己的生存。

现在再来看这个时期东方问题的另一方面。既然欧洲列强认为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缓冲国的地位应长期存在下去,它们就要设法使各有关大国在近东的势力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平衡,任何一方的过分优势将危及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兼而损害它们自己在近东的利益。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条约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随后英奥法三国又在4月15日签订了另一个条约来确认巴黎条约的有效性,并且将奥斯曼帝国置于战后大国体制的保护之下。从这些条约的内容可以看出其目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允许奥斯曼帝国加入欧洲协调,由列强共同保证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土耳其方面则答允实施“帝国诏书”的改革措施。二是阻止俄国在近东

<sup>①</sup>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1875—1878》,伦敦,1939年版,第31页。(M. D. Stojanovic,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lkans*, 1875—1878)

获得优势。黑海中立化、俄国割让南部比萨拉比亚、巴干尔诸公国不再由俄国保护而是在苏丹宗主权的名义下由列强共同保证等条款均着意于此。<sup>①</sup>这是大国列强用欧洲协调的方式处理东方问题，试图防止在近东因大国均势失调而引起危机的一次重大努力。但克里米亚保护体制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由此而形成的近东大国关系结构并无坚固的基础。

克里米亚保护体制的局限性是在它不能适应欧洲均势结构的变化。体制的稳定与否通常依赖于战胜国之间的维护条约的合作程度和战败国修正条约的机遇程度。1875年近东危机前东方问题沉寂了二十年，这并不能归因于这个体制的稳定性，而是由于列强专注于其他地方的事务，特别是欧洲本身发生了导致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的斗争。恰恰相反，在奥斯曼帝国进入欧洲协调的这些年，正是欧洲政局的每一次震荡动摇了近东大国关系的结构，造成了克里米亚保护体制逐渐解体的条件。巴黎条约才只三年，两个战胜国法奥便在1859年发生了战争。两国曾分别秘密向俄国表示，它们可以考虑把日后帮助俄国废弃黑海条款作为俄国支持它们的交换条件。<sup>②</sup>1866年普奥冲突期间，交战双方也给过俄国与上述相类似的暗示。<sup>③</sup>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英国政府预感到黑海中立化条款的寿命已屈指可数，土耳其的利益将成为欧洲大国斗争

① R·奥尔布雷克特—卡里：《欧洲协调》，纽约，1968年版，第244—247页。（R. Albrecht—Carrie, *The Concert of Europe*）

② B·H·萨姆纳：《1859年3月3日法俄密约》，见《英国历史评论》，第58期（1933年），B. H. Sumner, *The Secret Franco—Russia Treaty of 3 March 185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③ W·E·莫斯：《欧洲列强与德国问题》，第259页。

的牺牲品。格拉斯顿说，“看来人人都在寻觅赃物，大陆欧洲很难相信土耳其不是一笔可以做交易的好价钱。”<sup>①</sup>嗣后不久，德国俾斯麦由于担心黑海条款争端引起国际局势复杂化，影响普法战争的成果，答应发起伦敦国际会议讨论和解决俄国提出的修约要求。<sup>②</sup>他把黑海条款看成是政治上不明智、因而也不能持久的笨拙的规定，“因为不可能长期禁止一个拥有成亿人口的民族对自己的海岸行使理所当然的主权。”“外国在俄国领土上长期行使这种地役权，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屈辱。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培植我们同俄国关系的一个依据。”<sup>③</sup>因此，欧洲大国关系在这一时期的急剧变化相继剥夺了土耳其的保护国，奥国和法国先后战败，英国无法独撑保护体制的残局，新崛起的普鲁士虽非三国保证条约参加国，但对取消签过字的巴黎条约黑海条款态度明朗。克里米亚保护体制并无一贯的斗士。

此外，这个体制本身的弱点也影响了它的生存力。条约的某些条款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整个保护体制就会动摇。1866年列强同意罗马尼亚两地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查尔斯亲王旗帜下的统一，是承认了一个既成事实却又违背了巴黎条约的有关条款。<sup>④</sup>既然

---

① A·拉姆编：《格拉斯顿先生与格兰维尔勋爵政治通讯集，1866—1876》，伦敦，1952年版，第1卷，第136页。（A. Ramm edited, *Th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of Mr. Gladstone and Lord Granville, 1868—1876*）

② 《德国文件》，第2卷，No. 225

③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北京，1985年中译本，第2卷，第80页。

④ M·S·安德森：《东方问题》，伦敦，1963年版，第155—156页。（M. A. Anders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条约的这一部分可以改变,条约的其他部分为什么不能改变呢?俄国当时保持了沉默,但哥尔查科夫已准备好一份关于废除黑海条款的通告,只是囿于时机未成熟才没有宣布。当俄国通告在1870年11月9日抛出后,连英国这个土耳其最坚决的支持者在谴责俄国行为的同时,事实上也想摆脱那些麻烦的条约义务了。格拉斯顿的理由是,土耳其既然无能力保护自己,三国保证条约即形同虚设,不必认真看待。<sup>①</sup>但1856年三国保证条约第二款曾信誓旦旦地规定,违反巴黎条约条款“将被签订本约之列强视为构成宣战理由的事件”。<sup>②</sup>既然如此,保护体制还有何道德上的约束力可言?所以从根本上看,克里米亚保护体制是战胜国强加的一项外交安排,是用外交手段使本质上是暂时的近东地区大国均势凝固化的一种企图,具有极大的不现实性。

1871年1月17日至3月13日的伦敦国际会议标志着克里米亚保护体制的最后解体。俄国方面要求废除巴黎条约黑海条款的通告,实际上是对这个体制赖以存在的国际条约的有效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按当时国际斗争的客观环境,由原来签署1856年保证条约的三盟国联合土耳其诉诸武力迫使俄国守约这样一种选择完全不可能,而要俄国撤回通告又做不到,黑海条款的修正已难以避免了。最重要的是英国内阁的反应:它一方面没有关死修约的大门,另一方面认为俄国单方

<sup>①</sup> A·拉姆编:《格拉斯顿先生与格兰维尔勋爵政治通讯集》,第1卷,第181—182页,第185页。

<sup>②</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伦敦,1875年版,第2卷,第1281页。(E. Hertslet, *The Map of Europe by Treaty*)

面宣布废约的行为侵犯了“庄严的协定”，英国不能予以承认。<sup>①</sup>因此，问题是要找到一种形式重新确认被俄国通告所违反的国际条约有效性的准则。为了打开僵局，列强经磋商后决定在伦敦安排一次由巴黎条约签字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这样，俄国通告虽没有正式撤回，但它的要求被提交签字国讨论。英国方面强调会前不作结论性的安排，<sup>②</sup>用意表明，黑海中立化条款的取消是国际会议讨论的决议，与俄国的违约行为无关。结果是欧洲列强在伦敦会议《特别议定书》中宣布了这样一条规定：“列强承认国际法的一个主要准则是，任何一国未经友好协商取得缔约国之同意，不得擅自违背一项条约的约束或者修改其条款。”<sup>③</sup>显然，列强为取消巴黎条约黑海中立化条款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同时又继续重申维护近东现状的巴黎条约的国际法有效性。

列强在伦敦会议上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以何种安排来替代黑海中立化。如果俄国在黑海的军事力量不再受限制的话，合于逻辑的安排是土耳其应重新确立对海峡的主权，作为对黑海重新武装给海峡安全问题带来影响的“补偿”。各国代表几经折冲，商议在两海峡依旧对外国军舰关闭的情况下，苏丹有权在在平时根据“帝国利益和安全需要对非沿岸国家的战舰开放”。但土耳其代表坚持要把“非沿岸国家”一语改成

① W·E·莫斯：《克里米亚体制的兴起与崩溃》，第165页。

② A·拉姆编：《格拉斯顿先生与格兰维尔勋爵政治通讯集》，第1卷，第179页。

③ B·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布卢明顿，1973年版，第47页。（B. Jelavich, *The Ottoman Empire,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Straits Question*, 1870-1887）



“友好国家”，认为前者的提法限制了土耳其行使主权。<sup>①</sup>会议后来采纳了意大利代表的意见，条款文字变为“如果奥斯曼帝国政府为了保证1856年3月30日巴黎条约条款的执行而有需要的话”，苏丹“有权在和平时期对友好国家和结盟国家的军舰开放海峡。”<sup>②</sup>黑海条款取缔所引起的问题终以寻求主权“补偿”的办法得到了解决，然而土耳其获得部分恢复海峡主权的“补偿”的结果是西方大国取消了对它的保护。随着黑海中立化条款的废除，克里米亚保护体制即告消亡。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70年代初期近东问题上大国关系的变化，是通过列强以欧洲协调的方式召开国际会议确认的，而同一时期欧洲本身大国关系的变化仅是由普法战争交战双方签订法兰克福和约确认的。这一近代外交史上鲜明对比的例子给人以什么启示呢？首先，自土耳其1856年正式加入欧洲协调的体系以后，东方问题实质上已成为一个特殊意义上的欧洲问题。土耳其在欧洲协调中并不享有与列强平等的地位，近东现状的改变必须获得巴黎条约的欧洲六签字国的同意。伦敦国际会议虽然取消了黑海中立化条款，但是这个条款的取消正是通过体现和强调巴黎条约的有效性曲折地实现的。如果说在欧洲德国尚且能在1871年依恃实力改变现状的话，那么在近东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单方面改变现状，造成对一己有利的局面，则此路不通。这是东方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种较为特殊的规律性现象。其次，东方问题和欧洲事务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联系。把关于土耳其命运的问题只看作在欧

① B·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第55页。

② W·E·莫斯：《克里米亚体制的兴起与崩溃》，第177—178页。

洲大国斗争中起“缓冲作用”，依然是一种被动的、单向性的解释。但如果换个角度从近东的大国关系结构与欧洲均势结构的关系上看，问题就不难发现，这种联系在这里相当充分地表现为是一种交互作用。克里米亚保护体制的结束虽然并没有破坏列强在近东的力量平衡，但改变了近东大国关系的结构，而这种改变恰恰是伴随着欧洲均势状态的大变动并且是在互相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1873年，奥俄在兴勃隆协定基础上的协调，代替了1871年克里米亚体制解体在近东留下的空白。然而正如前面所述，奥俄在近东的谅解是系在欧洲那个保守主义的政治结构三皇联盟上的。1875年东方问题重新开始以后，经受这场危机考验的不仅是奥俄的协调关系，而且是维持法兰克福和约之后欧洲现状的整个三皇联盟的大厦。

以上作为对导致1878年柏林会议的近东危机历史背景的一种整体性分析。

## 第二章 近东危机第一年

### 一、波、黑两省起义和安德拉西照会

1875年7月,奥斯曼帝国西北边陲的一个村镇奈韦西涅发生了当地农民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叛乱。8月,叛乱从黑塞哥维那省向北蔓延,席卷波斯尼亚省。起义开始是成功的。起义者利用峻山、深谷、密林所构成的地理环境,成群结帮地出没在与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以及奥匈帝国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接壤的边界地区,土耳其当地驻军派去的镇压常常不能奏效。欧洲各国驻该地区领事网络的大量报告和外国游历者的记述,对起义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各样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猜测,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起义首先是由于波、黑两省内部基督徒农民不堪忍受伊斯兰教地主的政治歧视和经济压迫引起的,然后才得到外部斯拉夫势力的加入和支持。<sup>①</sup>

波、黑两省自十五世纪末归属奥斯曼帝国以来,始终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离心倾向。十九世纪上叶苏丹麦哈姆德二世时期推行中央集权化政策,这种倾向有所收敛,但是当地统治者信奉或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与土地,古老、陈

---

<sup>①</sup> 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牛津,1979年版,第478页。(R. Millman, *British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1875-1878*)

腐的社会经济结构给基督教臣民带来的痛苦和不满并没有减轻。基督教臣民不仅被剥夺了获取高爵厚禄和显赫于军旅的升迁之途,而且不能享有穆斯林在司法诉讼、土地占有等方面同样的权利,他们的地位依然如异国统治下的二等臣民。<sup>①</sup>当地的伊斯兰教贵族无意改变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状况,顽固地拒绝吸收一切外来的先进思想;帝国政府历次颁布的改革措施也因受到他们的抵制而鞭长莫及。

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国库空虚,债台高筑,1854—1875年的外债总额达二亿英镑,政府不得不用每年税收收入的一半抵偿债务,但苏丹宫廷依然奢侈淫逸,钱财不仅用来供养后宫的900名妃妾,而且经常挥霍在星卜、斗鸡这类杂耍上。这种日益严重的财政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基督徒的生活条件,边远地区更甚。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应运而生,地方伊斯兰教贵族及税收人层层盘剥,中饱私囊。当时一位刚从牛津毕业的考古学家A·埃文斯在《1875年8—9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叛乱期间徒步游历记》中详细描述了该地区苛税猛于虎的情状。<sup>②</sup>据学者统计,波黑两省每一个克米特(Kmet,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在1875年交纳的租税占其总收入的44%

---

① R·H·戴维森:《十九世纪土耳其对于基督徒与穆斯林平等问题的态度》,见《美国历史评论》,第59卷,第4期(1954.7),第845页。(E. H. Davison, *The Attitudes Concerning Christian—Muslim Equal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② A·埃文斯:《1875年8—9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叛乱期间徒步游历记》,伦敦,1877年版,第331—336页。(A. Evans, *Through Bosnia and Herzegovina on Foot During the Insurrection, August and September 1875*)

以上。<sup>①</sup>因此,沉重的赋税负担在遇到该地区农业连年歉收的情况下成了引起农民骚动的直接导火线。

1875年7—8月波黑两省基督教农民的起义,是以后持续三年之久的近东危机的开端。然而,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这次偏僻山村发生的起义也许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荡漾的一片涟漪。

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世界从一开始便对波黑两省起义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尤其在毗邻的两个具有自治地位的小国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早在起义发生前,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已逐渐在巴尔干南部斯拉夫人中间扎下了根,这种意识追求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同时还夹带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那种将往昔理想化和强调民族特点的情调。塞尔维亚迈克尔大公当政时期把这种意识具体化了。六十年代下半期他与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希腊订立了协定,准备筹建在塞尔维亚领导下的巴尔干斯拉夫人联盟,并积极在各地宣传和鼓动旨在摆脱土耳其压迫和宗主国统治的总起义。波、黑地区的莫斯塔尔与巴尼亚卢卡两处神学院是得到塞尔维亚支持的革命活动中心,塞尔维亚把解放波、黑两省看作是实现其大塞尔维亚国理想的第一步。1868年迈克尔被害,巴尔干斯拉夫人的联合行动一度处于低潮,门的内哥罗的尼古拉亲王起而与塞尔维亚继位的米兰大公竞争民族运动的领导权。

波、黑两省起义爆发后,塞、门两国斯拉夫人民族情绪再

---

<sup>①</sup> P·F·休格:《1878—1918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工业化》,西雅图,1963年版,第11页。(P. E. Sugar, *Industrialization of Bosnia—Herzegovina*, 1878—1918)

度高涨,纷纷成立各种委员会为叛民募捐经费、物资,自愿组织起来的志愿军越过边界参加起义者的斗争。贝尔格莱德的报纸呼吁塞尔维亚政府担当起巴尔干“皮埃蒙特”的角色,说“塞尔维亚的加入意味着东方将燃起烈火,应该由塞尔维亚来为新月旗奏响送葬曲。”<sup>①</sup>米兰大公当时并不想与土耳其交战,但很难抵挡得住国内舆论和内阁中激进派的压力,否则难以保全他自己的地位乃至生命。8月间,他向俄国进行试探:在发生塞土战争的情况下,俄国是否会允许奥匈帝国占领塞尔维亚?<sup>②</sup>在采蒂涅,尼古拉亲王极力想使门的内哥罗在当时的局势中发挥一种独立的作用。他秘密会见黑塞哥维那起义者首领答应给予支持,而且指示自己的军队与起义者的活动配合。8月底,他对三皇联盟成员国领事表示,若不迅速采取步骤制止波、黑两省的叛乱,门的内哥罗可能无法保持长久的中立;如塞尔维亚对土宣战,门的内哥罗也将进入战争状态。<sup>③</sup>土耳其政府此时认为两省起义的真正危险来自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对叛民的支持,开始把大批军队集结塞、门边界,作防患之用。<sup>④</sup>虽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但即此一端便已显示局势孕育着冲突扩大的危险。

波黑两省起义搅动了欧洲列强的不安,他们力图避免起义引起国际局势复杂化而导致重开整个东方问题。列强一面

---

① D·麦肯齐:《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伊萨卡,1967年版,第34页。(D. Mackenzie, *The Serbs and Russian Pan-Slavism*, 1875—1878)

②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18页。

③ D·麦肯齐:《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第47—48页。

④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伦敦,1891年版,第4卷,第2404页。

警告塞、门两国保持中立，不得进行军事干涉，一面组织了一个六国领事团在土耳其政府与叛民之间作调停，防止事态扩大。

领事团使命的建议最初出自俄国。俄国驻奥大使诺维科夫向奥方提出由三皇联盟成员国向君士坦丁堡方面进行非官方干涉，求得一项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sup>①</sup> 奥国内部存在着一股企图兼并两省的斯拉夫势力，要求采取积极干涉的方针。但安德拉西希望维持一个衰弱的奥斯曼帝国的存在，问题是要防止俄国利用叛乱造成的形势以土耳其基督徒保护者的身份单独行动。他疑心俄国想利用大国合作搞自己的保护国，束缚奥国将来在这些有着重要利益的地区的行动自由。<sup>②</sup> 因此，安德拉西改变了俄国建议的原义，只同意由三皇联盟成员国驻当地领事规劝叛民停止叛乱，迫使他们与土耳其政府代表直接谈判。<sup>③</sup>

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伊格纳切夫及其领事网络的活动，长期以来致力于摧毁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斯拉夫人中的影响。针对安德拉西的意见，伊格纳切夫提出成立一个常设领事委员会来报告叛民的声诉与要求，然后由各国驻土大使据实督促土耳其政府推行改革。这种“大使议会”的做法实际上是想把东方问题放在君士坦丁堡而不是放在维也纳或圣彼得堡来解决。然而俄国外交当局坚持与奥国的合作，但将参加领事团使命的邀请由原来的三皇联盟扩大到巴黎条约的另三个签

①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142页。

② F·R·布拉奇：《从萨多瓦到萨拉热窝》，第393—394页。

③ D·哈里斯：《1875—1878年巴尔干危机外交史：第一年》，第74—75

字国法、意、英，以抵消奥国的控制。

德国方面支持奥俄达成的意见；法国和意大利不愿自己被排除出近东事务的处理之外，欣然参加；英国则颇多踌躇。英国对起义可能引起的复杂形势非常敏感，起初希望土耳其政府能够一举扑灭叛乱。对于奥俄所建议的使命，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和驻土大使埃利奥特认为这与土耳其主权要求不相符，怀疑英国被拉入一种由其他大国控制并又承担义务的对土耳其的体制。但在其他五大国和土耳其已经同意的情况下，英国又无法拒绝，于是英国希望自己的参加可以防止领事团采取错误的做法。<sup>①</sup>

1875年9月领事团在莫斯塔尔附近与起义者代表举行会见，其结果与列强原来设想的完全相反。起义者方面声称在土耳其政府的停火和改革得到欧洲大国保证之前不能放下武器，而土耳其军队突然在会见地点背信弃义地袭击叛民代表，使领事团的和平使命彻底结束。斯蒂尔曼曾经指出，领事团的使命“等于列强承认了土耳其对黑塞哥维那人的统治有错误之处，表示官方欧洲的眼睛注视着土耳其的状况——这一切在任何时候都足以鼓舞他们进行起义，激发门的内哥罗附近山民的好战精神。正因为此，事情的整个方面急剧地改变了。”<sup>②</sup>六国领事团使命从它的缘起就是一个可笑的事物，内部的不一致使这个联合体无法形成一种有权威的压力，它的失败不足为奇。欧洲列强的干预不仅使国际干涉成为既成事

<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伦敦，第84页（1876年），“土耳其”第2集，No. 16 (Accounts and Papers)

<sup>②</sup> W·J·斯蒂尔曼：《黑塞哥维那与最近的起义》，伦敦，1877年版，14—15页。（W. J. Stillman, *Herzegovina and the Late Upspring*）



实,而且给事态继续复杂化提供了诱因。

六国领事团使命的调停无功而返,但近东局势和平化的希望似仍操在欧洲大国手中。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状况此时已处于瘫痪,10月6日政府宣布帝国无力履行到期的外债义务,外债利息的一半将以债券形式偿付各国债权人。对于叛乱,土耳其政府采取的措施有二。一是在10月和12月颁布了两道改革敕令,但规定改革只有在叛民停止“罪恶的非法行径”、返回家园后才生效。<sup>①</sup>二是雇佣巴希布祖克人的穆斯林地方武装帮助镇压叛乱,实际上是给叛乱进一步注入了疯狂的宗教报复的因素。这些措施无一能救补于时局的平静。俄国外交部高级顾问热米尼说,“土耳其是一个由于欧洲均势的需要靠容忍才得以存在的国家,因此不干涉原则不能象对其他国家一样适用于土耳其。只有当所有的欧洲大国同意协调行动时,那种为维持土耳其存在而运用的压力才能够取得成功。”<sup>②</sup>然而列强对东方问题的观点存在深刻分歧,保持一定的行动自由或许能促使它们在观点一致的方面达成某种合作,而强制一起行动的企图却可能减少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并产生新的怀疑和冲突。大国在寻求局势和平化的同时,播种着近东危机中新的不和的种籽。

奥俄的立场与分歧从上述六国领事团使命已见端倪。依圣彼得堡外交当局时有流露的想法,奥斯曼帝国民族、宗教矛盾根深蒂固,难以做到完全平等划一,省级体制应向自治方面

<sup>①</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伦敦,1891年版,第4卷,第2407—2408页,第2416—2417页。

<sup>②</sup> 引自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34页。

过渡。<sup>①</sup>显然,波黑地区能给以某种自治地位,对斯拉夫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是一种有利的解决办法,问题是这种办法现在不可能得到土耳其和其他大国的同意。为了不使混乱局势失去控制,俄国现在强调欧洲列强合作进行干预,“既然帮助土耳其在制止塞门两国行动方面作了干预而离开了中立态度,也就承担起了道义上的责任:尽快缓解基督徒的痛苦状况。”<sup>②</sup>在大国干预过程中,俄国希望自治的解决办法能逐步被接受。保持与奥国的谅解是保证大国合作干预的一个基础,俄国驻奥大使诺维可夫奉命协助安德拉西拟定旨在使局势和平化的方案。

在安德拉西看来,土耳其若能按大国提出的方案实行改革,两省叛民的不满便可消除,但他反对采取重新组织两省体制的解决办法。10月6日安德拉西在致奥驻外使节的通知中指出,波黑两省内部矛盾犬牙交错,穆斯林和基督徒好斗成性,自治体制不仅无法物色到胜任的统治者来维持秩序的安定,而且容易促发巴尔干其他地区如保加利亚的基督徒要求自治以及土属小国要求独立的浪潮,那样将导致整个东方问题的再起。<sup>③</sup>他的真实目的是防止因设立自治体制而堵塞奥国势力向东扩张的道路。安德拉西担心俄国可能会抛出自治计划并得到其他大国的响应,因此主张先由三皇联盟商定和平化措施,然后邀请其他三大国参加。他认为在三皇联盟内有

① F·R·布里奇:《从萨多瓦到萨拉热窝》,第74页。

② R·W·赛顿-沃森编:《东方危机期间的俄英关系》,《斯拉夫评论》,第3卷(1924,12),No. 102,以下简称《俄英关系文件》。(R. W. Seton-Watson, Russo-Brit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Eastern Crisis, *The Slavonic Review*)

③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36-37页。

德国的支持,事情可以引导朝对奥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如六大国一起进入讨论,众口难调,奥国将停止在巴尔干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然而,安德拉西的主要阻碍是在君士坦丁堡的伊格纳切夫方面。俄国驻土大使认为自己政府执行着一条受安德拉西控制的奥俄联合的路线,奥国存有吞并波、黑两省的秘密计划,与奥合作损害俄国利益。为了“避免给奥国找到攫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借口”,他说“我们的一切艺术是要在手中掌握住巴尔干可能发生的每一种运动的线索”,以便在时机来临时“将其引导到土耳其基督徒的正当利益与俄国利益相一致的目标上”。<sup>①</sup>伊格纳切夫10月间曾去利瓦吉亚游说沙皇,力主打破俄奥联合代之以俄土联合,以为通过他本人对土耳其大宗宰麦哈茂德帕夏的影响便可控制这个联合。利瓦吉亚游说没有结果,但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动却颇有成绩。土耳其10月2日、12月12日两道改革敕令用意多在抵制和瓦解大国的联合干预,它们的幕后隐藏的是伊格纳切夫活动的影子。为了与伊格纳切夫独家控制的土耳其改革分庭抗礼,安德拉西警告土耳其必须按照大国同意的改革方案行事,否则叛民不会接受。正是在伊格纳切夫和安德拉西争夺土属基督徒臣民好感和巴尔干事务主导权的较量中,安德拉西和诺维可夫联合炮制的改革方案以照会形式于12月31日通知欧洲各大国政府。安德拉西照会使得土耳其两次敕令颁布的效果相

<sup>①</sup> A·奥诺:《N·伊格纳切夫伯爵的回忆录》(第1部分),见《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1.12),第396页。(A. Onou, *Memoirs of Count N. Ignatyev, Slavonic Review*)

形失色。这里必须指出,当时俄奥官方虽然以基督徒保护人自居,但内心里却视起义如渣滓的泛起,认为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可能潜伏着危险的革命倾向。这也是伊格纳切夫暂时受挫,未能打破奥俄官方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德拉西照会为波、黑两省设计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五点: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取消两省的农业税,直接税必须用于地方目的,国家在农民购买地主土地方面提供帮助,设立一个由穆斯林和基督徒组成的混合委员会督导改革的执行。<sup>①</sup>但照会没有提供欧洲列强对改革的任何保证,改革的实施权留给了土耳其政府。安德拉西的困境是:照会中如果列具大国对改革实施的责任,则可能引来俄国的进一步干涉,而且,英国和土耳其必以其损害奥斯曼帝国主权为由加以拒绝,照会成功的希望几乎不存在,问题处理的主导权又会落到伊格纳切夫手里。但大国方面不给改革以实际保证的话,起义者又如何相信仅凭一纸照会就能使土耳其政府痛改前非、立地成佛而把改革变成现实呢?照会所编结的是一条无望之路。事实上奥俄两国对土耳其政府实行改革的诚意和能力并不抱多大幻想,照会只是为了修补当时的形势,维持现状。一旦土耳其的改革证明没有结果,奥俄就会以此为契机按不同的方向追逐自己的目标。俄国将建议自治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奥国则为必要时由自己占领两省创造条件。安德拉西希望照会能“暂时安抚起义”,但私下表示“如果基督徒再次寻求奥国庇护,大国

---

<sup>①</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418—2429页。

将不能阻止奥国占领两省”。<sup>①</sup>

欧洲大国中唯英国接受照会的答复姗姗来迟。土耳其政府本欲以颁布两道敕令、自行改革来恢复在欧洲的形象,阻止列强的联合干涉,但安德拉西照会的宣布使土耳其大失面子,列强毫不理会它的愠怒怨艾之状陆续予以认可。于是土耳其转而希望英国同意照会,将此作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保证。英国的迟疑主要是考虑奥俄建议背后的动机。外交大臣德比疑心奥俄各怀有吞并意图和自治计划,两者都会为奥斯曼帝国解体洞开大门,英国必须警惕被诱使去支持最终将导致这种后果的步骤。<sup>②</sup>

1876年年初,德比收到英国驻德大使拉塞尔一份关于德国宰相与他讨论东方问题的谈话内容的电报。俾斯麦提议建立英德谅解,同时对奥俄情况作了一番分析。德比不相信俾斯麦的诚意,但有关奥俄的那番分析却多少消除了德比对安德拉西照会的怀疑。俾斯麦谈到,哥尔查科夫和安德拉西正在为局势的和平友好合作,可是俄奥两国都存在着干扰因素,如果安德拉西因不能抵制奥国内部斯拉夫派兼并势力对皇帝的影响而下台,“我们就必须面对奥国的兼并政策以及它在俄国引起的后果。”<sup>③</sup> 德比1月7日给首相迪斯累里信中说:“我们也许受骗,但我认为奥俄两国希望和平。它们愿意看到现状得以维持,互相妒忌和害怕出现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的麻烦,使

①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41—42页。

②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3卷(1924,12),No. 110

③ W·N·梅特利科特和D·K科文内编:《俾斯麦与欧洲》(文件集),第95页。

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合理的。”<sup>①</sup> 德比感到,安德拉西照会成功的机会十分渺茫,英国方面如果加以拒绝,就要招来使大国和平化努力失败的罪名,而英国如果接受,照会并不能构成对英国的约束,相反倒可以洗清英国,不对土耳其的腐败或者叛乱的继续负任何责任。英国首相迪斯累里附和了德比的意见。在欧洲和土耳其催请的压力面前,他觉得英国的立场不能“表现得比土耳其更土耳其。”<sup>②</sup> 1月18日,英国内阁决定,对安德拉西照会除一、二处作若干保留外给予原则上的支持。<sup>③</sup> 2月13日土耳其政府正式通知欧洲各大国,同意接受安德拉西照会,将视其适宜程度作为帝国的改革措施予以实行。<sup>④</sup>

当欧洲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德拉西照会上的时候,俾斯麦向英国提出了上面所说的建立英德谅解的建议。近东危机的开始对德国并非是坏事,有利于把欧洲各国的视线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移到东方。俾斯麦是从保证德国在欧洲地位的角度看问题的,他总是乐意支持奥俄在近东达成的任何意见,奥俄的冲突可能导致俄国和德国的敌人法国结盟,使德国在欧洲腹背两面受敌。俾斯麦知道伊格纳切夫与安德拉西争夺巴尔干事务主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安德拉西照会只是奥俄官方的一种暂时妥协。另一方面,英国在1875年11月购买苏伊

① 见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52页。

② W·F·莫尼彭尼和G·巴克:《本杰明·迪斯累里传》,伦敦,1929年版,第6卷,第891页。以下简称《迪斯累里传》。(W. F. Monypenny and G. 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③ 《英国蓝皮书》,第84卷(1876)，“土耳其”第2集, No. 72

④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441—2443页。

士运河大宗股票一例已表现出对土耳其事务的重新关注,<sup>①</sup>而英国在德法战争危机时站到俄国一边是德国外交的一次沉痛教训。为了牵制奥俄关系不发生急剧变化,英国现在维持近东和平的立场不妨可以加以利用。因此俾斯麦改变了一味消极接受奥俄协议的姿态,试图以谋求英德在近东建立维系和平的谅解作为一种防止奥俄关系破裂的力量。当然,俾斯麦的意图决不是想舍弃三皇联盟。

俾斯麦在1月2日与拉塞尔的谈话中建议,鉴于德国在土耳其并无特殊利益需要捍卫,他可以通过对维也纳和圣彼得堡施加有益的影响来支持英国在那里的利益。同时他希望能按照女王陛下政府的意愿,“和英国一起反对或者赞成奥、俄在土耳其的兼并倾向。但没有英国支持,他不能单独予以抵制,因为他并不认为奥、俄中的任何一方会由于这样的领土增加而变得强大,德国会因此而受威胁。”<sup>②</sup> 俾斯麦还提到土耳其被瓜分的可能性,奥国占领波、黑两省,俄国收回比萨拉比亚,英国得到埃及。<sup>③</sup>1月31日,俾斯麦再次召见英国大使,要求其向国内政府转达他的意愿:英德两国都希望维持近东和平,但奥俄互相对立的利益随时会导致严重的分歧,那时德国将不得不面临某种抉择。“在这样做之前,预先了解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并把它们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可确保德国寻求使

<sup>①</sup> P·M·肯尼迪:《英德对抗的崛起,1860—1914年》,伦敦,1982年版,第31页。(P.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sup>②</sup> W·N·梅特利科特和D·K·科文内编:《俾斯麦与欧洲》(文件集),第95—96页。

<sup>③</sup>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27

奥俄在土耳其维持和平的努力得到英国道义上的支持。”<sup>①</sup>

英国政府内部对德国的建议有不同想法。迪斯累里倾向于接受英德协约谅解,认为这是瓦解三皇联盟,恢复英国国际影响的机会。女王陛下考虑到两国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催促外交大臣“无拘束地进入与俾斯麦关于东方问题的讨论。”<sup>②</sup>但德比怀疑德国建议可能含有秘而不宣的意图,害怕掉进俾斯麦设置的陷阱。2月16日德比通知拉塞尔把英国答复转告德国。答复中认为,目前近东形势变化莫测,英国很难确定指导将来行动的准则,“总体上来说,女王陛下政府认为任何对领土现状的干扰是不妥而又危险的,因为边界的修正会一个跟着一个地接踵发生,当一种兼并政策开始后,人们便不能预见将在何处结束。”德比指示拉塞尔:英国“不愿缔结排他性的同盟”,英德可通过协调行动和友好谅解推进近东的和平事业,但这种政策只有在弄清楚俾斯麦建议的动机后才有可能。<sup>③</sup>

面对德比冷淡的外交微笑,俾斯麦降低了原来的调子。他向英国大使拉塞尔解释,“德国愿意支持英国在通往印度道路上的合法利益,两国在东方所希望的只是保持和平”;问题存在着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大国间友好合作共同维持土耳其领土现状的办法,但是一旦争端爆发,为了避免战争,也可采用另一种让各方取得领土补偿的办法。俾斯麦说,德国建议的“全部目的是当事有不测时,能与女王陛下政府坦率地交换意

① W·L·兰格:《欧洲的同盟与阵线》,第78—79页。

②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443—444页。

③ K·伯恩编:《维多利亚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牛津,1970年版,第405页。(K. Bourne, *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见。”<sup>①</sup>俾斯麦显然在收回他伸出的建立英德协约谅解的触角,英国方面迪斯累里怀疑俾斯麦有主持瓜分土耳其领土的意图,也不再违拂德比的意见。于是,1876年1—2月间英德建立谅解的尝试在交织着两国善意、误解、猜忌的气氛里无果而终。

历史学家在谈到这次英德协约尝试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俾斯麦企图吸引英国用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办法解决东方问题。梅特利科特说,“没有证据表明,俾斯麦的建议除了鼓励英国参加一项瓜分政策外还有其他的目的。”<sup>②</sup>这种看法似有讨论的余地。诚然,俾斯麦已经天才地预见到波、黑两省问题不能与整个东方问题分开来处理,近东事务只有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使奥、俄和其他有关国家各有补偿才能解决。但当时危机所包含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俾斯麦在这次建议中表达的瓜分思想也不具有确定的性质,建议的主导方面是希望英德建立近东谅解。正如俾斯麦明确告诉拉塞尔的,如果英国反对兼并政策和改变领土现状的话,他也准备这样做。判断俾斯麦意图的困难是由于他的手法灵活多变,往往同时抛出几种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设想或者建议,结果却走向要达到的同一彼岸。俾斯麦深知东方问题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

<sup>①</sup> 英国伦敦公共档案馆,FO68/846, No. 117, 机密(拉塞尔致德比, 1876. 2. 19)。见D·哈里斯:《俾斯麦1876年1月对英国的建议》附录。《近代史评论》,第3卷(1931. 9.), 第452—455页。(D. Harris, Bismarck's Advance to England, Jan. 1876.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sup>②</sup> W·N·梅特利科特:《俾斯麦与贝肯菲尔德》,见A·O·萨基桑编:《外交史与外交编纂史的研究》,伦敦,1961年版,第232页。(W. N. Medicott, Bismarck and Beaconsfield, A. O. Sarkissian, *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这两个国际政治震源之间的联系,奥斯曼帝国之生存对他来说亦可亦不可,但近东危机的发展同样也存在着引起对德国不利的大国阵线变化的可能,英德协约无疑是可以与三皇联盟相得益彰的有尝试价值的又一种选择。应该承认,俾斯麦提出建议时的态度是认真的,况且他所要求的也并非那种具有正式同盟性质的谅解。尝试失败的责任主要在英国方面,德比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使英国失去了一次可能取得欧陆最强大家的支持来影响近东事务的机会。

## 二、从柏林备忘录到赖希施塔特协定

1876年是奥斯曼帝国编年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史称“三苏丹之年”。是年3月,欧洲各大大国政府首脑官邸接到一份署名“穆斯林爱国者”的宣言,谓“欧洲对奥斯曼事务的任何干涉只能恶化其内部形势。”<sup>①</sup>此言不幸语中。5月30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多尔玛巴赫宫的苏丹阿卜杜勒·拉齐兹在一次政变中被废黜,数日后发现他手腕的血管切断,死在移居后的住处。8月31日阴谋者再次发难,逼迫性格懦弱的穆拉德五世退位,并公布了当时著名医师关于其精神失常不胜理政的联合诊断书。<sup>②</sup>据说在9月为新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登位举行奥斯曼传统的佩剑庆典时,京城加拉塔大桥塌陷4英尺,加拉塔—佩塔的索道折断。人们纷传此乃是帝国的

<sup>①</sup> R·H·戴维森:《1856—1876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第320页。

<sup>②</sup> S·J·肖和E·K·肖:《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的历史》,纽约,1979年版,第2卷,第166—167页。(S. J. Show and E. K. Sho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不祥之兆”。流言所指虽系迷信，但苏丹宫廷万花筒般的迭变反映了波黑两省起义以来奥斯曼帝国内部政治混乱、人心浮动的程度。

社会的不满集中表现为伊斯兰教徒米莱特(Millet, 原义“宗教社会”, 引伸为“民族”)情绪的高涨, 他们指责帝国政府对两省叛乱镇压不力, 在基督教大国干涉面前屈从偷安。5月间君士坦丁堡数千名索夫塔(Softas, 神学院学生)上街游行, 在各处清真寺前集会示威, 历数政府腐败无能的劣迹。因亲俄而得了“尼迪姆道夫”浑名的大宗宰麦哈茂德在这次动乱中被撵下台。5月6日萨洛尼卡发生了又一起令欧洲侧目的事件, 一群穆斯林暴徒在“营救”一名据称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年青女子时与外国驻当地领馆发生冲突, 混乱中法德两国领事被害。帝国政府官员中以米哈德帕夏为首的改革派企图利用社会不满来制定一部建立在各民族、宗教平等观念上的宪法, 但种种的穆斯林宗教狂热表明他们所依恃的力量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同时, 改革派立宪的宗旨是在加强中央集权化, 这与两省起义者和所属小国的独立倾向水火不容。因此, 帝国政府一次次的改革敕令和列强关于改善土属基督徒境遇的意见形同废纸, 根本无法实现。据萨拉热窝的英国领事的观察, 土耳其在该市所做的唯一实际的让步是允许可以敲响东正教教堂的钟声。<sup>①</sup>

安德拉西照会所设想的和平化前景证明是虚幻的。当1876年春天巴尔干山脉积雪消融的时候, 塞门两国为强大的斯拉夫舆论压力所裹卷, 加紧了对土耳其的战争准备。俄国陆

<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 第84卷(1876年), “土耳其”第3集, No. 137

军大臣米柳亭的《日记》透露，哥尔查科夫此时对欧洲外交是否能阻止两国进入对土战争表示怀疑。《日记》中写道，“如果所有的土耳其斯拉夫省揭竿而起，我们的首相或许会建议任其双方接受命运的安排：让武力决定他们中谁是胜者。”<sup>①</sup> 波黑两省叛乱地区的情况也因难民问题而日益严重。土耳其政府虽说对逃亡者宣布了大赦令，却并无经费来遣返和安置，数以万计的难民相继遁入奥国边界省份和塞门两国。安德拉西几次威胁要关闭边界以解决难民问题带来的压力，但由于其边界省份天主教基督徒总有办法绕开官方的阻挠给叛乱地区提供帮助，这种做法实际上不易行通。4月上旬，奥国官员经门的内哥罗牵线与起义者首领在苏托里纳谈判，再次想劝诱他们停止叛乱。可是起义者方面要求改革必须有欧洲大国的保证，提出了土耳其需把军队撤离到指定地点和立即为难民重建家园等反建议，他们扬言在土耳其政府兑现改革诺言前拒不放下武器。<sup>②</sup>

于是，三皇联盟试图做一次新的努力来摆脱困难的局势。5月11日至14日奥俄德三国大臣在柏林举行会谈。俄国哥尔查科夫宣读了一份他为赴会准备的长达70页的备忘录，认为安德拉西照会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欧洲大国的充分保证，建议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土耳其改革和对叛乱地区实行军事占领，并召集一次六大国会议对这些措施加以讨论。<sup>③</sup> 安德拉西完全不赞成俄方备忘录：哥尔查科夫的“大国保证”意

① 引自D·麦肯齐：《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第82页。

② 《英国蓝皮书》，第84卷（1876年），“土耳其”三集，No. 140

③ “哥尔查科夫备忘录”，见D·哈里斯：《1875—1878年巴尔干危机外交史：第一年》附录B，第447—450页。

味着在巴尔干建立某种保护,为最终实现波黑两省的自治铺平道路。安德拉西的对策是争取德方支持,他以埋怨口气向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毕洛夫要挟:“正是德国使得俄国如此骄妄,我们不能承担这样的后果。当雨水倾注这个联盟的屋棚时,我们索性就撑伞离去。……该备忘录是他们想轻易地加在我们脖子上的套索。他们以为我们愚蠢到不知道这一点,软弱到不能够折断它吗?我要对你说,我们将折断它。”<sup>①</sup>

俾斯麦对于奥俄在巴尔干的分歧洞若观火。自从年初英德协约谅解的尝试失败后,他便极力纵容两个盟国以在土耳其瓦解时互相取得领土补偿求得妥协。3月间,他曾对途经柏林的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说,德国打算支持俄国关于东方问题的任何建议,但有一个前提:“不得使德国卷入和奥国争吵”。<sup>②</sup>5月10日,他对先期到达柏林参加会晤的安德拉西作了三小时谈话,正式建议奥国日后采取领土补偿的办法,并指出现在则应“考虑叛民的要求,这总比建立自治国家更能为我们接受。”<sup>③</sup>哥尔查科夫5月11日提出的备忘录使俾斯麦感到不满,俄国建议的措施只会加深奥俄的分歧,因而俾斯麦采取了支持安德拉西的立场。5月13日,三皇联盟就波黑两省实现和平化的基本要点达成协议,即柏林备忘录。

柏林备忘录的内容除了重申安德拉西照会的改革意见

<sup>①</sup> R·黑格丢斯:《尤利乌斯·安德拉西伯爵的外交政策》,《匈牙利季刊》,第3卷,第4期(1937),第632、633页。(R. Hegedus, *The Foreign Policy of Count Julius Andrassy, Hungarian Quarterly*)

<sup>②</sup>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190页。

<sup>③</sup> D·哈里斯:《1875—1878年巴尔干危机外交史:第一年》,第291—292页。

外,主要是二项。一是宣布两个月的停火,土耳其政府与叛民在此期间按下列各条直接谈判:(1)土耳其政府为安置难民提供充分保障;(2)组织由一名黑塞哥维那基督徒为首的混合委员会负责安置事宜;(3)土耳其军队集中到几个指定的地点;(4)基督徒暂时保持武装;(5)由大国领事或代表监督改革的实施和难民的遣返。二是同意列强原则上可派遣军舰到受威胁的地点,保护其基督徒公民在土耳其境内的安全,防止萨洛尼卡事件重演。柏林备忘录基本上反映了安德拉西的思想,但哥尔查科夫给这个文件加上了一个带刺的尾巴,文件结语云:“如果停火期满而大国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三国宫廷一致认为有必要确立一项协定来加强其外交行动,这些可能采取的有效措施是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和防止祸端的进一步扩大。”<sup>①</sup>

应该承认,这是俄国继领事团使命、安德拉西照会以后在对混乱局势采取重大行动方面第三次向奥国作的让步。俄国在柏林会谈中从谋求波黑实现自治体制的意向上的退却,初看似乎不可理解,因为俄国仿佛是在牺牲它希望通过三皇联盟加以保护的利益。然而实际上俾斯麦在会谈中的态度已经显示,较之德俄一道对奥国在其毗邻的波黑地区的问题上施加压力,德国更倾向于抑制俄国要求以避免安德拉西处于困境。俄国若失去德国的支持,任何克服奥国反对自治计划的努力都将无济于事。如果俄国仍愿维持三皇联盟并且不想使自己在近东被孤立的话,某种退让是不得不作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奥国并非不觉得如果没有俄国同意,它的努力要在毗邻

<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第84卷(1876年)，“土耳其”第3集, No. 248

的叛乱省份得手也极其困难。妥协的途径就是在土耳其一旦瓦解时互相取得领土补偿,即俾斯麦所提倡的办法。安德拉西会谈期间曾于5月12日夜密电报告皇上,说:“已与哥尔查科夫亲王谈及将来的计划,并得到他的明确表态:不反对兼并土耳其克罗地亚。对于一件事情的开始来说,这已足矣!”<sup>①</sup>虽然俄国预期得到何种补偿仍不清楚,但奥俄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默契不能不说是柏林备忘录背后双方谅解的基础,两个月后则体现在赖希施塔特协定中。

但是,三皇联盟在使柏林备忘录变为欧洲的联合行动方面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5月13日,哥尔查科夫在德国宰相府向英法意三国驻德大使通报了奥俄德刚拟就的关于局势和平化新建议的内容,解释他们的目的是在巴尔干造成“一个已经改善的现状”,希望三国政府在近日内给予有利的答复。法意两国迅即对三皇方案表示同意,然而英国却毫不掩饰对三皇方案及其做法的敌意,它再也不愿听任俄奥德三国在近东事务上颐指气使。5月15日迪斯累里对出席英国王宫招待会的俄国大使舒瓦洛夫说:“我对你们的建议无可奉告,因为你们把我们当成像门的内哥罗或塞尔维亚那种等第的国家看待。”<sup>②</sup>5月16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迪斯累里在递交讨论的备忘录中说,三皇联盟建议停火的五条犹如刺向土耳其心脏的利刀,最终将导致其崩溃。他谴责俄奥德三国一面“高谈希望大国协作行动,一面却把法意英排斥在磋商之外,而通过电报要求我们对从未听说过的建议表示赞成或反对,这简直是

① F·R·布里奇:《从萨多瓦到萨拉热窝》,附录文件第7号,第396页。

②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3卷(1925·3),No. 31

莫大的笑话。”按迪斯累里的看法，土耳其宁可放弃波黑两省，也不能默认这个新建议。他还提到“如果土耳其同意，我们准备建议停火和召开一次基于维持领土现状的欧洲会议”，但由于土耳其的想法尚未可知，这样的建议也无异于盲人摸象。<sup>①</sup>内阁一致决定拒绝同意柏林备忘录。5月19日外交大臣德比正式把英国决定通知各国。他着重指出，由于新建议应允大国在停火失败时有权采取干涉措施，因而叛民不可能被指望接受土耳其政府的任何条件，这只会阻塞而不会推进和平化的前景，英国政府感到无正当理由要求土政府接受该建议。<sup>②</sup>

英国对柏林备忘录的另一个反应是增派“帝王号”等三艘军舰去达达尼尔海峡口外的贝斯开湾。萨洛尼卡事件后有关大国的战船已在调往东地中海，柏林备忘录进而确认了这种海上措施的必要性。英国怀疑柏林备忘录主要是俄国的阴谋。迪斯累里认为“直接的危险来自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一端，如果伊格纳切夫成功地诱使惊慌的苏丹同意俄国驻扎军队，并把其舰队置于俄国保护之下，那将造成巨大的困难。”<sup>③</sup>迪斯累里事后为英国拒绝柏林备忘录以及派军舰去贝斯开湾的行动辩护，他给女王写信说，要是英国承认柏林备忘录的话，此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可能已落入俄国之手，“女王陛下舰队奉命赴地中海不是去保护基督徒或土耳其人的，而是为了帝国！”<sup>④</sup>从这里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位受到俄国势

①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896—898页。

②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464—2465页。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901页。

④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455—456页。



力的影响或侵犯,与欧洲土耳其某些部分行政体制的改变相比较,对英国来说是个格外容易引起警惕的问题。

英国拒绝柏林备忘录通常被解释为是迪斯累里支持奥斯曼帝国的表现,但正如在5月16日提供内阁讨论的意见中表明的,他并不绝对排除必要时放弃波黑两省这种分割土耳其领土的做法,因而他的支持严格讲是其他想法的附属物。增强英国的大国威望与影响、维护英帝国的利益比作为土耳其无条件的朋友在迪斯累里的想法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不可否认,这一点与支持土耳其当时很难截然分开,可是英国在柏林备忘录问题上的独立行动,主要是出自迪斯累里无法忍受备忘录发起者把英国看做欧洲二等国家的侮辱性做法,在这方面他的现实意识是特别强烈的。俄国外交部的热米尼事后认为,触犯英国的自尊性是“我们的一个错误。”<sup>①</sup>

近东问题著名学者哈里斯曾批评迪斯累里“完全缺乏现实意识”,<sup>②</sup>这只是对另一个问题即迪斯累里关于英国拒绝柏林备忘录的估价而言才是正确的。迪斯累里吹嘘英国卓尔不群的行为在大国中赢得了声誉,俄奥德三国“不自然的联盟”如历史上“消逝的罗马时代三头政治一样已经灭绝。”<sup>③</sup>事实是另一码事。欧洲五大国后来决定中止向土耳其递交柏林备忘录,并不是顾虑英国的反对,而主要是由于土耳其5月底发生了推翻阿卜杜勒·拉齐兹的宫廷政变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动乱事件。三皇联盟也没有破裂,相反英国的行动加深了它自

① 查尔斯·杰拉维奇和巴巴拉·杰拉维奇编:《俄国在东方》,第14页。

② D·哈里斯:《1875—1878年巴尔干外交史:第一年》,第307—308页。

③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458页。

己在欧洲国家中的孤立主义的形象。俾斯麦对英国不能提供支持感到遗憾。英国当时曾表示愿与德国实行合作，俾斯麦答复说，柏林备忘录是安德拉西抵制了哥尔查科夫的自治计划而产生的一个较好的方案，奥俄继续保持友好谅解应视为近东和平的保证。<sup>①</sup>俾斯麦愿意考虑英国提出的任何具体建议，但无意让英国的做法损害三皇联盟。然而，英国拒绝柏林备忘录毕竟是欧洲协调的一次大失败，它的意义是在：三皇联盟不能再屡试不爽地把他们关于近东事务的安排强加给英国，英国开始寻求一条确保自己大国地位的独立路线。

欧洲大国不能在谋求局势和平化方面保持联合行动现已表面化，但此时英国却与俄国展开了一场有关建立双边谅解的外交周旋。6月10日迪斯累里出乎意料地向俄国大使舒瓦洛夫表示：英国并非不信任俄国的政策；英国将本着和解与善意的精神研究俄国提出的任何建议，但俄国必须不是通过第三者而是直接告诉英国。然后他这样评述了形势：“叛乱者战斗的目的是独立，不是改革。在这种事态下流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俄国企图制止塞门两国的对土战争是想错了，因为冲突即将爆发，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这场冲突的结果。”“如果基督徒取胜，英俄两国需要做的只是确认既成的事实；如果土耳其战胜并对基督徒诉诸暴行，列强即可以人道的名义加以干预，那时欧洲的干涉将是合法的。”<sup>②</sup> 尽管俄国对于英国的诚意有种种猜疑；但哥尔查科夫仍力图把英国拉到欧洲协调中来，并

<sup>①</sup> 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180—181页。博士论文，1977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R. G. Weeks, *Peter Andreevich Shuvalov, Russian Statesman*）

<sup>②</sup>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3卷（1925.3），No. 38

且想看看英国建议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他指示舒瓦洛夫说,三皇联盟是俄国外交不可变更的基础,然而“这个原则与同伦敦内阁交换意见不是不能相容。”<sup>①</sup>在谈判过程中,舒瓦洛夫努力想让迪斯累里和德比相信波黑两省自治及塞门两国得到一些小块领土是可取的解决办法,可是英国除了给冲突双方空出地盘外并无解决近东问题的现成方案,由于塞土战争临近爆发,英国宁肯采取等待和观望的态度。

迪斯累里的意图值得推敲。破坏三皇联盟,显示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独立地位是主要的。三皇柏林方案的失败给它以新的面貌登入欧洲大国之堂提供了机会:通过与俄国的联络,或可取代奥国,成为解决近东问题的真正一员,或可表明英国除孤立行动外有其他选择,增加在德国眼中的份量。那种等着招架奥俄炮制没完没了的照会、备忘录的情况已是昨日黄历了。其次是防止柏林备忘录再向土耳其递交。俄国如被给予一线希望能从英国得到比奥国方案更多的东西,未必不会上钩,而柏林备忘录将随着塞土战争的接近失去递交的意义。当然,希望在这里不过是像海市蜃楼一般的东西,当谈判涉及到自治体制等实质性问题时,迪斯累里提醒德比说:“担心我们在市场上呆得太久了。”<sup>②</sup>因此,英国把这场谈判当作瓦解俄国外交努力的烟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876年夏天,巴尔干出现了两件对近东危机发展和欧洲列强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的大事。一件是保加利亚发生的“恐怖

<sup>①</sup>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3卷(1925.3),No. 43

<sup>②</sup> 见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197页。

暴行”。保加利亚人为争取独立与解放于4月底举事起义，土耳其在镇压时依靠巴希布祖克人和契尔克斯人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加以残酷报复，将其淹没在血泊中。据英国驻阿德里安堡领事杜普伊6月的一份报告，菲利普波利斯附近地区有12000名无辜居民包括妇女儿童惨遭杀害，60个村庄被夷为废墟。<sup>①</sup>保加利亚骇人听闻的事件激起了欧洲舆论的强烈愤慨，土耳其在欧洲基督教大国眼中越加显得不可救药。当时著名法国作家雨果就曾呼吁，欧洲文明的庄严使命是立即制止土耳其蹂躏弱小民族的野蛮暴行。<sup>②</sup>另一件是塞土战争的爆发。由于土耳其政局的混乱和大国方面行动缺乏一致，奥俄方面均无法再阻止塞门两国进行对土战争。6月16日，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订立军事联盟。6月30日，米兰大公发布宣战令。7月2日，两国军队跨过边界和土耳其军队全面接火。塞尔维亚的战争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铤而走险的赌博，它的军事力量明显劣于土耳其方面，但是，俄国驻贝尔格莱德领事卡特索夫当时在暗中极力纵容，俄国将领切尔尼雅也夫径自来到塞土战争前线帮助指挥战斗，塞尔维亚通过这些迹象相信：战争一旦进行到一定阶段，官方俄国便不能对其

① H·坦佩尔利：《从历史的批判眼光看1875—1878年保加利亚及其它暴行》，附件2，见《英国学院论文汇编》，第17卷（1931），第135—139页。（H. Temperley, *The Bulgarian and Other Atrocities, 1875—1878,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② S·达米亚诺：《列强与1875—1876年东方危机》，见《东南欧杂志》，第4卷，第2期（1977），第209页。（S. Damianov,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astern Crisis of 1875—1876, Southeastern Europe*）

命运无动于衷。<sup>①</sup>

塞土战争刚拉开战幕，俄奥两国立即就战争结果的各种可能性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由于5月份俾斯麦在柏林会谈中流露出来的藐视俄国意见的倾向和6月份英俄谅解谈判的失败，俄国为了保证不因塞土战争而引起与奥国的冲突，迫切需要与奥国取得妥协。奥国方面曾一度对英俄谋求谅解的消息感到惊慌，三皇联盟的价值在柏林备忘录被英国拒绝后明显体现出来，而且只有与俄国合作才能得到俾斯麦像柏林会谈时那样的支持，所谓“通往柏林的道路需经圣彼得堡”。1876年7月8日，哥尔查科夫和安德拉西随两国皇帝在波希米亚的赖希施塔特城堡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达成的谅解是双方事后各自凭借记忆写成文字的，两种说法存在不少歧异且又无法证明，以后曾引起双方争议。<sup>②</sup>

根据赖希施塔特协定，双方同意对目前的塞土战争采取不干涉原则，但保留在情况需要时可作出进一步谅解的权利。由于奥国不可能在塞门两国胜利时保持消极沉默，俄国也不会在塞门两国失败时隔岸观火，条约中这样的安排等于承认不干涉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原则。

协定对塞土战争的前景分两种情况做了假设。如果土耳其方面战胜，两国将联合制止发生对基督徒的暴行。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应予恢复战前的领土现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叛乱两省将按安德拉西照会和柏林备忘录的方案推行改

<sup>①</sup> D·麦肯齐：《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第99—101页。切尔尼雅也夫曾被称为俄国征服中亚塔什干的“雄鹰”。

<sup>②</sup> 《奥匈帝国秘密条约集》，第2卷，第188—190页。G·H·鲁普是第一位指出奥俄赖希施塔特协定存在歧异的学者，参见《动摇的友谊》，第137—146页。

革。如果土耳其战败，奥俄相约不赞成在巴尔干建立一个波斯拉夫国家。在关于塞、门对战争成果的分配和奥国取得补偿的问题上俄奥两国说法不同。按俄方文本，塞尔维亚得到波斯尼亚和旧塞尔维亚一些地区，门的内哥罗得到黑塞哥维那和亚德里亚海岸一港口；奥国得到的是土属克罗地亚地区及波斯尼亚毗邻奥国的部分。按奥方文本，塞尔维亚得到波斯尼亚的德里纳河(Drina)流域，门的内哥罗得到邻近的黑塞哥维那的部分，它们还将以里姆河(Rim)为界划分处于两者之间的那片舌状地带新帕扎尔(Novibazar)；奥国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除分给塞门两国以外的几乎全部地区。在关于俄国取得补偿的问题上双方说法比较一致，即允其收回1856年失去的比萨拉比亚和得到巴统(Batum)。协定另外还规定，战争结果倘然导致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全面瓦解，保加利亚、鲁米利亚将成为独立公国(奥方文本说法是自治国，并包括阿尔巴尼亚)，色萨利、伊庇鲁斯归入希腊，君士坦丁堡成为自由市。从整个协定看，令人困惑之处一是奥国当时看来准备把新帕扎尔地区给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二是与奥方文本的说法相反，俄方文本的说法是黑塞哥维那根本没有答应给奥国，问题是奥国本身在9月份告诉德国赖希施塔特协定的内容时也未曾提及黑塞哥维那的归属。<sup>①</sup>造成这些歧异的责任双方都有。安德拉西当时在巴尔干实现领土扩张的野心方面尚未形成确定的具体意见，从而对怎样分配波黑地区才符合奥国的胃口心中无数；哥尔查科夫缺乏地理知识，这个弱点使他对会谈调

<sup>①</sup> 《德国文件》，第2卷，No. 233

整波黑边界的准确结果模糊不清。<sup>①</sup>

上述奥俄关于赖希施塔特协定两种说法的歧异反映了他们对巴尔干政策的分歧。哥尔查科夫显然希望为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方面争取比安德拉西所能给予的更多的东西。安德拉西认为假使塞门两国取胜，波斯尼亚之大部分和黑塞哥维那将落入奥匈帝国之手，而哥尔查科夫理解的却是，波黑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分配给了塞门两国，奥国得到的只是波斯尼亚的小块领土。尽管如此，奥俄两国通过这个协定达成了某些重要的妥协，俄国方面保证了奥国在塞土战争期间的中立以及它在塞门两国战败时仍旧维持其领土现状的支持，奥国方面则排除了波黑地区因塞门两国胜利而产生一个大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最重要之点是双方就奥斯曼帝国瓦解时各自得到波斯尼亚和比萨拉比亚作为相互补偿取得了实质性谅解。这是1873年兴勃隆协定精神的继续，为奥俄今后防止彼此发生战争和继续保持在三皇联盟结构下的合作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虽然德国方面当时并不知道赖希施塔特会谈的内情。

旋风，起于青萍之末。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奈韦西涅小山村发端的波黑两省起义到保加利亚恐怖事件和塞土战争，近东危机因几乎涉及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而具有了全面展开的规模。列强一次次谋求局势和平化的努力不但没有解决争端，反而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欧洲协调在此过程中由于英国拒绝柏林备忘录而宣告失败，三皇联盟却经受了考验。赖希施塔特会谈虽然笼罩着一层难以看透的雾霭，但与其说反映了奥俄关系的严酷性，不如说映现出两个盟国之间

<sup>①</sup>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175—176页。

既想同舟共济又要貌合神离的友谊。有一点至少可以断定，它们不愿在奥斯曼帝国崩溃时为瓜分其遗产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安德拉西当然想继续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但不得不对该帝国可能崩溃时面临的现实让步，赖希施塔特协定起码从纸面上把奥国邻近省份的领土预先装进了他的腰包。俄国的政策表现出有两种声音，哥尔查科夫为代表的主张与欧洲合作的路线和伊格纳切夫为代表的主张冒险政策的路线。在这两者之间，沙皇个人的意向变化经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俄国政策随着近东局势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摆动。德国对近东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是防卫性的。由于德国在土耳其没有直接利益的特殊地位，俾斯麦外交按理说可以游刃有余，但是奥俄矛盾尖锐化的危险不能不是一种严重的掣肘，俾斯麦的努力是在防止俄奥冲突引起三皇联盟的解体，保证德国在欧洲均势结构中的地位。英国已以独立的姿态表现出对近东事务的关心，传统的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立场依然被承袭了下来。德比和迪斯累里在柏林备忘录问题上保持了配合，但德比避免大国干涉、避免承担对土条约义务的倾向和迪斯累里注重英国威信与地位的倾向，表明英国并没有解决近东危机的明确计划。在危机的发展中，英国内阁能否就英国政策保持一致现在还难于判断。

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是可以预计，战争、社会舆论、欧洲各国内部决策人物和集团不同政见的争论，大国列强纵横交错的外交角逐，将给本来就已汗牛充栋的东方问题历史档案库增添更多的浩繁的卷帙，其中必然浸蕴着这次危机独有的历史特征与时代风貌。



## 第三章 战争还是和平

### 一、重建欧洲协调的努力

危机显然已经扩大。现在除了波黑两省问题外又增加了保加利亚的问题,土耳其政府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血腥镇压走向了它愿望的反面,原封不动地保持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已属不能。此外,由于塞尔维亚对土战争出师不利,米兰大公爵于8月24日向列强方面请求斡旋停火,<sup>①</sup>这就使赖希施塔特会谈奥俄议定的不干涉原则变得没有意义,并且出现了俄国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情况。战争还是和平?成了列强在此后一个阶段危机中日益关注的问题。

1876年秋季,列强的活动主要围绕着实现塞土停火及安排一次大国会议而展开,总体上来说是为了在重建欧洲协调的基础上解决争端,避免大国的军事介入。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颇给人以一种扑朔迷离的印象,但还是有线索可循。其一,

---

<sup>①</sup> K·伯恩和D·C·瓦特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机密报告与文书》第一部分,D·吉拉德编:B集,《1856—1914年的近中东》,美国,1984年版,第3卷, No. 4。以下简称《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K. Bourne and D. C. Watt edit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1, D. Gillard edited, B Series,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1856—1914)

随着俄国军事干涉近东事务倾向的加强,三皇联盟内部潜在的分歧逐渐展现出来。它们频频派出携有皇帝书信的特使互相沟通立场,可是却无法掩饰一个事实:奥俄在巴尔干利益的尖锐对立以及俾斯麦介于两者之间的微妙地位。其二,由于英俄双方进一步卷入危机,两国关系趋向复杂化。如果说前段时期英国只是蛰伏一旁窥探时机给三皇联盟以打击的话,那么此后大国争夺的中心开始由奥俄方面向英俄方面转移。英俄矛盾这时由于各种原因尚未导致激化,然而它们在近东根本对立的利益使之成为这场危机的主角。

塞土战争期间,俄国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泛斯拉夫主义群众性运动。莫斯科等地的斯拉夫委员会为塞尔维亚募捐的资金达350万卢布,奔赴塞尔维亚前线在切尔尼雅也夫将军指挥下参加战斗的志愿者将近有3000人。红十字会组织了医疗救护,教堂里祷告的主题清一色地变成了对斯拉夫兄弟早日摆脱苦难的祝福。实际上,这是泛斯拉夫主义的非官方俄国进行的一场没有政府领导的反土耳其战争,而人民群众正义的同情心与献身精神在这里得到的是一种歪曲的体现。沙皇政府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姑息态度。尽管那些斯拉夫委员会的性质总是在政府圈子中引起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他们的活动对于推进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还是有一定的实际作用,问题是只要官方俄国能够保持不与其他列强发生直接冲突。然而战争形势表明,非官方俄国的支持不足以帮助塞门方面的悬殊的军事力量战胜土耳其,塞尔维亚当时的里斯的奇内阁只是靠对俄国正规军队出面干涉的期望才勉强支撑日益恶化的战局。俄国国内要求政府对土宣战的舆论甚嚣尘上。事关俄国内部政局的稳定和在巴尔干影响的盛衰,俄国外交当局感到

巨大的压力，热米尼写道：“要么战争，要么国内混乱，这是我们所处的困境。”<sup>①</sup> 欧洲国家普遍担心，沙皇政府能否抵制这种压力而不被卷入战争。<sup>②</sup>

无独有偶。几乎与俄国泛斯拉夫运动高涨的同时，英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土耳其的舆论骚动。事情是由6月间自由党喉舌《每日新闻》披露了保加利亚屠杀事件的细节引起的，维多利亚中期那种崇尚道德操守的时尚给公众对土耳其暴行火山般爆发的愤怒提供了最好的温床。英国政府未能及时从驻土大使埃利奥特那里获得足够的可靠消息，迟迟不愿澄清真相。迪斯累里把骚动看成是自由党为倒阁而蓄意策动的一场蛊惑人心的宣传，斥之为“保加利亚无名氏引来的咖啡馆里的胡扯。”<sup>③</sup> 公众舆论和议会中反对派强烈要求政府对帕默斯顿以来的近东政策做深刻反省，批评说政府的亲土立场和掩饰态度无异于表明他们是土耳其暴戾行径的同谋。8、9月间美国领事斯凯勒和英国驻土使馆成员巴林发表的实地调查报告证实了保加利亚发生的暴行。<sup>④</sup> 格拉斯顿出版了抢手一时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恐怖与东方问题》，大声疾呼结束土耳其在波黑两省和保加利亚的统治，土耳其连同它的“坛坛罐罐”必须从被其蹂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sup>⑤</sup> 短短几个月内，民

① 查尔斯·杰拉维奇和巴巴拉·杰拉维奇编：《俄国在东方》，第20页。

② 《英国蓝皮书》，第90卷（1877年），“土耳其”第1集，No. 146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917页。

④ 《英国蓝皮书》，第90卷（1877年），“土耳其”第1集，No. 220 附录。

⑤ W·E·格拉斯顿：《保加利亚恐怖与东方问题》，伦敦，1876年版，第31页。（W. E. Gladstone, *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s in the East*）格拉斯顿的作用可参见R·T·香农：《1876年的格拉斯顿与保加利亚事件的骚动》，伦敦，1963年版。（R. T. Shannon, *Gladstone and the Bulgarian Agitation, 1876*）

间慈善机构进行了成绩可观的救援保加利亚人的工作,各种声讨土耳其罪行的集会达 500 多次。英国这场反对土耳其的舆论骚动对其近东政策不能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up>①</sup>但造成的客观效果是削弱了英国在发生俄国对土诉诸战争的情况时采取强硬干预措施的能力。德比 8 月 29 日致埃利奥特电文指出,“保加利亚事件在这里产生的反响完全摧毁了对土耳其的同情。这种情绪如此普遍地强烈,以致女王陛下政府发现,即使俄国对土宣战,英国事实上不可能作出干预”。<sup>②</sup>迪斯累里认为埃利奥特的失职行为已使政府陷于被动,现在“‘暴行’允许我们可以对土耳其政府发布号令”,希望“英国在实现停火及以后的谈判中起领导作用。”<sup>③</sup>因此英国改变了前一时期听任塞土冲突的态度,积极希望促成实现停火,避免俄国有军事干涉的借口。

参与斡旋塞土停火的主要大国是英俄,从 9 月埃利奥特奉命提议确立“不少于一个月的停火”到 10 月 31 日俄国对土耳其发出强迫停火的最后通牒,其间历时两个月。困难集中在两个方面:土耳其的顽固阻挠和列强的意见分歧。从土耳其方面来说,它在战场上已胜券在握,无意给塞尔维亚提供喘息机会。同时,土耳其 8 月 30 日刚发生过这一年的第二次政变,阿卜杜勒·哈密德苏丹的新政权很难设想会以对俄国干涉让步

---

① 由于这场骚动的影响,英国舆论在今后危机期间对政府外交政策的评价,往往不是根据其本身的功过,而是带上了浓厚的政党偏见的色彩。参见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纽约,1972 年版,第 57 页。(R. W. Seton-Watson, *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 集,第 3 卷, No. 11

③ 《迪斯累里传》,第 6 卷,第 923 页。

的政绩来开始它的统治。9月15日土耳其宣布暂停军事行动10天,但提出了显然不能被接受的实现停火的缔和条件,其中包括要塞塞尔维亚偿付战争赔款,削减军队等。<sup>①</sup>9月下旬战争行动恢复以后,土耳其又拒绝英国提出的停火条件。<sup>②</sup>这时德比已得悉俄国索麦洛可夫赴奥使命的内容,清楚知道土耳其拒和的严重后果。10月5日德比根据英国内阁意见指示埃利奥特对土耳其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把至少同意一个月的停火作为对英国停火条件的另一种选择,否则英国大使将离开君士坦丁堡,“以表明女王陛下政府再作使土耳其免遭毁灭的努力业已无用。”<sup>③</sup>于是土耳其改变策略,在10月12日提出停火五个月,以期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等待局势发生有利的变化。<sup>④</sup>从大国方面看,它们对于停火条件和期限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德比9月21日建议的停火条件是: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维持现状,波黑两省和保加利亚实行地方自治但非纳贡的公国。<sup>⑤</sup>俄国同意把英方建议作为建立未来和平的基础,但坚持停火必须是无条件的,并提出门的内哥罗因打过胜仗将来应获得领土补偿。<sup>⑥</sup>奥国附和英方建议,然而对自治主张大泼冷水,只同意把“地方自治”的含义限制在保证实施以往大国同意的改革方案的范围内。<sup>⑦</sup>在停火时间的长短问题上,彼此随着对军事形势估计的不同而不断修正,10月中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36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109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119

④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181

⑤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60

⑥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40

⑦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153

旬出现了僵持局面。英奥同意土耳其提出的五个月停火期，但俄国坚决拒绝，哥尔查科夫认为这是埃利奥特在背后作祟，通知舒瓦洛夫“我们已不再为达成一致意见作出让步。”<sup>①</sup>最后是战场形势的突变结束了僵局。10月29日土耳其将领奥斯曼帕夏重创塞军和俄国志愿军，占据了迪尤尼斯(Djunis)高地，摩拉瓦(morava)谷地无险可守，贝尔格莱德告急。10月31日伊格纳切夫奉命向土耳其政府递交最后通牒，限其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同意实现为期六周至两个月的停火，不然俄国就宣布断绝外交关系。<sup>②</sup>土耳其政府只得放弃自己的停火条件，接受了俄国的要求。

同在迫使土耳其接受停火的问题上和英国所做的合作相比，哥尔查科夫对德奥两个盟国同一时期所进行的交涉更能体现出俄国政策转变的方向。这种转变是当时在利瓦吉亚的沙皇政府政治气候的一种反映，韦尔德电报向德皇提出的问题 and 索麦洛可夫使命给奥皇带去的建议便是在那里决定的。

克里米亚南岸的利瓦吉亚倚山临海，风景秀丽，柑橘林间掩映着俄国皇室避暑用的宫邸。自沙皇9月9日从华沙抵此羁留后的两个月内，这个偏处帝国一隅的角落便成了官方俄国的政治活动的中心，而圣彼得堡的外交部宛如一所邮局，剩下吉斯在那里主持部务和负责文件信息的传递。利瓦吉亚弥漫的是一种好战气氛，俄国的宫廷重臣和政府要员聚集在这里讨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巴尔干消息比西方消息到得早但令人沮丧，泛斯拉夫主义的支持者增加了对沙皇的影响力，

①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5.6)，No. 85

② 《英国蓝皮书》，第90卷(1877年)，“土耳其”第1集，No. 989

其中包括皇储和驻土大使伊格纳切夫。10月15日大臣会议做出决定,俄国南部军区四个兵团将进入战争动员,沙皇兄弟尼古拉大公出任未来巴尔干战区的总司令;如果一切和平努力都宣告失败的话,俄国不惜以战争捍卫其在巴尔干的利益。当沙皇离开利瓦吉亚返圣彼得堡途中11月11日在莫斯科发表公开演说时,他已把“国家的荣誉”和“斯拉夫事业”联系在一起作为俄国“要完成的神圣使命。”<sup>①</sup> 哥尔查科夫的欧洲外交路线在此期间走上了推行一项更为强硬的巴尔干政策的轨道。他10月17日致书吉尔斯,“决定已做出。我们的主张将继续是公正和温和的,但我们决定不再满足于改善基督徒命运的贫乏的空话。”<sup>②</sup> 英国暂时看来比较愿意妥协,格拉斯顿自由党搅起的舆论风雷瓦解了那里的亲土立场,俄国此时必须弄清楚它的两个盟国究竟能允许它在巴尔干有多大的行动自由,以便即使战争爆发也可保证外交上的有利地位。

俄国通过德国驻俄军事代办韦尔德10月1日给德皇的电报内容是:沙皇急切地想知道,如果形势严重到发生对奥战争,俄国是否可以获得像1870年时俄国对德国那样的支持,请立即回答。<sup>③</sup> 这个事件对于俾斯麦来说可以说是他安排曼托伊费尔使命所带来的一颗意想不到的苦果。俾斯麦曾在8月间拒绝了哥尔查科夫的一项提议:请德国出面主持一次欧洲会议讨论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方案。俾斯麦认为俄国的提议等于是把他擦到炉子上烤,欧洲会议只能以俄、奥、英分歧的

①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518—2519页。

② 查尔斯·杰拉维奇和巴巴拉·杰拉维奇编:《俄国在东方》,第31页。

③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39

公开化而告终,任何一方都将怪罪他不能给予充分的支持。<sup>①</sup>但俾斯麦生怕哥尔查科夫利用此事对沙皇施加不利的影  
响,决定派与沙皇宫廷交谊笃深的曼托伊费尔将军去见9月初在  
华沙参观军事演习的沙皇,以拢络感情。曼托伊费尔在华沙向  
沙皇递交了德皇信件,表示德国的政策将始终为对俄国1864  
—1870年期间的友好态度的回忆所支配。哥尔查科夫趁机顺  
水推舟,提出了对德国的要求。他说,“俄国有决心保持三皇联  
盟,但俄国迄今在所有与奥国的谈判中均做了让步而情形并  
没得到改善。”“如果德国以某种明确的方式支持俄国的观点,  
奥国将会与俄国一致行动。”<sup>②</sup>沙皇给德皇的复信则强调,俄  
国愿与其他列强就实现近东和平达成一致意见,但也可能“被  
迫采取单独的立场。”<sup>③</sup>事后,俄国驻德使馆就上述问题向德  
国方面进行交涉,但俾斯麦避而不答,坚持说按他理解沙皇复  
信中“单独的立场”只是指的对土战争。俾斯麦也许是钻了外  
交词令的空子,然而,如果不是他装痴就是曼托伊费尔没有准  
确传递俄国意图,华沙会见俄方的想法明显是,沙皇需要德国  
就俄奥之间在寻求解决近东争端时发生分歧的情况明确表  
态。现在,利瓦吉亚的官方俄国借用韦尔德的渠道索性挑明了  
俾斯麦所讳莫如深的问题:德国究竟在奥俄之间选择谁支持  
谁。很清楚,俄国并不以德国柏拉图式的友谊表白为满足,俾  
斯麦碰上了他外交生涯中这道始终想回避但又回避不了的难  
题。

①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28

②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31

③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32



俾斯麦此时知道奥俄正在谈判并已有赖希施塔特的妥协,认为俄国要求德国表态这个态是哥尔查科夫的诡计,“如果我们答‘否’,他便会在亚历山大皇帝面前制造不满;如果我们答‘是’,他就可在维也纳挑拨关系。”<sup>①</sup>拖了几周,俾斯麦才让刚好要返俄履任的德国驻俄大使施魏尼茨带去了对沙皇问题的口头答复,其要旨是:德国不能抽象地讨论对奥战争的问题,但将竭力防止俄奥决裂。万一这种决裂无法避免时,德国没有理由放弃中立。俄奥中任何一方受到严重损害而危及其作为独立大国在欧洲协调中的地位都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如果大国合作失败而发生俄土战争,德国将设法努力保持奥国和英国的中立。<sup>②</sup>

施魏尼茨于10月底抵利瓦吉亚,他与哥尔查科夫的交涉进行得并不轻松。俄国首相认为他没有带来俄国所期待的东西,俾斯麦应当向全世界宣布俄国有权受欧洲的委托来结束巴尔干那种不堪容忍的情况。施魏尼茨谨慎地提到,俄国若以条约形式保证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或许可以换取德国在东方的全部支持。哥尔查科夫的回答是冷嘲式的:“如今时代条约已无多大价值,德国要它何有之用?”<sup>③</sup>这段史实后来曾被俾斯麦用来证明,正是哥尔查科夫拒绝了德国建议缔结一项条约“全心全意”支持俄国的良好愿意。实际上这是无稽之谈。俾斯麦压根没想要和俄国搞一个条约反奥,也明知哥尔查科夫不会和德国搞一个条约反法。据施魏尼茨的回忆,俾斯麦并

①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40

②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51

③ B·H·萨姆纳:《俄国在巴尔干》,第222页。

未授权他与俄国缔结一项正式条约，只是暗示可以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作为对俄国的一种要价。<sup>①</sup>既然俄国不能在阿洛问题上给以保证，那就请君莫谈德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无条件支持。德国真诚希望帮助俄国实现在近东的利益，但俄国不能与奥国发生冲突。俾斯麦这种进两步守一步的策略实质上是绕开了韦尔德电报中那个咄咄逼人的问题。俄国的不满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俄国本意非在对奥战争，问题被提到这样尖锐的程度，主要是想表明俄国对于危机抱有坚定不移的立场，迫使俾斯麦表态向俄国一边倒，这样奥国便不得不俯就俄国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方案了。俄国从俾斯麦的保留态度得出的印象加强了原来的想法：必须与奥国就已经改变的形势达成某种安排。

俄国对奥国的交涉是与对德交涉同时进行的。9月26日索麦洛可夫出使维也纳，带去了沙皇给奥皇的一项建议。俄国认为奥俄两国协调行动阻止巴尔干危机复杂化的时刻已经到来，赖希施塔特的合作必须发展，为此建议：如果土耳其拒绝英国的停火和平条件，奥俄两国分别对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同时实行军事占领，列强以保护基督徒为名共同派军舰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逼迫君士坦丁堡政府接受欧洲的决定。<sup>②</sup>索麦洛可夫使命没有成功，之后两国皇帝继续通过书信就俄国建议交换意见。奥国虽同意海上示威这一条，但完全不能接受和俄国合作军事干涉的立场。在奥国看来，赖希施塔特协定并

<sup>①</sup> W·N·梅特利科特和D·K·科文内编：《俾斯麦与欧洲》（文件集），第99页。

<sup>②</sup>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5.6），No.79

未预期过大国军事占领的情况，它势必造成巴尔干其他地区的动荡和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再者，如果说波斯尼亚曾被认为是长期占领的话，俄国现在把保加利亚与波斯尼亚相提并论，是否暗示俄国企图长期占领多瑙河右岸呢？尽管如此，奥国还是表示它不对俄国的对土行动设置障碍，但希望和俄国按赖希施塔特会谈的精神谈判一项条约以保护奥国的利益。其实俄国抛出波斯尼亚这块馅饼对奥国特别是它的军方应该说是具有相当引诱力的。<sup>①</sup>奥国虽不想由自己采取主动行动来促使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但也决不肯坐视俄国军队进入土耳其而自己一无所获。安德拉西的政策不是一种大手大脚扩张的政策，而是在抑制俄国的过程中不漏掉可能的机会实现扩张的政策。

10月初索麦洛可夫离开奥国后，安德拉西立即派明希前往瓦尔辛，探询俾斯麦对俄国建议及奥俄分歧的态度。据明希10月8日给安德拉西的报告，俾斯麦在会见中谈话的大意是：一，德国不反对俄国的建议。如果俄国进入保加利亚，奥国应迅速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是在土耳其那个地区确立稳定秩序的“唯一办法”。保加利亚的占领用不着担心，英国不会同意；奥国可找英国帮忙，但不要卷入英俄对立。二，德国反对并将阻止奥俄冲突。德国没有同意最近韦尔德电报中俄国的要求是由于它的“反奥倾向”，德国不能赞成明希在会见中提议的建立德奥同盟的想法是由于它含有“反俄倾向”，虽然并不绝对排除在遥远将来德奥之间缔结一个“有机同盟”的可能性。德国只能把话说到这里，奥国不要指望更多的东西

<sup>①</sup>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93

了。<sup>①</sup>明希使命没有使俾斯麦离开他对奥俄关系的保留立场，奥国同样没有得到像俄国对德国所要求的那种支持，但是俾斯麦鼓励奥国在不与俄国反目的情况下攫取巴尔干领土的做法，对于巩固安德拉西的国内地位以及增强奥国在巴尔干的势力是完全有利的。毕竟俄国的人力资源和辽阔幅员使其在战争中有较多的回旋余地，而奥匈帝国的多元结构很难说经得起大的战争的折腾。在俾斯麦看来，正如9月底他同德国驻法大使霍恩劳埃谈话时私下表示的：“有了奥国，我们便能够抑制俄国：如果奥国占下风，俄国对我们就是危险。”<sup>②</sup>

英俄关系在俄国索麦洛可夫使命后出现了紧张气氛，英国政府怀疑俄国并无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诚意。<sup>③</sup>俄国建议及种种表明战争意向的迹象是否想使它已同意过的英国9月21日停火和平条件无法实现？而关于军事占领保加利亚的要求，是否又意味着俄国企图觊觎仅咫尺之遥的君士坦丁堡。迪斯累里极力鼓动他的内阁采取强硬的对俄政策。他认为，当初阿伯丁（1852—1855年任英国首相）如果决不让步，沙皇未必敢迈出使克里米亚战争不可避免的步骤；俄国现在以为格拉斯顿骚动已瓦解英国军事干涉的能力，企图趁机侵略土耳其和占领君士坦丁堡，因此，英国利益和近东和平的维持都系在英国威胁进行干涉的可信程度。<sup>④</sup>迪斯累里派了陆军部官员

① 引自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 199—200 页。

② 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 203 页。

③ 哥尔查科夫把沙皇致奥皇信中的建议内容告知英国政府，是一次破例的外交行动，但遭英国政府拒绝。见《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 集，No. 113

④ R·布莱克：《迪斯累里》，伦敦，1966 年版，第 607 页。（R. Blake, *Disraeli*）

去海峡地区勘察军事地形为今后采取必要的行动作准备；并在11月上旬于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英国随时准备为正义事业而战。<sup>①</sup> 社会舆论此时变换了方向，虽然反土骚动余绪未尽，但恐俄反俄的调子高涨起来，有关彼得大帝遗书和俄国入侵印度的流言不胫而走，俄国建议中对保加利亚的占领则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保加利亚恐怖。”<sup>②</sup> 不可否认，英国这种反俄情绪里积淀着英俄在近东地区长期对立所沿袭下来的心理因素，但它确实反映了英国当时一种普遍的担心：俄国侵占君士坦丁堡及其对英帝国利益和威信带来的后果。此中原因可从迪斯累里10月23日与巴林顿勋爵的那番谈话得到解释。大意是：俄国如控制君士坦丁堡，就能直接由叙利亚到达尼罗河口，切断经埃及通往印度的海路，英国纵有制海权也不起作用，“我们的力量是在海上。印度的钥匙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sup>③</sup>

如果说俄国由于对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所谓像“一群乌鸦般”的表现感到失望而增加了对保加利亚的兴趣，或者说俄国企图通过保加利亚增加对君士坦丁堡地区的威胁力与控制力都是实情的话，那么俄国马上要占领君士坦丁堡则未必是事实。哥尔查科夫在11月3日致舒瓦洛夫信中说，“对于俄国的利益来说，事情唯一合理的状态是把黑海的钥匙留在弱者手里，以便俄国的这条商业通道不被关闭，俄国的安全不受威胁。土耳其的统治提供了这样的需要。”<sup>④</sup> 从俄国当时没有黑

①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964页。

②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951页。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956页。

④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5.6)，No. 91

海舰队的情况考虑,哥尔查科夫所说的倒不完全是辩白。对于英国的指责,哥尔查科夫抨击说那是编造出来的“荒诞故事”、“政治谰语”,然而不得不承认“克服英国的偏见”“是一件超出人力所能及的工作。”<sup>①</sup>哥尔查科夫感到安慰的是德奥两个盟国还不至被英国拉过去结成敌对的反俄联合,可问题是英国可以利用“那个偏袒土耳其人的巴黎条约所形成的习惯力量,即规定在东方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须先得到六大国的同意。”<sup>②</sup>为了澄清俄国的立场,沙皇11月2日在会见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斯时作了这样的保证:俄国绝无占领君士坦丁堡和进行领土扩张的想法;如果情况迫使要占领保加利亚,那也是暂时的,目的在保障基督徒的安全。沙皇重申同意把英国停火条件作为大国讨论实现近东和平的基础,但如果其他大国不能下决心采取有效步骤结束目前状况的话,俄国不得不独立行动。<sup>③</sup>

沙皇提供的保证以及土耳其接受俄国10月31日最后通牒所出现的停火形势,给英国正式建议召开一次欧洲大国会议造成了机会。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不主张用威胁干涉的手段干扰停火、加剧紧张局势,他希望通过对土耳其在叛乱地区的主权统治加以必要的限制来改善那里基督徒的状况,以避免俄国找到单独占领或进行战争的口实。11月4日德比经内阁批准发出了会议邀请,欧洲各大国政府可指派两名全权代表参加预期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大使级会议。英国的邀请通告

①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5.6),No. 92

②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5.6),No. 92

③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506—2512页。

宣布，“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各国不谋求领土利益”为会议的基础，各大国代表和土耳其政府将签署一份议定书来保证塞门两国维持现状、波黑两省和保加利亚实行地方自治或行政自治。<sup>①</sup> 英国的提议得到了欧洲各大国政府的同意。<sup>②</sup> 土耳其政府在英国警告下于 11 月 18 日被迫接受会议。

当英俄关系紧张的时候，迪斯累里在 10 月曾催促德比谋求与德国建立一个“维持现状的联盟”。他认为俾斯麦为了免除英法结盟之忧未必不肯同意，而俄国的战车则可借俾斯麦的阻挠在悬崖前勒马。<sup>③</sup> 德比于此并不积极，觉得俾斯麦“对看到英俄争吵或许不会感到遗憾”，仅指示拉塞尔去了解俾斯麦关于解决危机的看法。<sup>④</sup> 但这个时期俾斯麦的态度与年初已大有变化。如果那时俾斯麦尚想利用英国的立场维持近东和平的话，那么在目前危机由于英俄奥三大国的卷入而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他倒情愿让他所不宜反对的俄国对土战争来廓清混乱的形势。从《德国文件》中辑的材料来看，俾斯麦此时的近东和平立场已具体化到仅局限在欧洲列强之间不发生战争，即他所谓的，整个奥斯曼帝国不值得欧洲文明国家为了维护它的存在而互相残杀，毁灭自己。11 月 9 日的备忘录中明确说，“沙皇对土战争于我们无害。如果他被允许不受阻

①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 4 卷，第 2516—2517 页。

② 俄国一度要求把英国通告中“领土”一词从“完整”前删掉，以防止与它认为必要的军事占领措施相抵触，但随即放弃。见《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 集，第 3 卷，No. 329

③ 《迪斯累里传》，第 6 卷，第 953 页。

④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 2 集，第 2 卷，第 492 页。

挠地进行的话,这符合普遍和平的利益。”<sup>①</sup>他认为东方问题的解决要靠有冲突利益的大国彼此作出让步,途径是瓜分奥斯曼帝国;否则他“不相信人类的智慧能发明一个公式来防止那些竞争的力量最终不聚集在一起碰撞。”<sup>②</sup>他的10月20日备忘录为危机的出路设计了一幅自称是“富有想象力”的前景,这就是那个著名的瓜分土耳其的方案。其中谈到,如果俄国进入对土战争,其他大国明智的做法是保持中立,奥国占领波斯尼亚,英国占领埃及,并与俄国就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达成某种仍在奥斯曼帝国主权下的安排。俄国希望得到的是比萨拉比亚。英法若在埃及问题有争执,可让法国取得叙利亚来克服。他并不认为英国会与法国结盟,帮助征服阿尔萨斯、洛林。<sup>③</sup>拉塞尔从俾斯麦那里获得的印象是,他现在转向俄国“这个正升起的太阳”,想通过俄国对土战争来为瓜分奥斯曼帝国、获得东方问题的持久解决开辟道路。<sup>④</sup>由此可见,无论在俄国对土战争或者在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这两个大问题上,俾斯麦与英国的立场大相径庭。换言之,无交易可做。英国不可捞到一个“维持现状的联盟”。

俾斯麦在近东危机期间并不始终起着一种类似导演式的积极作用。应该看到,近东危机的发展是各种客观存在的力量和因素交错影响、相互推动的结果,德国所起的作用不能脱离它本身占有的位置来判断。俾斯麦的外交努力主要表现在不

①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56

②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50

③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50

④ 见 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224页。



使德国卷入大国在近东的对立。俄、奥、英三国的要求之所以都未被接受,并非是他的恶意,而是他既想保持与任何一方的友谊,又不愿被任何一方所束缚,为他们去火中取栗。在俾斯麦给明斯特(德国驻英大使)和施魏尼茨的指示中多次出现近东问题“不是我们的事情”的指示。12月5日他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谈到,“在所有那些传闻中,只存在一颗真理,而总是有一大堆谬误。我要说的是:只要我看不到德国的利益,我就不会建议德国积极加入到那些事情中去(按:指近东),原谅我说句粗话,它不值得牺牲一个波美拉尼亚步兵健康的血肉之躯。”<sup>①</sup>这里应附带指出,后一句话通常被孤立地作了歪曲的理解,俾斯麦的原意不是说近东问题不屑一顾,而是想说明德国的利益并不在积极卷入因近东问题而引起的大国纠纷中去。当然,事物是有多面性的,这完全不等于认为俾斯麦外交在搞无为而治,恰恰相反,他的保留态度实质上是企图在近东大国纠纷的边缘为德国保持必要的行动自由。他坚持三皇联盟的框架而拒绝在奥俄之间作选择,他希望英国能支持奥国在巴尔干扩张领土而不愿自己与俄国顶撞,他赞成俄国的对土战争而又极力防止俄奥冲突和避免英俄冲突等,无不与此有密切的联系。俾斯麦在12月1日德国国会的午餐会上对他的态度作过一番解释。他预计近东争端发展有三个阶段:俄土战争、英国卷入、俄奥冲突,而只有在第三阶段时德国才会放弃保留,奥匈帝国的完整是欧洲的需要,德国不能允许它受到

<sup>①</sup> W·N·梅特利科特和D·K·科文内编:《俾斯麦与欧洲》(文件集),第99—100页。

致命的伤害。<sup>①</sup>可见俾斯麦对有关大国的保留,并不是一种等距离外交,而是相对的,有一定限度的。尽管他绝不希望奥俄发生冲突,但一旦这种冲突变成现实时,他是决心保持安德拉西的奥国这根被称为“欧洲安全的柱子”的。俾斯麦保留态度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削弱俄国与法国结盟的可能性,因为当英奥俄三国为自己的利益所驱使陷入近东泥潭时,俄国不能没有德国的友谊。至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德国政策本身蕴含的歧向因素是否允许俾斯麦做到这一点,或者说俾斯麦能够做到怎样的程度,那是另一回事。

现在,近东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系决定于君士坦丁堡会议是否能获致成功。然而俾斯麦感到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俄国人的地位正象预订了一客牛排的顾主,虽然食欲也许已经消退,但因为付过帐仍要去用膳一样。<sup>②</sup>

## 二、君士坦丁堡会议、布达佩斯条约及其他

从君士坦丁堡会议到俄土战争前夕的大国关系发展表明,列强没有能力调和它们的矛盾,欧洲协调流于形式。列强之间的深刻分歧,使土耳其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任何来自大国方面损害其主权利益的安排,君士坦丁堡会议上的英俄方案和1877年3月的伦敦六国议定书,某种程度上是为俄土战争开了绿灯。俄国在此期间完成了战争的外交准备,主要是与奥国签订了布达佩斯条约。德国1877年初德法关系紧张时关于

①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120页。

② W·L·兰格:《欧洲的同盟与阵线》,第105页。

英德联盟谅解的建议,不仅没有使英俄分离,反而在国际局势中增长了姑息俄国的因素,尽管英俄分歧依然如故。最后,欧洲不得不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由俄国和土耳其在战场上决定鹿死谁手。

1876年12月至1877年1月,列强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使级会议,力图再次以欧洲协调的方式寻求解决危机的出路。然而欧洲普遍对会议前途不抱信心,上述11月间迪斯累里和沙皇几乎不约而同在伦敦市政厅和莫斯科发表的演说已烘托出作为会议背景的英俄对立的气氛。概括地说,会议获致成功的条件取决于两点,一是欧洲列强是否能够就改善土耳其基督徒命运的安排达成一个统一的方案,二是这个方案是否能够得到已在塞土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土耳其的同意。从12月11日至22日是预备会议的阶段,英俄两国首席代表索尔兹伯里和伊格纳切夫奇迹般地在保加利亚这个引起主要争执的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从而使欧洲列强有了一个能向土耳其政府递交的不可再降格的方案。可是会议在12月23日进入正式阶段后出现了障碍。土耳其政府颁布了一部宪法并借此拒绝接受它被排除参加的预备会议讨论的结果,列强方面又无法采取有效的统一行动来强制土耳其接受,特别是英国外交本身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严重的不一致。1月20日,会议终以各大国暂时撤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作为对土耳其政府的抗议而告破裂。

英国政府给索尔兹伯里(印度事务大臣)参加会议的指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指出英国“不能同意把外国军队引入土耳其领土(按:指军事占领)的意见当作会议的建议,尽管这些意见是有理的或动机良好的”,另一方面又表示土耳其政府必须

懂得“英国决不会认同任何弊政和压迫，如果土耳其固执地反对现在正在做出的将把奥斯曼帝国置于一个更为安全的基础之上的努力，苏丹政府将承担其全部后果。”<sup>①</sup>君士坦丁堡会议的谈判，是索尔兹伯里要做的第一篇重要外交文章，后来他掌握英国外交大权近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索尔兹伯里于12月5日抵达君士坦丁堡，他向国内报告了途中访问欧洲大陆的印象：土耳其在那里缺乏朋友，“它的末日即将来临”；德奥表现出“一种伙伴关系”，他们考虑较多的是会议失败后的事情。俾斯麦依然津津乐道他的瓜分土耳其办法，并认为沙皇既已承诺不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就不必过早卷入，如俄国蓄意那样做，英国在俄军渡过多瑙河后仍有充裕时间与俄国谈判。安德拉西则十分关心英国在反俄方面会走得多远，他担忧俄国如果积聚力量把对土战争拖到二年以后再进行的话，情况就更糟糕，奥国在必要时打算占领波斯尼亚。<sup>②</sup>索尔兹伯里本人对前段危机的看法在一封给迪斯累里的信中有充分表述，他写道：“我们和平解决这些困难的最好机会是与俄国达成一项早期谅解。危险是在我们总跟着奥国的大衣后摆走路，以致这一种结果不可能产生。奥国有充分理由抵制任何关于叛乱省份设立自治政府的哪怕是最胆怯的建议，因为奥国南部如被一连串俄国卫星国围绕的话，它的存在将受到威胁。但它的存在对我们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奥国在欧洲的作用已不存在。它曾经是对法国的一种平衡和抵制俄国的一道屏障，但是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373

②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伦敦，1921年版，第2卷，第107页，第96—97页，第100—103页。下简称《索尔兹伯里传》。（Lady Gwendolen 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法国已沉沦，俄国的发展主要在奥国所不能反对的地区。因之，我们没有理由要分担奥国的恐惧；如果能从俄国获得合适的条件，而我们因为这些条件不合奥国胃口加以拒绝，那是最不聪明的。”<sup>①</sup> 索尔兹伯里对自己这次使命不持乐观态度，认为会议成功“现实性”不大，“怀疑俄国是否会对土耳其能被指望答应条件感到满足”<sup>②</sup>。同时他作为外交代表，不得不遵循本国政府那个模棱两可的指令，但他不想使英国回到克里米亚战争时代的政策，而力图与俄国在会议上达成某种改善基督徒地位的谅解，以避免战争。

俄国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出非常愿意与英国取得谅解的姿态。俄方首席代表伊格纳切夫曾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包括军事占领内容的最高方案，一个是仅保证保加利亚自治的最低方案。哥尔查可夫 11 月 24 日给伊格纳切夫的电报揭示了俄国妥协姿态的内在原因。他指示伊格纳切夫，先提出最高方案，若遭强烈反对就抛出最低方案，若索尔兹伯里或其他大国提出了与俄国意见不同的建议，可以“有待请示”为理由速告圣彼得堡决定，这样利于给列强留下俄国并不想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会议的“好印象”。“即便只通过了最低纲领，也是一个伟大的成果。它省得我们去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冒险性，而且将从根本上给我们的财政状况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我们能够既避免战争又不使帝国的荣誉与尊严受到影响，我将鼓掌欢迎，我们的国家则幸甚！”<sup>③</sup> 这表明俄

① 《迪斯累里传》，第 6 卷，第 940—941 页。

②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 2 卷，第 90 页。

③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 4 卷（1925. 12），No. 125

国作了两手准备,首先是力争与英国或其他大国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危机的谅解,但如果这种办法证明不行,便企图为对土耳其战争造就一个阻力最小的国际环境。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对俄国的策略说得相当透彻:英俄如能就土耳其改革的有关问题达成统一意见,那么当土耳其拒绝时,英国就“在道义上”被剥夺了公开反对俄国的“权利”,俄国就在事实上具有了一种解决土耳其事务的委托权。因此土耳其拒绝的可能性越是被确信,俄国的利益越是要要求在谈判中采取妥协态度。<sup>①</sup>这一点解释了伊格纳切夫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与索尔兹伯里保持合作的现象。

预备会议讨论的重点是保加利亚的组织体制问题,分歧是在保加利亚的范围以及是否使用外国军队来保证改革实施上面。开始时,伊格纳切夫提议建立一个自治的大保加利亚,范围从黑海附近布尔加斯,南面到爱琴海沿岸的杰贾加赫地区,西面到奥赫里德湖与尼西地区。索尔兹伯里表示反对:这个斯拉夫因素控制的大保加利亚由于占有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实质上“独立于土耳其政府”。他建议按经度纵向划分保加利亚为东西两部分(双省制方案),南部的界限则从爱琴海沿岸向北移至阿德里安堡—莫纳斯提尔(Monastir)一线,东保加利亚“应保持在非斯拉夫人手里”,从而形成一道抵挡侵略的屏障,它将包括多瑙河低洼流域之大部、黑海沿岸、巴尔干山脉重要隘口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sup>②</sup>伊格纳切夫在保加利亚范围上作了让步,但成功地使英国同意使用一支外

<sup>①</sup>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5.12),No.105

<sup>②</sup> 《英国蓝皮书》,第91卷(1877年)，“土耳其”第2集, No.167

国警察部队,以支持由欧洲委员会督导下的保加利亚自治性改革,不过该部队排除使用俄国军事力量而建议由比利时担任。关于塞门两国与土耳其的停火问题和波黑两省的地位问题,没有出现多大困难。会议建议塞门两国与土耳其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缔结和平,但塞尔维亚得到马里兹沃尼克(Mali Zvornik),门的内哥罗得到黑塞哥维那部分地区及在波亚纳河(Bejana)与斯库塔里湖(Skutari)的通航权。波黑两省合并为一省,由土耳其政府经大国同意任命总督治理,每任为期五年;设地方警察部队,由当地穆斯林和基督徒按人口比例组成;该省收入的70%用于地方投资。<sup>①</sup>

预备会议达成的结果虽然与俄国最高方案相距甚远,但保证了保加利亚的自治,值得伊格纳切夫夸耀的是现已有了一个欧洲共同的“作品”,事情发展的方向对加强俄国外交地位是有利的。对于英国来说,它自然乐意看到有一项暂时的解决办法来驱散俄国战争危险的阴影,但正像索尔兹伯里现在所相信的,麻烦倒并不在俄国方面,而是在土耳其方面。<sup>②</sup> 索尔兹伯里希望与俄国联合采取严厉的强迫措施使土耳其政府接受预备会议的方案,但是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英国出席会议的第二代表、驻土大使埃利奥特的亲土立场和英国政府的矛盾态度瓦解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埃利奥特是帕默斯顿政策的信奉者,观念上把支持奥斯曼帝国和维护英国利益两者视为一体。他反对索尔兹伯里向

<sup>①</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526—2530页。

<sup>②</sup>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22页。

伊格纳切夫作妥协,认为会议给俄国侵略土耳其涂上了一层欧洲集体意志的保护色,批评大国的建议是“不可能的要求”,“如果土耳其同意,这将起到长期削弱土耳其的效果;如果土耳其拒绝,这就给俄国提供一个宣战的极好借口。”<sup>①</sup>索尔兹伯里写道,埃利奥特同情土耳其和反对大国建议的立场使土耳其政府感到英国大使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只要埃利奥特留在这里,他与土耳其交涉所具有力量几乎等于零。”<sup>②</sup>英国国内政府在对土耳其施加何种压力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意见,迪斯累里在12月22日内阁会议上克服了主张采取强迫性措施的内阁成员的反,通过了一项给索尔兹伯里的新的指令。指令一面要求警告土耳其政府不要奢望英国会在俄土战争中给它以支持,一面明确指出英国绝不参加或支持任何反土耳其政府的强迫性军事措施。<sup>③</sup>这无疑索尔兹伯里的一道紧箍咒。其实,迪斯累里手里并不缺乏表明俄国策略的证据,但没有能完全准确地解释它。俄国需要时间等待外交努力的结果,同时军队在冬季越过冰封的巴尔干山脉又困难重重,因此如果对土战争不能避免,俄国也无意在4月1日前打仗。当索尔兹伯里将此信息通知国内政府时,迪斯累里的理解是俄国正在从通往战争的道路上“退却”,它过去的大吹大擂使自己落到了这般境地,土耳其看来决心要“迫使沙皇收回自己的话”。迪斯累里原来考虑索尔兹伯里作为英国与会的首席代表是能使土耳其人按英国节拍走路的合适人选,现在感到

<sup>①</sup> H·埃利奥特:《外交演变的过程及其它的有关经历》,伦敦,1922年版,第277页。(H. Elliot, *Some Revolutions and other Diplomatic Experiences*)

<sup>②</sup>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18—119页。

<sup>③</sup> 《英国蓝皮书》,第91卷(1877)，“土耳其”第2集, No. 78



他“受了伊格纳切夫的骗”，“不必要的去威吓土耳其”，“并不知道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主要目的是不让俄国在土耳其得势，而不是为土属基督徒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sup>①</sup> 索尔兹伯里曾请示国内召回埃利奥特，但为迪斯累里所阻。按理说，为了保证会议的成功和英国与会代表立场的一致，英国政府是应该让埃利奥特回国的。

土耳其的性格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冷漠得可以任意塑造。12月23日正式会议开幕的那一天，与会的大国代表被寒风凄雨中传来的礼炮的轰鸣声所困扰。土耳其代表、外交大臣萨菲特帕夏当即解释苏丹陛下已颁布了一部造福于其全体臣民的宪法，奥斯曼帝国通过这一壮举改变了六百年之久的政体而出现了新时代的曙光。该宪法第一条便宣布“奥斯曼帝国是由现有的领土、领地和半独立省份构成的，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借口被分离出去。”<sup>②</sup> 土耳其此举表明：它根本无意接受列强的建议，既然苏丹陛下在宪法中已赐予了一切必要的权利和改革，君士坦丁堡会议的工作便已变得多余。大国方面在无法采取统一的强迫性措施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会议破产所能做的只好是进一步降低建议条件。伊格纳切夫则尽量设法保住会议有一个共同方案，而不管内容一削再削。列强最后向土耳其提交的方案甚至取消了使用外国警察部队的内容，并且同意暂不规定欧洲委员会督导工作的细则。1月18日，土耳其召开全国贵族代表会议，

<sup>①</sup>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982—983页。迪斯累里对埃利奥特并无好感，认为他没有足够的魄力迫使土耳其政府做英国所希望它做的事。

<sup>②</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532页。

一致表示“宁可光荣死，不愿屈辱生”，断然拒绝大国方案。<sup>①</sup>

土耳其之所以拒绝，一方面是由于民族主义的要求。列强在该帝国首都讨论决定其内部事务，被视为是对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冒犯，引起举国愤恨。<sup>②</sup> 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的态度。土耳其深知大国对土耳其改革的立场相殊甚远，此时颁布宪法能起到分化列强、特别是防止英俄联合施加压力的作用。他们认为俄国一再降低要求是表明其“软弱”，它未必敢冒英国和其他列强之大不韪贸然发动战争。虽然英国代表索尔兹伯里和埃利奥特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但土耳其相信埃利奥特代表了英国政府的真正声音，即使发生俄土战争，英国也不会遗弃他们。<sup>③</sup> 正如米哈特帕夏所说的：“土耳其并非不知道英国政府对它的态度，英国内阁曾明确宣布不干预争端”，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欧洲普遍利益和英国特殊利益是紧密地和我们与俄国之间的争端联系在一起的，……英国避免干预这次东方争端迟早是不可能的。”<sup>④</sup> 应该指出，英国政策的两面性给土耳其挫败君士坦丁堡会议以可乘之机。

在欧洲不能使土耳其接受大国方案之际，俄国却秘密地获致与奥国缔结了布达佩斯条约，这使俄国在发生对土战争时不必担心奥国的反对。奥国在1876年10月索麦洛可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485

② 米哈特帕夏于12月19日出任大宗宰，他所苦心经营的宪法虽然仍是一个套用西方模式治标不治本的东西，但反映了民族主义的要求。R·H·戴维林《1856—1876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第10章第358—408页对此有出色的讨论。

③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23页。

④ 引自W·L·兰格：《欧洲的同盟与阵线》，第107—108页。

夫赴奥时拒绝了俄国关于两国同时对土耳其实行军事占领的邀请，但奥皇暗示可以进行谈判，如果俄国按赖希施塔特协定精神保证奥国的利益，俄国或可在对土战争方面获得一定的行动自由。对奥国来说，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奥国虽然想维持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现状，但它不可能为此而与俄国作战，除非它准备放弃对其边界内外斯拉夫世界的整个影响。奥国的外交地位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维也纳相信，只要威廉皇帝活着，就不会有机会赢得德国的全部支持去反对由他外甥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统治的俄国；俾斯麦坚持的是奥俄在牺牲土耳其利益基础上的妥协。法国只是在一味地讨好俄国。英国只要不是为了君士坦丁堡，其可答应承诺极其有限，未必能给奥国在巴尔干的实际利益带来多少收益。在奥国内部，军方首脑奥尔布雷克特大公和贝克元帅怀疑柏林而倾向圣彼得堡，他们并不愿意对俄国作战，而希望能与俄国一道瓜分巴尔干势力范围。如拿破仑时代发生过的那样，一场对俄国的战争必然是长期的，奥国的军事能力及弱点不能够支持这样的战争。他们在11月呈递奥皇的备忘录中主张尽可能地避免对俄战争，“奥国作为一个半面被包围、离俄国最近的邻国，不能像西方大国一样可以在适当的时机立即退出战争，而必然是首当其冲。奥国应把全部力量保存到最后，那时手中才会有主动权。”<sup>①</sup>安德拉西则不仅因为对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不可取，而且感到任何战争都可能使军方得势，给恢复哈布斯堡威信、损害匈牙利在二元帝国的特权地位提供机会。因此他的对策是在不鼓励俄国对土战争的同

<sup>①</sup> F·R·布里奇：《从萨多瓦到萨拉热窝》，第80页。

时,看是否能通过某种双边安排来保证奥匈帝国有关的重要利益。

俄国谋求与奥国谅解,一方面仍然体现了俄国外交的欧洲性质。泛斯拉夫主义者如伊格纳切夫是反对与奥国联盟的,官方俄国从上述利瓦吉亚时期起显然已受泛斯拉夫主义的严重影响,韦尔德电报即是典型一例。但这种影响并没达到冲破官方俄国欧洲外交框架的程度。哥尔查科夫主张在以娴熟的外交方法保持欧洲均衡的同时推进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俾斯麦反对俄奥冲突但是居心叵测,对于一心想竞争欧陆事务控制权的哥尔查科夫来说,因俄土战争而把奥国完全推向俾斯麦怀抱极不可取。英国是不会与俄国搞一个反土协定的,相反可能会使用克里米亚时期的故伎拉拢奥国。俄奥在亚洲并无冲突的利益,两国在巴尔干的分歧不应成为被他人坐收渔翁之利的缘由。另一方面,俄奥谅解是出于对土战争的实际需要。哥尔查科夫虽然想利用战争威胁迫使土耳其让步并放松对斯拉夫基督徒的统治,但对土战争已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俄国当时并没有黑海舰队,进入巴尔干作战必须经过靠近奥匈帝国的罗马尼亚瓶颈地区,奥国如从特兰西瓦尼亚方向出动军队拦腰切断,俄军就有被困死在巴尔干半岛的危险。克里米亚战争时,正是奥国的威胁瓦解了俄国投入战争武装力量的三分之一而只得退却。因此,保证奥国在俄土战争时的善意中立是排除那种危险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这一点上看,俄国谈判地位不如奥国强,它不得不有求于奥国,为此预付一笔昂贵的代价。

俄奥谈判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其事的只有哥尔查科夫和俄国驻奥大使诺维可夫,安德拉西和奥匈驻

俄大使朗格瑞。谈判从 1876 年 11 月初经哥尔查科夫授意诺维可夫后开始,到 1877 年 3 月中旬结束。1 月 15 日君士坦丁堡会议破裂前夕签订了军事协定,3 月 18 日在伊格纳切夫欧洲之行时签订了政治协定。军事协定规定的是保证奥国中立的条件及双方军事行动的范围,政治协定规定的是对战争结果的安排。两者合一为布达佩斯条约,标明的签署日期均为 1 月 15 日,以示军事协定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治协定,两个协定是一个整体。<sup>①</sup>

根据军事协定,奥国政府保证在俄国单独行动时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并尽力阻止其他大国援用 1856 年的条约进行调停或干预。俄国做出的让步主要有两条,一是承认奥国有权在其认为适当的时候军事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德拉西在这里不仅坚持了赖希施塔特协定奥方文本把黑塞哥维那归属奥国势力范围的说法,而且这种占领并不像哥尔查科夫原来设想的具有俄奥“联合干涉”的意义,而是一种独立的为保护奥国利益所需要的平行的举动,按条文的提法,“这一措施并不具有与俄国占领保加利亚相呼应的性质”。二是答应俄国军事行动的范围将限制在巴尔干东部。条约规定俄军不得经过塞尔维亚、门的两哥罗及它们之间的新帕扎尔,这些地区将构成一个避免俄奥两国军队直接接触的中立区,塞、门两国军队只有在它们的边界外才能与俄军联合作战。安德拉西在这里力图排除俄国和塞门两国结成盟邦的前景,防止俄国把这场战争变成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东正教的革命。<sup>②</sup> 奥国

<sup>①</sup> 《奥匈帝国秘密条约集》,第 2 卷,第 191—203 页。

<sup>②</sup> D·麦肯齐:《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第 171—172 页。

方面则承诺不将军事行动扩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政治协定关于战争结果的安排是对赖希施塔特协定所作的澄清和修正。除了规定奥俄“兼并领土”的范围分别限于波黑两省和比萨拉比亚外,重新确认了不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原则。它与赖希施塔特协定的主要区别,一个是条约生效的问题。政治协定不仅在奥斯曼帝国瓦解时适用,而且在战争引起的任何领土变动时也适用。安德拉西指示朗格瑙向哥尔查科夫指出,虽然“只要保持土耳其领土完整仍然可能,我们便没有兼并领土的兴趣和念头,但是任何现状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奥匈帝国的平衡与安全。”<sup>①</sup>“瓦解”是一个过程,很难精确地确定究竟是从这个国家的主权遭到第一次破坏时算,还是要等到这个国家的全面崩溃。俄土战争是否引起奥斯曼帝国的全面崩溃尚在未定之天,安德拉西通过这个条文是要保证奥国能应付战争引起的任何不测变化。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俄国虽然打了一场战争,但它要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的话,必须考虑到保持中立的奥国的利益。另一个是新帕扎尔问题。赖希施塔特协定规定这一地区将在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之间进行分配,而政治协定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处理。安德拉西并没有提出奥国对这个地区的兼并或占领的要求,但坚持必须保证奥国经该地区到瓦尔达尔(Vardar)流域的商业通道。<sup>②</sup>协定的这种规定表明了安德拉西希望在不增加奥匈帝国领土负担的情况下保证它在巴尔干西部的势力和经济地位。此外,与赖希施塔特协定不同的是政治协定没有对俄国在亚洲的利

①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143页。

②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284页。

益和对塞门两国的领土补偿作任何明确的规定。保加利亚的问题看来存在着模糊之处,协定虽然允许保加利亚有比波黑地区较多程度的自治,然而俄国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显然是把它的自治与其边界范围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协定中不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规定是否也包括一个大保加利亚自治国在内呢?这仍是一个引起以后争议的疑案。

奥俄缔结的布达佩斯条约不是两国在积极意义上的联合,而是在避免冲突的消极意义上的妥协。奥国的要求是苛刻的,俄国不仅牺牲了那些巴尔干斯拉夫小国的利益,而且自己的手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束缚。两害相权取其轻,俄国的主要目标是防止重现奥国敌对和克里米亚悲剧这种最坏的情况。这一点,俄国可以说是做到了。但是,这个条约并不能消除两国的怀疑和隔阂。安德拉西始终在英国面前否认俄奥有合作关系而给自己留下了其他选择的余地。<sup>①</sup>他曾说,俄国如遵守条约则至少可得到比萨拉比亚,如不遵守条约,奥国将被迫作军事干涉切断俄军与后方基地的联系,同时英国可依仗其舰队的优势在君士坦丁堡方面行动。<sup>②</sup>哥尔查科夫是迫不得已才签订这个把对土战争建立在奥国善意基础上的条约的,因而它仍是权宜之策。不管泛斯拉夫势力的要求是否会不超出这个条约的范围,单是俄土战争可能造成的各种变化的形势就并非一纸条约的规定所能穷尽。如果出现转机的话,俄国难道无意摆脱这个条约的束缚?泛斯拉夫主义支持者卡特索夫后来批评说奥国的善意是靠不住的,俄国在多瑙河畔集结的

①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6.3),No. 177

② 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300页。

军队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象沉重的天体，悬挂在稀薄的空气中。”<sup>①</sup>但俄国遵守条约的诚意也许更靠不住。从这个意义上说，条约对俄国构成的束缚是暂时的、不确定的，而条约为俄国在对土战争时保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地位是实用的、确定的。

1877年1、2月间，法德边界局势重新出现了紧张状态。和1875年春季的情况一样，两国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战争危机是大可怀疑的，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多半是因东方事态在德法关系上引起了反馈。君士坦丁堡大使级会议的一个结果是俄德之间发生了新的齟齬。由于德国代表沃瑟在会上总是与奥国代表卡利斯唱一个调子，拖延对英俄意见表态，俄国埋怨德国不给支持。俄法报刊异口同声指责，德国不情愿削减大国对土耳其建议的条件是想把俄国置于困境，致使会议破裂。素与俾斯麦保持良好个人友谊的舒瓦洛夫此时也对三皇联盟的价值有所怀疑。<sup>②</sup>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结果是给人造成了一种英俄合作并得到法国支持的印象。这种印象不仅给正在与俄国进行秘密谈判的奥国增加了压力，而且给德国带来了孤立感。近东问题上所有种种预示大国阵线可能出现新变化的征兆，增加了俾斯麦对法德关系及其边界形势的关注。他最担心的问题是俄国和法国结盟。在1月24日给施魏尼茨的指示

<sup>①</sup> 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298页。

<sup>②</sup> 舒瓦洛夫2月初致函俾斯麦，希望德俄在当前危机中互相支持，以显示三皇联盟的团结。俾斯麦复信时保证两国不存在分歧的利益，但尖锐抨击了哥尔查科夫“与巴黎调情”的做法，认为德国以后的继承者将不会理解俄国的政策。（见奥托·冯·俾斯麦：《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287—288页）。俾斯麦在1月24日给德国驻俄大使信中说，俄国对德国的埋怨毫无道理，因为俄国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不与德国商量，德国无法支持被蒙在鼓里的东西。（见下注）



中，俾斯麦谈到哥尔查科夫正在法国的附和下尽力破坏英奥和德国的友好关系，怀疑“俄国有一些权势人物与其想为土耳其的东方基督徒作战，不如说更想和巴黎政府联合起反对德国。”<sup>①</sup>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俾斯麦于1月27日、2月3日通过英国大使拉塞尔向英国提出了建立联盟谅解的建议：法国如果依靠俄国的支持侵入阿尔萨斯、洛林的话，英国是否能保持对德国的友好中立？俾斯麦希望在德国不得不把军队向梅斯和斯特拉斯堡集结以防备法国的侵略时，能够有一个德英的联盟来反对法俄的联盟。<sup>②</sup> 俾斯麦的这个建议确实是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问题。难道俾斯麦真的觉得这样的攻守联盟有缔结的现实基础？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从上述形势分析，俾斯麦这个建议应该说与俄国有关，“法国侵略”不过是他提出问题的借口，俾斯麦意图的最大可能性是离间英俄、防止出现俄国与西方大国结盟的前景。如果能够使英国相信三皇联盟并没有在巴尔干合作行动的秘密谅解，英国很可能采取明确的抑制俄国、支持奥国的政策。这样，不仅减少了俄国利用英俄合作来避免俄土战争的机会，而且迫使俄国进一步依靠三皇联盟，放弃与法国联合另立反德山头的念头。但是俾斯麦的策略对英国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却反而使英国加深了对德国的怀疑，增强了与俄国取得谅解的愿望。俾斯麦在建议被英国否定后则重申对俄国近东政策抱有最友好支持的立场。而德

① 《德国文件》，第2卷，No. 273

②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6.3），No. 168，No. 178。参见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250—251页。

法关系随着法国国内温和共和派得势，不久即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英国对俾斯麦的怀疑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所谓的法国侵略和反德联盟并不存在。俾斯麦的危言耸听，目的在利用君士坦丁堡会议破裂后的混乱形势制造英俄不和，引诱俄国进行对土战争，给德国彻底击垮法国以行动自由。<sup>①</sup>英国在拒绝德国建议的同时，对俄国的调子变得温和起来。迪斯累里现在相信俄国希望维持和平，必须给俄国的退却架“一座金桥”。2月20日，迪斯累里会见舒瓦洛夫，重温去年夏天英俄谅解谈判的情况，表示两国应消除偏见，力求在欧洲病夫垂亡之时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他显然想把俄国从战争边缘推回去，谈话中使用的武器是“俾斯麦可能制造麻烦”，认为英俄两国都不能接受法国在欧洲被进一步削弱的状况。但是迪斯累里没有给俄国什么具体建议，只是强调土耳其目前需要时间来实施改革。<sup>②</sup>土耳其在米哈特帕夏2月5日失宠下台后，新大宗宰埃德姆又颁布了一个范围更广泛的改革纲领，而土耳其与塞尔维亚在恢复现状基础上的和谈也即将告成，英国希望这些情况能够使俄国解除战争动员。<sup>③</sup>

俄国在君士坦丁堡会议破裂后曾向欧洲列强发出了一个1月31日通告。通告宣布土耳其的顽固态度是对欧洲尊严的冒犯，但俄国仍把欧洲的合作和一致看作是最紧要的事，因此在做出决定前它希望知道其他大国打算采取什么措施。<sup>④</sup>由

①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27页。

②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4卷（1926.3），No. 179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998页。

④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510

于俄国通告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随着春季即将来临,俄国不能再等待下去。2月27日沙皇召开俄国大臣会议,决定派伊格纳切夫作欧洲之行,再次为俄国争取“体面的和平”。伊格纳切夫带去的俄国议定书草案与君士坦丁堡会议的大国建议内容相仿,要求土耳其立即和塞、门两国缔结和约,解除战争状态,实行大国所建议的和土耳其自己已颁布的改革方案,大国方面则保留监督和采取必要的共同行动的权利。<sup>①</sup>这个文件被要求得到大国的签署。沙皇政府此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尚未作出最后抉择,希望伊格纳切夫使命的结果将使问题很快地确定下来。3月初,伊格纳切夫托辞去巴黎医治眼疾开始了旅行。他对德国的访问是成功的,俾斯麦赞成俄国的草案,强调保持三皇联盟的团结。<sup>②</sup>但这次使命的关键并不在柏林而是在伦敦。英国政府虽然愿意给俄国设一座金桥以避免战争,可是坚持把俄国保证解除战争动员,土耳其不必在文件上签字等作为英国考虑接受议定书的条件。<sup>③</sup>正如英国谚语所说的“没有歌声,便无晚餐”一样,英国的基本态度是“不解除武装对峙,便没有议定书”。伊格纳切夫3月16日至22日对英国的访问没有取得积极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对这位声名狼藉的泛斯拉夫支持者极端怀疑,另一方面是他完全无意在事涉战争准备的问题上作任何让步或妥协。伊格纳切夫离英后,舒瓦洛夫继续就议定书事宜与英国交涉,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伊格纳切夫使命不过是俄

①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附录文件4,第605—606页。

②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76

③ 《英国蓝皮书》,第91卷(1877年),“土耳其”第2集, No. 280

国通向战争道路上的一个休息站,但不管事态将如何发展,俄国仍需要有一个文字协定来使英国的态度中立化,况且如果没有英国施加压力,土耳其方面就根本不可能接受任何俄国认为可行的解决办法。舒瓦洛夫最后终于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安排,这就是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和其他五大国驻伦敦大使于3月31日签订的伦敦议定书。

伦敦议定书再次确认列强对改善基督徒命运有共同的利益,要求土耳其在和平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军队,并有效地实施已经应允的改革。议定书没有提及君士坦丁堡会议的大国建议,只表示如果大国的希望依然破灭,他们将进一步考虑采取保障基督徒居民福祉和普遍和平的措施。这是一个足够温和的文件,但即便如此,英俄在附属议定书的声明中保留了各自的立场。德比声明,英国只是为了普遍和平利益才签署这个文件,如果俄国和土耳其方面做不到使军队解除备战状态,该议定则被视为无效。舒瓦洛夫声明,土耳其在完成正在与门的内哥罗进行的缔和谈判以及接受欧洲大国劝告、实行议定书规定的情况下,可派专使前往圣彼得堡交涉有关解除军队备战状态的问题。<sup>①</sup>换句话说,英国将议定书的生效取决于俄土双方是否解除备战状态,而俄国则把自己解除备战状态取决于议定书是否被土耳其认真实行。

伦敦议定书对于英俄在外交上应付日益逼近的俄土战争是必要的。从英国方面来说,一方面它不必因拒绝俄国要求而承担破坏和平的责任,正如德比致女王信中指出的,“如果俄

<sup>①</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563—2567页。

国皇帝诚心像他声称的那样需要一个解除军队备战状态的台阶,那么他已经有了。‘这个文件’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避免俄国把罪名加到英国头上。”<sup>①</sup>另一方面则有利于防止英国被三皇联盟孤立而影响其近东利益。索尔兹伯里指出,德奥方面放纵俄国对土战争意味着三皇在巴尔干可能存在默契,俄国的扩张会指向土耳其的亚洲领土;拒绝议定书势必引起英国孤立,其后果是“三皇联盟得以加强,把俄国确立在亚美尼亚山巅”,而英国“将失去对土耳其的所有控制,得不到丝毫补偿。”<sup>②</sup>从俄国方面来看,它为自己单独行动从欧洲获得了一份“委托书”。哥尔查科夫通过这个由六大国签署的文件,摆脱了巴黎条约以来近东问题上的一条禁规:任何列强未经欧洲协调许可,不得擅自干涉土耳其内部事务。如果土耳其仍坚持顽固态度,拒绝同意议定书,俄国发动对土战争便师出有名,具有了执行欧洲意志的“性质”。哥尔查科夫4月6日接见英国大使洛夫特斯时表示,俄国不再能忍受“遥遥无期的没有结果的谈判”,“战争还是和平将取决于土耳其政府的答复”。<sup>③</sup>

伦敦议定书并不能拯救和平于危难之际。英俄两国的附加声明使问题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地,惯于在大国争斗中察颜观色的土耳其政府在4月9日用与君士坦丁堡会议时相同的理由加以拒绝。4月13日,由于土耳其不愿在尼克希奇问题上向门的内哥罗的领土要求作让步,土、门缔和谈判破

①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526—527页。  
②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31页。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591

裂。4月16日,俄国同罗马尼亚签订了允许俄国军队过境的协定。4月20日,英国新任驻土大使莱亚德抵君士坦丁堡,企图在最后一刻说服土耳其接受大国调停,但已无补于事。4月24日,俄国政府正式宣布:欧洲为改善土耳其基督徒命运所做的努力已告失败,对土战争开始。<sup>①</sup>是为19世纪第四次俄土战争。

---

<sup>①</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598页。

## 第四章 俄土战争

### 一、“小和平”计划的失败和英奥谅解谈判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在历史上曾称做是“一只眼对瞎子的战争”。无论从对双方作战能力的估计上看，还是从对战争进程和结果的难以把握上看，这一次的俄土战争也不例外。土耳其的财政状况已是千疮百孔，何以能支持这场战争也许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但土耳其正规军队在装备上确实要比俄国精良，多采用西方新型步枪和克虏伯钢制大炮，而且土耳其在苏丹阿卜杜勒·拉齐兹时期已建立起一支据认为是仅次于英国的海军力量。这使得俄国不得不把军事行动的范围限制在陆上。俄国财政状况同样十分困顿，军事改革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尚未见效。此外，沙皇统治内部人心不固，俄国的一些革命势力虽也怀有解放斯拉夫兄弟的梦想，可他们与力图从巴尔干寻回“俄罗斯历史意识”的阿克萨可夫为首的莫斯科泛斯拉夫分子不同，目标是想通过战争使他们摆脱沙皇的专制统治获得自由，用赫尔岑的话说是，“当拜占庭的帝国之鹰飞回故土时，它即从俄国上空消失”。<sup>①</sup> 俄国能够凭藉的有利条件，除了外交地位以外，就是它在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俄

---

<sup>①</sup>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169页。

土战争是在巴尔干和南高加索两个战场同时展开的，而俄国在主要战场巴尔干投入的军队就有 19 万人，可供调遣的后备军有 15 万人，加上罗马尼亚后来参战的 3 万余人，总共兵力达 30 多万人。土耳其在那里投入的军队是 16 万人。连同它的后备军 6 万人算在一起，兵力不过 20 多万。俄国军方在战争之初寄希望于速度与力量，企图在短期内一举摧毁土耳其在欧洲巴尔干地区的统治。<sup>①</sup>可是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双方潜在的各种利弊因素便发生作用，例如，土军饶勇善战但各路将领彼此嫉妒缺乏配合，俄军攻势凌厉但是首尾常不能兼顾，越来越拉长的军事供给线成了前进的包袱。因此，战争的进展决非一厢情愿的事。

1871 年 4 月战争爆发后头三个月，俄军进展顺利。高加索战场方面，俄军于 4、5 月间占领巴亚济特(Bayazid)和阿尔达罕(Ardahan)。巴尔干战场方面，俄军 6 月下旬在保加利亚斯维希托夫(Svishtov)强渡多瑙河成功，然后兵分三路向南推进，力图控制巴尔干山脉诸要塞。7 月中旬，俄国古尔科将军率部攻占了通往阿德里安堡的必经之地希普卡山口(ship-ka)。嗣后战争便进入了相持阶段。高加索战场，俄军累攻卡尔斯(Kars)不克，被迫后撤。巴尔干战场，土军苏里曼帕夏的兵团从门的内哥罗调到阿德里安堡一线，对希普卡实施包围。而奥斯曼帕夏的兵团则兼程六昼夜从维丁(Vidin)赶到普列夫那(Plevna)，抢在俄军之前于 7 月 19 日占据该战略重镇。普列夫那守卫战是土耳其在战争史上引以为荣的光辉一页。俄

<sup>①</sup> “奥布罗切夫将军备忘录”，见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 302 页。



国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在普列夫那周围集结了近 10 万兵力和 500 多门大炮,7 月 20 日、7 月 30 日、9 月 11 日三次发动强攻,可是奥斯曼帕夏的兵团浴血奋战,殊死坚守孤镇岿然不动。于是俄国请出克里米亚战争时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宿将图托尔本指挥战斗,并且改变战术,由冲击转为长期围困。普列夫那以后由于守军得不到援助,发生饥馑而于 12 月 10 日陷落,但土耳其长达四个多月的抵抗,改变了战争格局,拖住了俄军进攻的速度。普列夫那战役的意义是在,它不仅阻止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而且对俄国在胜利情况下获取战争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限制。经普列夫那战役消耗后的俄国,在面临其他大国战争干涉的威胁时事实上已处于不能再战的地位。

随着战争的开始,英俄关系对立的程度加深。俄国进入战争时有利的外交形势是以往俄土战争时很少可以比拟的:两个盟国中德国已保证善意中立,奥国被布达佩斯秘密条约缚住了手脚;法国和意大利方面不会有损害之举;罗马尼亚在 5 月对土宣战并随即宣布独立。真正严重的挑战可能来自英国。大国中唯有英国对俄国宣战进行了公开谴责:俄国无权享有欧洲委托权,沙皇政府的行动使自己脱离了欧洲协调,违背了 1856 年巴黎条约和 1871 年伦敦条约的原则,俄国军队进入土耳其领土对改善基督徒的境遇造成了困难。<sup>①</sup>5 月 6 日德比照会俄国政府,警告俄国军事行动不得影响到埃及、苏伊士运河与波斯湾的通航,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的现有地位不得发生改变,否则将视为是对英国利益的威胁,英国不能保持有条

<sup>①</sup> E·赫茨尔特:《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 4 卷,第 2607—2609 页。

件的中立。<sup>①</sup>

德比5月6日照会关于英国利益范围的申述是英国近东政策的一根和弦,但它没有消除内阁对俄国政策的分歧而仅仅是外交大臣德比为首的鸽派与首相迪斯累里为首的鹰派相妥协的产物。德比认为,英国利益固然需要保护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等地区不受俄国控制,可是英国的状况并不允许与俄国交战,俄国的战争目的也不像是全面摧毁土耳其,英国如果采取好战态度,将会促使沙皇政府去做真正严重危害英国利益的事情。德比主张和俄国达成谅解,谋求俄土战争局部化。德比的夫人经常通过与舒瓦洛夫的社交关系把英国的内部信息透露给俄国,以期有更多的机会保持英俄之间的和平。<sup>②</sup>迪斯累里自危机发生以来虽未绝对排除与俄国方面达成妥协和在英国主持下参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可能性,但其态度是机会主义的。他把英国的威望和东方利益同奥斯曼帝国命运联系在一起,因俄土战争更为加强,坚持以战争威胁和干涉的手段遏制俄国扩张,甚至不惜因此回到帕默斯顿时代的政策。迪斯累里多次提议占领加利波利(Gallipoli)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作为反对俄国攫取君士坦丁堡的物质保证。”<sup>③</sup>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内阁通过,但他的立场拥有女王陛下的支持。女王陛下认为,英国必须采取某些必要的措施捍卫自己的利益,“这不是一个支持土耳其的问题,而是英国与俄国在世界上谁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640

② 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298页;R·布莱克:《迪斯累里》,第635页。

③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530页。

占优势的问题”。<sup>①</sup>

内阁中除德比、迪斯累里外,对英国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并不惮于对俄国采取强硬立场,但认为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的统治无可救药,英国不能回复到与土耳其军事结盟的政策,而迪斯累里的主张似有这样的迹象。<sup>②</sup>他曾谈到,“一项积极的政策必须具备下述两个条件之一才有可能,即或者支持土耳其,或者对他们施加强迫性压力。我不反对后者或把两者相结合,但不同意单纯依靠前者。可是女王和首相无意在后者做任何努力。”<sup>③</sup>在俄国拿下普列夫那、暴露出更大野心之前,索尔兹伯里基本上保持了与德比的联合,同时也在内阁的鸽派与鹰派之间起着某种调解与平衡的作用。

如果说德比是英国内阁中力主英俄和解、避免冲突的代表,那么舒瓦洛夫则是俄国外交圈子中持同样主张的代表。5月中旬,舒瓦洛夫利用德比5月6日照会造成的机会,返国向沙皇政府面陈他的“小和平”计划,催促及早明确战争目标,以期与英国实现谅解。他认为,战争如果延长,不仅俄国本身政策容易受到军方态度和泛斯拉夫因素的影响,而且英国迪斯累里很可能克服反对派的阻力,采取战争冒险政策,俄国应在取得最初胜利之后立即结束战争。<sup>④</sup>舒瓦洛夫的主张得到了哥尔查科夫的支持。6月上旬,舒瓦洛夫回到伦敦后向英国递交了俄国政府5月30日对德比照会的答复。俄国方面保证不

①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05页。

②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39—140页。

③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63—164页。

④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5卷(1926.12),No. 214

触及或损害英国在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和通往印度海上航线的安全,承认君士坦丁堡的最终地位与普遍利益有关,但不能肯定军事形势发展是否需要暂时占领,因为事先作出不占领的承诺只会鼓励土耳其毫无顾忌地进行抵抗;至于海峡的安排,俄国表示缔和时将与大国友好协商、重新确定。舒瓦洛夫同时还转达了俄国谋求实现“小和平”的方案。这一方案的内容是,如果土耳其政府在俄国军队越过巴尔干山脊前请求和平,俄国愿考虑以下各点作为接受的条件:保加利亚建立由欧洲保证下的藩属自治;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增加领土;欧洲土耳其其他地区确保良好的行政管理,罗马尼亚取得独立或得到多布罗加(Dobruja)的领土补偿;俄国将获得比萨拉比亚、巴统及其邻近地区;奥国如愿意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寻求取得补偿。如果土耳其拒绝这些条件,俄国将继续军事行动直至它接受和平,但那时俄国的条件可能会不同。沙皇政府希望知道,俄国的条件能否使英国保持包括不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在内的中立。<sup>①</sup>

舒瓦洛夫6月上旬转递的俄国5月30日复照及其关于“小和平”的设想,反映了战争初期俄国外交当局对于战争意图的一些真实想法(俄国同时将缔和条件转告了德奥方面),并希望以此保证英国的中立,然而在英国要求承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位现状不变的问题上,俄国作了较大保留。实际情况是,阻碍英俄在战争期间实现谅解的,不仅有一个为其根本利益对立所决定的立场差距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双方主和派的努力受到强硬派制约的问题。俄军巴尔干统帅部总司令尼

<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第81卷(1878)，“土耳其”第5集, Nos. 1—2

古拉大公得知俄国复件的内容后,强烈反对把俄国军事行动的范围局限在巴尔干山脊以北,坚决主张在南北保加利亚地区建立统一的藩属自治(大保加利亚)。沙皇向军方意见让步。<sup>①</sup>6月14日舒瓦洛夫只得奉命撤回刚建议过的关于俄军不越过巴尔干山脊的有条件承诺。<sup>②</sup>这个不幸的变动进一步激起了英国对俄国战争目的的怀疑,英国驻俄、土两国大使的态度即是例子。洛夫特斯在给国内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哥尔查科夫是想赢得时间,诱使英国采取消极政策,从而耽误阻止俄国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时机;英国为防卫起见占领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是“保证与俄国就土耳其未来命运取得谅解、避免欧洲卷入更严重危机的最安全的办法”。<sup>③</sup>驻土大使莱亚德是迪斯累里政策坚定的支持者。他向国内报告说,俄国的苛刻条件实质上将导致土耳其崩溃并摧毁英国在这里的影响;英国以往伟大政治家之所以赞同支持土耳其的政策是基于一个信念:土耳其是抵制俄国在近东野心的屏障,即使不作为英国必然的盟国,它对于维持均势和欧洲文明世界的和平也是有用的。莱亚德认为土耳其不会接受俄国指定的和平,英国不能按照俄国条件进行调停。<sup>④</sup>正是在这种英俄对立与怀疑的情况下,俄土战争在早期实现“小和平”的希望化为乌有。必须附带指出,俄国复照中关于由大国协商改善海峡体制一节从外交上看是个重大失误。英国从此更有充分理由要求重新审查因俄土敌对行动而造成的任何现状变化,全面限制俄国胜利

- ① 查尔斯·杰拉维奇和巴巴拉·杰拉维奇编:《俄国在东方》,第38页。
- ② 《英国蓝皮书》,第81卷(1878)，“土耳其”第5集, No. 6
-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 B集, 第3卷, No. 644
- ④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 B集, 第3卷, No. 658

果实。俄国本来或许应该一开始就采取坚持海峡地位不变的原则，事实上它最后还是回到关闭海峡的立场，因为俄国并无手段在海峡开放的情况下保护其海岸的安全。

6、7月间，英俄的紧张关系呈现加剧之势。迪斯累里在6月6日曾秘密指示莱亚德，要他说服土耳其请求英国占领加利波利和派舰队去君士坦丁堡，这项措施将“在基本维持现状的同时，使英国在讨论和平条件时占有主导地位”。迪斯累里是想以土耳其请求作理由来迫使内阁同意采取他设想的行动。<sup>①</sup>俄国军队渡过多瑙河向南推进的消息增加了英国鹰派对政策的影响力。6月30日英国下令地中海舰队前往贝斯开湾。7月17日德比代表英国政府通知舒瓦洛夫，俄国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即便是军事需要暂时占领，也将被认为是对两国关系的损害，英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保卫英国利益所需要的措施”。<sup>②</sup>舒瓦洛夫表示，俄国愿与英国达成谅解，但在战争目的未实现时，不能承诺英国所要求的不向敌方首都进军的保证。<sup>③</sup>7月21日，迪斯累里利用舒瓦洛夫的否定答复和莱亚德从土耳其拍来的关于俄军意图的电报，促使内阁同意派遣三千名军队加强马耳他驻地，并决定：如果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而无立即撤出该市的安排，英国将对俄宣战。<sup>④</sup>

7月下旬俄国进攻普列夫那失利，沙皇感到必须安抚英国的态度。沙皇委托英国驻俄军事代办韦尔斯利8月上旬回伦敦时捎去信息：俄国战争目的“仅在改善土耳其基督徒居民

①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14—1015页。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696

③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5卷（1926.12），No. 209

④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26页。

的状况”，建议英国利用对土耳其的影响使它响应俄国已提出的和平条件。<sup>①</sup> 英国政府在正式答复中重申了“有条件中立”的立场，但推托说现在不是俄土缔和谈判的适当时机，回避了调停问题。<sup>②</sup> 迪斯累里和女王认为这个答复没有份量，秘密让韦尔斯利带给沙皇政府一个口头警告：如果战争延长，英国不能保持中立；如果俄国进行第二轮战役，英国必是“交战的一方”。<sup>③</sup> 由韦尔斯利使命引起的英国两个答复是有矛盾的，这反映了：俄军在普列夫那的受阻虽然使得两国关系紧张状态有所缓和，但是迪斯累里仍然保持着战争威胁的态度，他对俄国的警告，无疑是把俄国在来年春天发动第二轮战役视为英国的“宣战理由”。<sup>④</sup> 俄国后来继续在冬季作战而没有等到第二年再战，主要当然是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普列夫那在 10 月份已被完全切断与外界联系，俄国想利用战场上积聚起来的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取得决定性胜利，可是迪斯累里的秘密警告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副作用。

俄土战争爆发以后，英国企图寻找盟国来加强与俄国抗衡的地位，克里米亚体制时代的旧盟友奥国成为英国的选择目标。迪斯累里一度曾试探德国的态度，英国驻德大使拉塞尔向俾斯麦提出，德国是否愿意支持英国维护土耳其在君士坦

① 《迪斯累里传》，第 6 卷，第 1045—1047 页。

② 《英国蓝皮书》，第 81 卷（1878），“土耳其”第 9 集，No. 4

③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 2 集，第 2 卷，第 560—561 页。

④ 迪斯累里 8 月 6 日在给莱亚德的秘密信件中提出过一个设想：依靠与土耳其的结盟，英国军队从亚洲亚美尼亚方面扫荡俄军和从瓦尔纳登陆包抄巴尔干俄军侧翼。（H·坦佩尔利和 L·彭森编：《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第 360—361 页）其目的乃是在鼓励土耳其投靠英国，同意英国占领加利波利和保护海峡地区的要求。这同样反映了迪斯累里思想中的战争冒险成分。

丁堡和海峡地区主权的立场。俾斯麦则一方面表示赞成英国向俄国提出要求以取得谅解,一方面强调英国不要过早干预、派军舰占领加利波利,在俄土战争尚无定局之前,大国方面任何想达成近东问题持久解决的努力都不会成功。<sup>①</sup>英国由此进一步相信,德国宰相依然在“竭其所能地唆使俄国从事这场灾难的战争”。<sup>②</sup>奥国虽是三皇联盟的成员并被怀疑与俄国存在谅解,<sup>③</sup>但俄土战争的发展与奥国利益息息相关,利用奥俄矛盾把奥国拉到英国一边并非没有可能。<sup>④</sup>1877年5月19日,德比根据内阁的决定照会奥国驻英大使博伊斯特,邀请奥国政府谈判“一项在发生俄国进军君士坦丁堡时合作行动的计划”。德比指出,奥国对于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位的利益不亚于英国,不应有什么困难阻碍两国达成谅解,保卫共同的利益。<sup>⑤</sup>

对于英国政府建议,安德拉西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奥国不能对英国要求作出承诺,只要俄国没有违反布达佩斯秘密条约,奥国就无理由干预俄土战争,特别是奥国已答应防止列强援用巴黎条约采取干涉措施,如果和英国联合行动,势必得罪俄国,减少本来可以不经战争而取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机会;一方面奥国需要英国的友谊,英国在未来安排近东事务中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拒绝建议只会使英国得出奥国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679

②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47页。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695

④ 迪斯累里曾在1876年11月通过私人秘书科里与奥驻英使馆的蒙特格拉斯的渠道交涉过英奥联盟事宜。参见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125—127页。

⑤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646



已受俄国约束的结论,甚至可能导致英国径自与俄国达成对奥国不利的谅解——确保英国在海峡的利益而让俄国在巴尔干获得行动自由,从而削弱奥国在与俄国交涉时的地位。<sup>①</sup>因此,在英奥谈判中,安德拉西使用了坚持合作但又保持独立这种在与俄国谈判布达佩斯条约时相同的原则来维护奥国利益,以便既在手中握有取得英国支持的线索,又不使奥国与俄国分离。5月29日,安德拉西答复愿意与英国谋求谅解,但奥国不反对“俄国用武力解决它与土耳其的争端”,认为巴黎条约在保持其基本思想的前提下“可以作出修改”。英奥“谅解的基础”是在确定“什么样的战争结果能够被我们所接受,什么样的情况为我们所不能允许”。安德拉西接着提出了与奥国利益有关的七条,主要内容是:任何大国不得成为巴尔干基督徒的保护国;没有巴黎条约签字国同意,不得确认和平的最后解决办法;俄国不得在多瑙河右岸获得领土;罗马尼亚不得与俄国合并或取得依赖于俄国的独立;奥俄统治家族的成员不得授予巴尔干公国的王位;俄国不得占领君士坦丁堡;不得成立以牺牲非斯拉夫居民利益为代价的大斯拉夫国,自治允许的范围限于实行当地人的统治。安德拉西还指出,鉴于俄国实质上已做过满意的保证,目前尚不能认为俄国无视上述的利益。<sup>②</sup>

<sup>①</sup> D·E·李编;《未刊印文件:1877年英奥谅解》,《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1.12),No.12。这套文件多编自奥国外交部档案,以下简《英奥关系文件》。(Dwight E. lee, Unprinted Documents, The Anglo-Austrian Understanding of 1877. *Slavonic Review*)

<sup>②</sup>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1.7),No.3。参见《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649。

奥国的答复是不冷不热的,但英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共同应付当时战争发展形势,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盟国。<sup>①</sup> 迪斯累里 6 月 11 日与博伊斯特谈话时提出了他的想法:英奥不能同意俄军越过巴尔干山脉,必须联合对其施加压力实现和平,“如果俄国拒绝和平并越过巴尔干山脉,我们应谋求物质保证以维护已有条约”,英国占领加利波利,奥国则进入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sup>②</sup> 为了打消奥国单纯依靠英国对抗俄国的念头,吸引奥国和英国联合,德比表明英国“没有盟国是不愿意进入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的”。两国进行合作“不仅肯定能获致成功,而且没有战争危险,因为俄国在已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不会再招惹两个主要大国的敌对”。<sup>③</sup> 安德拉西则回答,奥国并非绝对信赖俄国,但奥国的地理位置和英国的舰队本身就是防止出现有损他们利益的既成事实的充分保证。俄国是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的,不致于想使自己处于困境。假如英国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措施,奥国不提出反对,可是奥国不想采取行动阻止俄军越过巴尔干。假如奥国提出的七条遭到侵犯,奥国则可能谋求“物质保证上”的措施。<sup>④</sup> 当英国驻奥大使布坎南 7 月 11 日受权向奥国提出,舒瓦洛夫 6 月 14 日对于俄国和平条件中保加利亚问题的修正是否与奥国七条有冲突时,安德拉西的答复是:俄国原先和平条件与奥国七条并不

①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 10 卷(1931.7),No. 7

②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 10 卷(1931.7),No. 5

③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 10 卷,(1931.7),No. 11. 必须指出,德比这里的提法具有外交上防卫的性质,迪斯累里在英奥谈判中走得要比德比远,两人对谈判所持立场并不完全一致。

④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 10 卷,(1931.12),No. 12

抵触；至于保加利亚自治国范围扩及巴尔干山脊以南的问题，奥国已要求俄国大使诺维可夫作解释，并且已声明保留在战争结束时对此问题的否决权；尽管俄国意图现在还不能完全预见，但奥国“不能视任何保加利亚范围的扩大为宣战理由。重要的问题不在保加利亚将得到巴尔干山区的多少地盘，而在俄国是否撤离以及不对那里实施特殊保护”。<sup>①</sup>安德拉西内心里显然对英国有怀疑，生怕英国通过谈判把奥国变成威胁俄国实现一己利益的工具。<sup>②</sup>他认为，英俄之争好像鲨鱼与狼之间那种展露牙齿的争斗，它们最终还是能无伤大雅地回到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英国占领加利波利并无大的风险，而奥军开进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问题就严重得多，等于是一场“生死搏斗”。<sup>③</sup>奥国无意进入英国所建议的那种联盟。

英奥谈判持续了三个月。由于奥国不愿签订一个联合议定书，双方的谅解是以互换声明的方式实现的。奥国7月26日的声明在复述七条内容的同时增添了对海峡问题的立场：“关闭海峡的规则应予以维持”，“任何修改必须经保证国取得一致意见才有效”。英国8月14日的声明重申德比5月6日照会中规定的英国利益范围，接受奥国的七条，并强调防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和维持两海峡对外国战船关闭的现有安排的必要性。声明指出，英国不绝对排除修改海峡规则，但坚决不同意任何可能导致对俄国单方面有利的方案。双方表示，在未来对近东问题作最后安排时，两国将就上述问题采取合作

①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1.12），No. 19

②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1.12），No. 16

③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1.12），No. 24

的路线。<sup>①</sup>

从英奥谈判过程及其声明看，两国在抵制俄国势力扩张方面有共同愿望，但他们没有结成盟国。舒瓦洛夫后来评论说：“奥匈帝国和英国之间缺少一致意见对危机的整个过程有重大的影响”。<sup>②</sup> 这话有一定道理，如果英奥从一开始达成某种安排的话，以后局面很可能完全改观。英奥之所以未能作出实质性安排，当然与两国内部在决策上的困难有关，英国内阁仍在经受政策分歧的折磨，奥国军方对安德拉西的反俄倾向仍有牵制，而在外交方面则除了英奥两国不能克服彼此的疑虑外，奥国寄希望于俄国遵守诺言是一个主要原因。舒瓦洛夫在获悉英国正与奥国进行秘密谈判的情况后，立即把消息通知了国内政府。<sup>③</sup> 诺维可夫在7月初按哥尔查科夫指示转告奥国：三皇友好关系特别是奥俄关系将保持稳定与不变，不管战争结局如何，俄国依然信守成约。沙皇致书保证“无意长期占领保加利亚”，“决不背离赖希施塔特精神”。奥皇8月初回信表示奥国继续奉行善意中立，“英国已被决断的态度告知，它不能指望与奥国结盟。”<sup>④</sup> 由此可见，安德拉西虽然想脚踏两只船，但他无意摆脱使奥国保持中立的布达佩斯条约的羁绊，俄国答允的东西虽在纸上却有诱惑力，而奥国大动干戈地出兵巴尔干战场能从英国换取什么实际收益呢？安德拉西的

<sup>①</sup> 《英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1.12），Nos. 24—25。参见《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703

<sup>②</sup>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224—225页。

<sup>③</sup>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5卷（1926.12），No. 234

<sup>④</sup> 引自R·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400—405页。

算盘打得是够精明的。实际上，英奥两国利益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一个是在君士坦丁堡与海峡，一个是在巴尔干西部。即使在保加利亚问题上，两国的立场相同中有不同；对于英国来说，一个大保加利亚极容易构成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的控制；对于奥国来说，俄国长期占领那个地区或者把它变成附庸将严重威胁到奥国在巴尔干西部势力的确立。尽管如此，谈判达成的有限谅解为后来英奥在削减俄国战争成果方面携手合作奠定了一个基础。

既然英奥不能联合采取遏制俄国的行动，俄国的对土战争就能继续保住一个不受国际干涉的局面。三皇联盟的存在无疑是这种局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①</sup> 德奥对于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可取性立场上并不一致，但已如前述，德奥都向俄国作出了善意支持或中立的承诺。承诺的条件是由它们各自的地位和利益决定的，德国要求俄国不得与欧洲其他列强特别是奥国发生冲突，奥国要求俄国遵守赖希施塔特和布达佩斯两个秘密条约。战争并未破坏这些条件。9月18日，俾斯麦和安德拉西在萨尔茨堡会晤，协调双方对俄土战争的立场。安德拉西透露了不久前英奥秘密谈判的内容，俾斯麦表示奥国可以信赖德国的支持；双方还同意：避免采取任何阻碍俄国战争行动的步骤，不要支持英国干预俄土冲突的企图。<sup>②</sup>

俄国对土战争在巴尔干方面不存在阻挠的问题，相反被

---

① 舒瓦洛夫在10月初就曾以仿佛局外人的口吻向迪斯累里谈到俄德的共同利益和俄奥的秘密承诺，试图说明英俄对抗的不可取，英国政府必须在支持土耳其方面谨慎从事。参见《英俄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6卷（1927.12），No. 250；《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55—1058页。

②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215页。

看作是或争取独立解放或扩展领土的机会。开始时，俄国相信战争是短期的，凭自己优势的兵力足以迅速取胜，不想因接受巴尔干小国的帮助而预付战争成果。况且，俄国也不希望战争带上巴尔干革命运动的性质，并导致与其他列强关系的复杂化。因此罗马尼亚只被允许在多瑙河以北护卫俄军运输线，塞尔维亚被劝告保持中立，希腊的结盟建议被拒绝。但是，当拿下阻挡俄军前进的普列夫那的紧迫需要出现时，俄国转而寻求巴尔干小国的帮助。沙皇要求罗马尼亚越过多瑙河参战、塞尔维亚重新进入对土战争状态、希腊在色萨利方面牵制土军。问题是这些小国并不想两手空空毫无代价地打仗，结果是，罗马尼亚参加了普列夫那战役但没有放弃它的要求；塞尔维亚拖到12月14日才宣战；希腊把得到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作为参战先决条件，而由于英奥方面的压力，它依然保持中立。<sup>①</sup>

土耳其的防守并非固若金汤。11月18日，卡尔斯陷落，高加索战场便已无认真的抵抗；12月10日，普列夫那失守，巴尔干战场土军随之崩溃。战场上顿时展现出一幅叹为悲壮的场面。一边是“死亡的行军”，普列夫那约三万名土耳其战俘被遣送后方布加勒斯特，一路上冻馁交加、缺医少药、陈尸荒野者累累。一边是英勇的挺进，俄军主力在1878年1月初掠索非亚城，越希普卡山口，急行翻过巴尔干山脊的峭壁险坡。拥簇着辎重的大军冒着风寒、踩着冰雪，转辗400余英里，于1月20日涌向阿德里安堡。

<sup>①</sup> 参见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151—154页；D·麦肯齐：《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第6章。希腊军队在1878年2月初擅越边界进入战场，但其时俄土阿德里安堡停战协定已签署。见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369—370页。

## 二、阿德里安堡停战协定

12月12日,普列夫那战尘刚落,土耳其政府即向巴黎条约签字国提出了斡旋停火的要求。<sup>①</sup>但大国集体调停的问题一开始便因德国的反对遭到搁浅,俾斯麦认为这样的步骤势必被圣彼得堡视作是向俄国施加压力,任何大国的调停将都具有这样的性质。<sup>②</sup>英国深恐俄土战争形势的陡变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一面警告俄国不得占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sup>③</sup>一面争取奥国能对英国单方面调停作出支持,奥国此时已被俄国秘密告知新的缔和条件内容,这些条件对奥国不利但没有出笼。安德拉西不想干预俄土停火、削弱奥国在对俄交涉中的地位,同时也不希望英国介入,英国单方面调停可能使俄国与英国达成某种安排,陷奥国于孤立。12月20日,安德拉西通过英国驻奥大使布坎南向英国表示:按伦敦议定书的精神,停火最好由交战国自行解决,但鉴于土耳其地位与欧洲大国情况有别,俄土和平没有欧洲同意是不能完成的,俄国的任何苛求必然使土耳其向欧洲求援,英奥那时就有合法理由成功地保护两国利益,英奥如在调停问题上各行其是,俄国很容易利用两国孤立的状况从土耳其谋取最大好处。<sup>④</sup>奥国的态度并不能阻止英国干涉。12月28日,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722

②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98,《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731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731

④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 No. 733

斯奉命向俄国提出调停：土耳其已准备求和，英国感到“有责任作出努力来结束俄土之间目前这场不幸的流血战争”。<sup>①</sup>但俄国拒绝了英国的调停建议，哥尔查科夫的态度是，“俄国的愿望莫过于确立和平，为此目的，土耳其政府必须直接向俄国在欧亚战场的最高军事司令官提出停火问题”。<sup>②</sup>

在俄国坚决不让第三者插手俄土双方停火问题的情况下，土耳其迫于战场上日益紧逼的形势，于1878年1月8日向俄军统帅部总司令尼古拉大公请求停火。俄国方面则坚持，停止军事行动必须和土耳其接受俄国的缔和基础条件同步实现。俄国现在尽量设法拖延停火谈判，一方面是为了占领更多的领土以增强谈判的地位，正如沙皇命令中指出的，“军队继续前进，直至土耳其政府无条件地接受我们所有的要求。”<sup>③</sup>另一方面，哥尔查科夫希望能有时间与奥国就缔和基础条件取得谅解，并且免得英国经土耳其方面获知条件内容而使迪斯累里在议会开会时有提出增加军备问题的口实。<sup>④</sup>尼古拉大公在1月13日才接到圣彼得堡由信使专程送来的缔和基础条件正文，君士坦丁堡派出的谈判代表于1月19日抵达俄军统帅部所在地卡赞勒克(Kazanlik)，停火谈判开始。但随着俄军统帅部的移动，谈判地点搬到阿德里安堡。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748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746

③ A·奥诺：《N·伊格纳切夫伯爵的回忆录》（第2部分），《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2.4）第633页。（A. Onou, The Memoirs of Count N. Ignatyev, *Slavonic Review*）

④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6卷（1927.12），No. 268。英国已决定议会提早在1878年1月17日开会，迪斯累里希望该届议会能同意增加防卫君士坦丁堡所需要的军备和费用。



自俄土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外交的摇摆性和两面性已充分暴露出来。战争使军方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在决定政策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俄国 1877 年 6 月“小和平”方案更动一事便是哥尔查科夫外交失控的典型例子。沙皇从 6 月初起亲临巴尔干前线,随其兄弟尼古拉大公的军事统帅部一起行动,陪同近臣中有陆军大臣米柳亭,驻土大使伊格纳切夫,负责外交事务处理的是聂里多夫。统帅部不仅决定与战争行动有关的问题,而且决定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哥尔查科夫年事已高,不堪军旅生活,同热米尼留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他们被定期征求意见,可是往往只能从“茶杯里看风波”,对统帅部的决定影响有限。<sup>①</sup> 11 月底,沙皇曾在波拉登(Poradim)主持了讨论缔结和基础条件的重要会议,哥尔查科夫对会议预拟讨论的方案表示同意,但没有参加。战争的胜利显然刺激了俄国野心的膨胀,然而这并没有弥合哥尔查科夫欧洲路线和伊格纳切夫冒险路线的分歧。据奥诺关于伊格纳切夫回忆录的记载,自沙皇 12 月下旬回到圣彼得堡后,两人的分歧更形尖锐。伊格纳切夫主张,俄军的推进应在北面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岸高地,南面占领靠近加利波利的布莱尔(Bulair),俄国可以不受欧洲约束,单独与土耳其缔结最后的和约。哥尔查科夫担心这种做法将造成国际局势复杂化,甚至导致与英奥方面的战争。他坚持俄土单独缔结的和约必须尽量争取得到欧洲、特别是三皇联盟的谅解,未来的和约标明“预备”性质可使俄国在欧洲

<sup>①</sup> 查尔斯·杰拉维奇和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在东方》,第 49 页,第 66 页。该书收集的熟米尼在俄土战争期间致吉尔斯的信件,相当生动地描述了哥尔查科夫当时的处境。普列夫那战役结束后,俄国胜局已定,沙皇、哥尔查科夫、伊格纳切夫均返回圣彼得堡,俄国政治中心又回到涅瓦河畔。

压力面前较有活动的余地。<sup>①</sup>沙皇莫衷一是,结果造成了俄国外交的一种可悲现象:哥尔查科夫的外交当局执行着与欧洲各国交涉的实际任务,而伊格纳切夫却被授命为全权代表将在与土耳其的缔和谈判中起主要作用。<sup>②</sup>

波拉登会议通过的作为与土耳其缔和基础的条件预示了俄国当时准备从战争胜利中获取的目标。为了防止奥国转向英国,继续保证三皇联盟的合作和谅解,俄国把计划中的缔和内容通知了德奥方面。这个方案与俄国夏天提出的“小和平”方案已有显著不同。主要表现在:(1)按照君士坦丁堡会议拟定的范围,建立一个藩属自治性质的大保加利亚,并且由俄国军队占领二年。(2)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行自治性改革,奥国被允许在那里具有与俄国在保加利亚“相类似的控制”作用。(3)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完全独立。(4)俄国除收复比萨拉比亚南部外,还得到在小亚的卡尔斯、巴统等地,土耳其将偿付战争赔款。(5)调整海峡现有通行规则。海峡在和平时继续对外国战舰关闭,但“黑海沿岸国家”有权在每次取得苏丹许可的情况下单艘通过。沙皇在12月9日致奥皇的信中指出:这些条件根据的是“战争产生的权利和必要性”,符合两国以往协定的精神,贵国的合作将使之臻于完善。<sup>③</sup>

① A·奥诺:(N·伊格纳切夫伯爵的回忆录)(第2部分),《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2.4),第632—634页。

② 1月下旬,伊格纳切夫动身前往巴尔干执行缔和谈判的使命。经过长途跋涉,他于2月8日抵达阿德里安堡,其时俄土停战谈判已经结束,伊格纳切夫则接着进行缔和谈判。

③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5卷(1946.11),No.270

但是,俄国计划的方案及把实现停火与缔和基础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引起奥国的强烈不满,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奥国对方案的批评集中于两点。一是保加利亚问题,在土耳其还没有崩溃的情况下,一个藩属自治的大保加利亚,并且由俄国军事占领两年,违背了两国关于“不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秘密谅解;君士坦丁堡会议大国一致同意的方案是实行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双省制。二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问题。根据布达佩斯政治协定,奥国对两省拥有兼并的权利,这是与俄国得到比萨拉比亚或者土耳其发生领土变化的情况相对应的,而不是一个类似于俄国在保加利亚的暂时占领的问题。两国在严格意义上讲都无兼并权,奥国之所以承认是因为奥国应具有平等的补偿权利。奥皇在把这些意见转告沙皇时宣称,土耳其只是战败,援用两国协定的条件尚未形成。俄土最后的和平只有在1856年巴黎条约签字国的共同参加下才能实现。<sup>①</sup>沙皇不肯让步,认为奥国的反对是纠缠枝节,出于偏见。他在1878年1月6日复函中指出: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改革方案证明是不充分的;俄国已为基督徒利益做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不能同意再让保加利亚处于无政府状态;建立藩属自治并由俄国占领一段时间是不可避免的解决办法,侈谈其他手段只能是“撒谎和欺骗”;俄国并不拒绝共同讨论有关欧洲利益的问题,但如果交战国尚未缔结和约,这种讨论缺乏实际基础。沙皇强调:“我向您不仅解释了我的观点,而且解释了我的地位所引起的绝对必要性。……尽管情况已发生变化,但为奥国保留的收获依然没动。在给您暂时占领波斯

① 《俄奥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5卷(1946.11),NO.271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权利的同时,我已考虑到让您以后有把这种占领转变为兼并的自由,假如当您觉得为安全所需要的话”。“但如果您放弃我们的条约赋予您的权利,我希望您给以谅解:我不能把对我来说是绝对必要的问题从属于对您来说仅是个便利与否的问题”。<sup>①</sup>从奥俄两国的争执可以看出,双方在新形势下对赖希施塔特和布达佩斯两个条约采取了各取所需的解释态度,只愿意在符合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承认其“有效性”。

奥国的地位并不有利,赖希施塔特和布达佩斯这种秘密安排的弱点已显现出来。俄国单方面负约,企图利用停火问题迫使土耳其同意俄国的缔和基础条件,在巴尔干制造一个奥国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包括大保加利亚在内的既成事实。同时,俄国虽然含糊地答应奥国可以取得波黑两省,但实质上它不拥有这样的授与权。土耳其仅仅是俄国手下的战败国,并没有崩溃,其他大国无权利剥夺其领土。俄国作为交战国无疑可以提出它的要求,奥国作为中立国攫取土耳其领土的理由何在?摆脱上述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坚持俄土之间缔结的和约不能损害欧洲其他大国的利益,必须得到巴黎条约签字国的承认。这种想法在安德拉西去年夏天与英国谅解谈判时提出的七条意见中已有萌芽。1878年1月26日,诺维可夫正式把俄国对土停火谈判中附加的缔和基础条件通知奥国政府。两天后,安德拉西即照会哥尔查科夫,建议召开欧洲大国会议来确认俄土缔和的问题。他的理由是,俄国缔和基础条件损害了奥国对于和平解决的合法影响,他已无法在国会面前捍卫一项迄今

<sup>①</sup>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5卷(1946.11),No. 273

奉行的和俄国保持谅解的政策。要么他辞职下台，要么就是宣布俄土缔和安排未经有关大国批准不能生效，但如果他辞职的话，奥国政府将朝与以前达成的谅解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除非召开欧洲会议，否则他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继续担负与俄国实行协调的责任。<sup>①</sup>同一天，安德拉西给驻德大使卡罗尔依指示说，“俄国的缔和基础条件使我们看上去已被丢弃和愚弄，为了弥补我们的权威在社会舆论面前遭到的损失，召开一次欧洲大会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与俄国以前达成的谅解才可能付之实现，我们对事情安排的影响才能见之形迹，危机至少可以在保持三皇协调的情形下结束。”<sup>②</sup>安德拉西的态度表明，奥国把俄国接受关于举行欧洲大会的意见作为继续保持三皇联盟框架内奥俄合作的条件。鉴于俄国事实上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和反对奥国攫取波黑两地区，安德拉西现在想借助欧洲大国集体的力量限制俄国在巴尔干扩大势力，同时为保证自己利益获取合法依据。

1月份，由于俄军的不断推进而英国却又无从得知俄国的缔和基础条件，两国关系再次处于紧张对峙状态。英国女王要求内阁“迅速决定为防止君士坦丁堡受攻击应立即采取的措施”，声称作为一国君主，她不能让国家拜倒在趾高气扬的俄国野蛮人脚下。<sup>③</sup>但是内阁仍在徘徊动摇，不能采取决断的前进政策。1月12日迪斯累里建议派军舰去君士坦丁堡和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口岸的加利波利，德比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

①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206—207页。

② 《德国文件》，第2卷，No. 303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89页。

样做“违反条约,会增加与俄国冲撞的危险”。<sup>①</sup> 1月14日,洛夫特斯奉德比指示要求俄国不占领加利波利,并且声明“俄土之间的和约必因其影响1856年和1871年条约而是一项欧洲条约,没有那些条约参加国的同意,将不能视为有效。”<sup>②</sup> 俄国的答复是,除非土耳其军队在加利波利集结或英国背弃中立态度出兵占领,俄国政府无意将战争行动朝加利波利方向拓展。<sup>③</sup> 1月17日英国议会召开时,迪斯累里苦于不知道俄国缔和条件内容,无法提出要求增派军员和增拨军事预算的问题,英国女王在议会演说词中说:“迄今交战各国尚未破坏我的中立所赖以存在的条件”,“但我无须隐瞒自己的想法:如果敌对行动不幸延续下去,一些难以预测的情况可能使我义不容辞地采取预防措施”。<sup>④</sup> 实际上,从迪斯累里1月19日致女王信中可以看出,他已准备面对内阁分裂的现实和考虑对俄战争的可能性。女王同意首相意见,认为“与俄国的战争迟早不可避免”,“一个分裂的内阁毫无用处”。<sup>⑤</sup>

与此同时,迪斯累里力图把去年夏天与奥国的谅解变成一种实际的同盟。迪斯累里在1月17日会见博伊斯特,指出英奥联合行动时刻已经到来,奥国是否准备配合英国的海上行动,实行战争动员,在拯救当前危急形势中起“一鸣惊人”的作用。21日,他又建议英奥缔结防御同盟,英国愿意提供一笔款项以保证奥国在边界地区动员足够的军队,同时邀请奥国

①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91页。

② 《英国蓝皮书》,第81卷(1878)，“土耳其”第3集, No. 6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 B集, 第3卷, No. 788

④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96页。

⑤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596—597页。

和英国发表一个对俄国的联合照会，禁止俄国未经英奥同意不得占据保加利亚和改变海峡地区现状。<sup>①</sup>但是，奥国仍然怀疑英国作为一个盟国的价值。迪斯累里的好大喜功，内阁的四分五裂、反对派的兴风作浪、公众舆论的朝秦暮楚，这一切使安德拉西担心英国政府想借助奥国之手威逼俄国而自己按兵不动。安德拉西在21日和22日与英国大使布坎南谈话中，一面表示奥国“有行动能力”，一面则坚持英国必须“先走一步”，认为英国应让安纳托利亚海岸士麦那(Smyrna)附近的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保卫自己的海上利益。他说，英国政府在议会召开之际踌躇不决的态度使它“在奥国乃至整个欧洲失去了份量”，英国政府“看来并不愿自己担负起责任，英国行动系要取决于议院是否同意，因此，只有当女王陛下政府采取积极的物质措施、证明它的国家将在抵制俄国意图和保护英国利益方面给政府以支持时，他才能够答应采取与英国协调的任何方针”。<sup>②</sup>这里不妨对奥国的态度再说几句。安德拉西在谈判中鼓励英国以实际行动抵制俄国单方面解决缔和问题，但他并没有公开亮相站在英国一边采取与俄国决裂的敌对行动。安德拉西政策的基础是在保证德国的支持，他1月25日对卡罗尔依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不使他（按：指俾斯麦）处于在我们与俄国之间作选择的困境”。<sup>③</sup>1月底，安德拉西在会见调任维也纳的新任英国大使埃利奥特时，拒绝了英国政府

①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099页。《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771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s. 776, 779

③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295页。

希望在议会披露英奥存在亲密谅解的想法。<sup>①</sup>安德拉西在给博伊斯特电报中对奥国态度作了解释：英奥发展成一种同盟关系，“将会使其他大国采取保留态度。如果两国采取单独的且又是一致的行动，那么我们的观点则表现出是一种欧洲的观点，其他签字大国就不能予以否定”。<sup>②</sup>

一方面，俄土停火谈判已经开始，迪斯累里担心“俄土就海峡问题达成损害其他大国的私下安排”。<sup>③</sup>另一方面，安德拉西的反应对英国形成一种压力，迪斯累里增加了采取措施以影响奥国态度的愿望。1月23日，迪斯累里使内阁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派遣英国地中海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二是要求议会增拨军事预算。1月24日，英国海军上将霍恩比奉命率领舰队离开士麦那，驶向海峡。但第二天，命令撤回，舰队停留在贝斯开湾。英国之所以召回舰队，按舒瓦洛夫的说法是由于苏丹的请求，土耳其害怕俄国借此中止谈判进而攫取君士坦丁堡，坚持要英国公开声明这样做并非苏丹的意愿。<sup>④</sup>按迪斯累里的解释，当时莱亚德拍来电报说，俄国条件中规定海峡问题将由“大国会议与俄国皇帝之间解决”，这一点使英国政府重新考虑了派遣舰队的决定。<sup>⑤</sup>实际上，莱亚德获知的俄国条文有讹误，他随后拍出的电报将其更正为由“苏丹陛下与俄国皇帝之间解决”，但政府已发出撤回舰队的命令，覆水难收，而舒瓦洛夫方面极力解释并保证海峡问题以后将由欧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782

②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干尔》，第198页。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02页。

④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5卷（1946. 11），No. 305

⑤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03页。



洲大国协商解决，迪斯累里抱恨收场。内阁1月23日的决定导致了外交大臣德比和殖民大臣卡纳文的辞职，可是在舰队撤回后，由于考虑到德比去职对保守党团结和议会关于军事预算投票的影响，外交大臣仍被劝告留任。内阁召回舰队和外交大臣复职两件事说明了英国政策不稳定性的一面，但达达尼尔海峡口掀起的波澜反映出英俄关系紧张对峙的程度。德国驻英大使明斯特的评论说：“英国不能忍受俄国在没有英国参与的情况下与土耳其缔结和平，因为不能设想这样的和平会不触动现有条约保证和不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英国狮沉睡已久，现在睁圆环眼发怒了。”<sup>①</sup>

土耳其政府对英国在俄土战争期间有条件中立的态度深感失望，虽然迪斯累里一再表示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决心，鼓励土耳其人抵抗，但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一个分裂的内阁追随这种政策始终是个疑问。普列夫那丢失后，英国并没有为土耳其人从俄国争取到和平，使局面转危为安。德比甚至警告土耳其，不要指望英奥会提供军事援助和丧失与俄国谋求停火的机会。<sup>②</sup>莱亚德在1月10日向国内政府报告说，土耳其人中普遍产生了一种被遗弃的怨恨情绪，对英国政府抱不信任感；为了避免帝国覆灭，他们倾向与俄国妥协，以期获取尚能得到的最好条件。<sup>③</sup>据查对，伦敦收到这封信件的时间是1月23日，不难设想它对迪斯累里决定动用地中海舰队或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但此时俄国军队的主力已压在阿德里安堡，

①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288页。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773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778

挥手之间即可进军土耳其京城,英国的海上行动不但远水不救近火,相反可能“助纣为虐”,造成土耳其的灭顶之灾,且还不计英国的动机是否那么纯洁。君士坦丁堡一片惊慌。1月24日,俄国统帅部尼古拉大公发出最后通牒,倘若土耳其代表再不接受缔和基础条件,问题将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解决。<sup>①</sup> 1月31日,两国终于在土耳其表示同意接受俄国条件后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商定的停火线,东线划在大柴克梅加(Buyuk chekemdje),距土耳其京城20余英里,南线划在乌萨(Ursha)到沙克奥(Shazkioi),与布莱尔相望。协定内容基本上和俄国波拉登会议通过的条件相同,只是删去了原来提及奥国的部分,海峡部分的内容改变为:“苏丹陛下和俄国皇帝陛下将取得一项谅解,以便确保俄国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与利益”。<sup>②</sup>

阿德里安堡停战协定签订后,安德拉西于2月4日正式向巴黎条约签字国建议,在维也纳举行一次欧洲会议。安德拉西声称奥国享有参加和平解决近东危机的正当权益,欧洲会议的目的是对俄土缔和条约做必要的修改,以确立未来“东方的政治体制。”<sup>③</sup> 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坦特登在得知俄土停火协定的条件时指出,这个和平只是一种“战争休息”,“积郁着未燃烬的战火”;英国继续奉行通过内部改革加强奥斯曼帝

<sup>①</sup>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358页。

<sup>②</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658—2660页。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同时也与土耳其缔结停火协定,门的内哥罗被俄国邀请参加停火。

<sup>③</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668—2669页。

国的传统看来难以维持，“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怎样防止欧洲免遭那个帝国崩解时的后果”。<sup>①</sup>

综上所述，1877年4月以来的俄土战争为大国关系的展开提供了新的活动舞台，战争虽然并没有造成一个奥斯曼帝国崩溃的现实，但是大大加深了危机，战争爆发之前列强在近东尚能维持的苟安局面正在遭到严重的破坏。英俄关系方面，从战争初期争取实现“小和平”的失败，到出现土耳其京城被俄英两国军事力量夹在中间的危急情况，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奥俄两个盟国产生了裂痕，无论在战神向俄国微笑还是皱眉的时候，奥国始终保持了中立，可是两国的鸿沟并不是靠“神圣的”王朝友谊与战前的秘密安排所能弥合的，正如一位奥国外交官谈到局势时说的：“除非奥国感到满意，否则就不会有和平。”<sup>②</sup>英奥关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虽然两国的地位及利益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彼此的疑虑也不易克服，但是已呈现出平行的抑制俄国的趋势。俄土战争期间，德国采取了不干涉的政策，俾斯麦几乎在他乡下幽静的庄园里度过了所有的时间，然而危机的紧迫性使他不得不担当起自诩为“诚实的掮客”的角色。

山雨欲来风满楼，近东危机的最后归宿何在呢？

①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364页。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3卷，No. 756

## 第五章 被扰乱的平衡

### 一、海峡危机和俄奥德三方会谈

1878年2月初奥国召开欧洲会议的建议提出后，俄土缔和的问题与欧洲会议的问题便发生了有机联系，俄土方面缔结最后和约而不受欧洲干预的可能性实际上已被排除。鉴于哥尔查科夫1月间在与奥、英交涉过程中同意把有关欧洲利益的问题留待大国方面共同处理，因此近东危机的解决可望经过这样的途径：一方面俄国继停战协定后直接与土耳其谈判缔和的问题，另一方面欧洲列强准备以国际会议的形式参加对近东事务的最后安排。但是，在圣斯蒂法诺预备条约签订（3月3日）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英俄奥三大国矛盾空前激化，战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严重地威胁着苟安的和平，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危机的前景始终飘忽不定。

2月初，俄军根据停火安排占领哈塔尔加(Chataldja)，土军撤出柴克梅加一线。由于英国并未被告知双方停火安排的细节，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方向的推进引起英国惊慌，反俄舆论蜂起。伦敦盛传苏丹已准备下逃难用的铁甲舰，君士坦丁堡不久将放弃。英国女王不断对内阁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防止俄国玩弄停火骗局。<sup>①</sup> 英国政策的控制权从1月下旬起为迪斯累里、索尔兹伯里和凯恩斯三人组成的“核心内阁”掌握，索尔兹伯里对俄国的态度已转向强硬。<sup>②</sup> 2月8日，尽管英国内阁此时得到了关于俄国停火线范围的消息，但还是决定派遣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保护在那里的“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sup>③</sup>。霍恩比这一次率领舰队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可因为不能取得土耳其政府同意，又折回贝斯开湾。英国内阁怕在欧洲面前再次沦为笑柄、助长俄国气焰，于是不顾土耳其态度如何，在2月13日第三次命令舰队进入海峡。英国5只军舰一直开到王子岛，后经莱亚德安排，移往离君士坦丁堡10余英里的穆达尼亚湾(Mondania)。<sup>④</sup>

海峡地区风云骤起，英国的海上示威使两国之间出现了剑拔弩张的战争气氛。英国在外交上有失策之处，连莱亚德也提出疑问，英国究竟是想要与俄国作战还是与土耳其作战、抑或准备与两国同时作战。<sup>⑤</sup> 而且，英国所谓的保护当地英国居民安全这个理由，给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同样的借口，俄国政府在2月10日通知欧洲各国，俄国考虑派部分军队进驻土京是不可避免的，并要求土耳其配合。<sup>⑥</sup> 从战略上看，英国

①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604—605页。

②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97—198页。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19—1120页。英国同时还邀请其他中立国参加，但未获响应。

④ 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388—389页，第394页。

⑤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316—317页。土耳其担心俄国抢先占领君士坦丁堡，要求英国制止军舰驶往土京。当时在英驻土使馆门口出现招帖，谓有一支舰队在贝斯开湾与土京之间的海面上失踪，知情者请报告迪斯累里，定有重酬。此乃对英国海上之举的讥诮。

⑥ 《英国蓝皮书》，第81卷(1878)，“土耳其”第14集，No. 1

的行动也存在漏洞。因为在俄国军队已经靠近布莱尔的情况下,英国若不取得对加利波利海岸的控制,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无异如老鼠关进了风箱。那么俄国军队为什么没有及时进入君士坦丁堡呢?按沙皇当时本意,并非不想占领,可是他给尼古拉大公的命令前后不一、缺乏明确性。先是说如果土耳其反对进驻,俄军必须准备武力占领,后又说如果英国人登陆,俄军行动不再受任何束缚,但要避免首先与对方发生冲突。<sup>①</sup>沙皇实际上把是否进入君士坦丁堡的问题留给了尼古拉大公判断。然而尼古拉大公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拿不准沙皇意图,害怕承担引起同土耳其谈判破裂和同英国开战的责任,以致失掉时机。<sup>②</sup>2月24日,伊格纳切夫和尼古拉大公迫使万般无奈的土耳其政府作出让步,俄国军队进驻距君士坦丁堡仅8英里的一个渔村——圣斯蒂法诺。

当英俄两国战争危险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德比和舒瓦洛夫为维持苟安之局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德比复职后继续履行着对外交涉的职责,但受到了来自内阁中鹰派的巨大压力。舒瓦洛夫说,如果英国的荣誉再受到损害,好战势力甚至会疾呼“把德比勋爵吊在海德公园的第一棵树上”。舒瓦洛夫还自述自己是如何全副身心地去赢得“每一天,每一小时”,以推迟两国冲突的发生。<sup>③</sup>在俄军进入君士坦丁堡从逻辑上看来“不可避免”时,德比和舒瓦洛夫寻找的新的“安全阀”是加利波

①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375—378页。

② A·奥诺:《N·伊格纳切夫伯爵的回忆录》(第3部分),《斯拉夫评论》,第11卷(1932.7),第109—113页。该材料中记述了伊格纳切夫抵阿德里安堡后与尼古拉大公之间发生的分歧。

③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5卷(1947.4)Nos. 340,342

利：俄国于2月17日对德比的“最后要价”作了“最后让步”，答应不占领加利波利，条件是英舰士兵不能在海峡两岸登陆。<sup>①</sup>当时英俄正在为获取土耳其战舰展开激烈竞争。迪斯累里试图通过莱亚德秘密从土耳其购买4艘战舰，消息泄露后俄国对英作出警告，伊格纳切夫则在与土耳其的谈判中威胁，土耳其若不把战舰交给俄国，俄军将占领君士坦丁堡。但土耳其方面宁可沉船也不想把战舰交外国支配。2月21日德比致俄国政府备忘录指出，如俄军未经土耳其同意进入土京，英国将召回驻俄大使并拒绝参加以后的欧洲大国会议。<sup>②</sup>俄国一方面策略地表示，大国会议不是俄国的主意，英国抵制大国会议令人欣慰，另一方面则在2月25日重新宣布，除非为土耳其或英国的行动所逼迫，俄国不准备进入土京。<sup>③</sup>至此，尽管英俄危机仍在延续，但君士坦丁堡问题稍有缓解，英国并没有直接提出把俄军进入君士坦丁堡看作“宣战理由”，而俄国也不再坚持进入君士坦丁堡是“不可避免”的了。

英国倘然得不到陆上国家军队的支持，单凭海上力量与俄国军队匹敌有一定困难。迪斯累里在2月海峡危机期间再次与安德拉西秘密接触，讨论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奥国进行军事动员的问题。<sup>④</sup>安德拉西已考虑到对俄战争的可能性，他在奥匈帝国大臣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实行部分军事动员的主张，但由于军方反对以及财政方面的困难，他的主张未被通过，奥

①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5卷(1947.4)，No. 341

②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6卷(1948.4)，No. 361

③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6卷(1948.4)，No. 366

④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20页。迪斯累里当时已获议会同意增拨600万英镑军费。

皇仍决定主要依靠外交手段捍卫奥国利益。<sup>①</sup> 安德拉西在与英方交涉的过程中,坚持要求预先得到一笔至少 100—125 万盾的秘密补助金,理由是这种性质的款项无需经英奥两国议会讨论,奥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可随时根据情况的需要顺利地完成。可是迪斯累里只能提供一笔借款,并且希望奥国立即动员 30 万军队。<sup>②</sup> 迪斯累里诱使奥国军事合作,旨在向俄国显示,如俄国敢于占领君士坦丁堡或拒绝修改俄土缔和条约,它将遭到英奥两国的武力抵制。但除了奥国内部的原因以外,安德拉西对英国怀有戒心,无意将奥国军队绑上英国战车,即使进行军事准备的话,也是把它看作捍卫奥国利益要求的独立的行动。英奥都企图利用对方力量抑制俄国却又深恐为对方作嫁衣裳,双方交易没有做成,但是两国在危机高潮时把交涉范围扩大到经济援助的问题,进一步表明了他们反对俄国单方面改变近东现状的决心。

自奥国提议召开欧洲会议讨论俄土缔和问题后,情况对俄国来说是一目了然的:俄国要是不能与英国或奥国达成某种会前安排,欧洲会议召开时它将遇到英奥两国的联合反对。同英国达成安排的可能性在海峡危机时期显然不存在,而正是安德拉西表示奥国愿意继续与俄国保持协调的态度,促使俄国不坚决反对关于欧洲会议的建议。因此俄国顺理成章地把参加欧洲会议和继续保持与奥国在赖希施塔特传统下的合作联系在一起考虑。这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俄国希望得到德国的帮助。俾斯麦是不愿看到奥俄冲突的,这种立场或能形成

① F·R·布里奇:《从萨多瓦到萨拉热窝》,第 86—87 页。

②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 217—219 页。



对奥国的牵制,使它同意与俄国保持合作。在1月下旬就俄国缔和基础条件交换意见时,德皇曾提议由俄奥德三方举行会谈以消除俄奥分歧。他认为,既然德国在1870年战争时有权占领法国领土而不遭欧洲反对,为什么亚历山大皇帝在对土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却被要求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呢?①哥尔查科夫赞成德皇提议并对俾斯麦施加压力,他通过俄国驻德大使乌布里向俾斯麦指出,奥国皇帝虽然愿意维持三皇联盟,但安德拉西已背离联盟而更接近英国;由于奥国开始反对俄国,英国加强了威胁态度,如果俄国在军事胜利后蒙受政治失败,罪魁祸首则是奥国。②

从奥国方面来看,安德拉西对三方会谈并不很积极,他更愿意通过在欧洲会议上与其他大国的外交合作来限制俄国,并使奥国在巴尔干的权益带上欧洲允许的性质。正如前一章已分析的,奥俄的安排实际上不能给奥国以这样的好处。俾斯麦认为安德拉西提出召开欧洲会议“这步棋”是想作为同英国接近的桥梁。③安德拉西在2月12日通知德国说,如果德国支持奥国关于保加利亚等问题的立场,奥国乐意参加三方会谈,否则就宁可在欧洲大国会议上讨论,因为那样奥国可依靠其他国家的支持而德国不需被迫放弃保留态度。他表示,1866年以后的奥国注定“要在东方占有主导地位,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允许造成与奥国根本利益相违背的情况”。④可是安德拉西无法回避这个由德国提议并为俄国所同意的三方会

①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5卷(1947.4),No. 323

② 《德国文件》,第2卷, No. 324

③ 《德国文件》,第2卷, No. 305

④ 《德国文件》,第2卷, Nos. 318—319

谈,其参加会谈的动机一如卡罗尔依所说,这可给德国提供一个合适的机会:在不公开反对俄国的情况下为奥国利益进行调解。<sup>①</sup>

2月25日和3月2日,安德拉西、诺维可夫、德国驻奥大使斯托伯格在维也纳举行三方会谈。然而,如果说英国不能获得奥国的军事合作的话,那么俄国企图在三皇联盟范围内克服奥国的反对则完全是徒劳。斯托伯格在会谈中抱严格中立的立场,对双方都不施加压力。俄方仍按1月间沙皇致奥皇信中的调子,阐述阿德里安堡的条件是新形势下不可削减的最低要求,建立一个藩属自治的大保加利亚是出于对保加利亚民族完整性的尊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可保留给奥国。安德拉西谴责俄国方案是“东正教斯拉夫的说教”。他援引布达佩斯条约作根据,说原来双方同意的是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如果土耳其对西部地区的宗主权还将维持,保加利亚范围就不应该过分超过巴尔干山脉,切断君士坦丁堡与西部地区的连接。<sup>②</sup>安德拉西没有提出具体要求,之所以搬出布达佩斯条约与俄国周旋,无非是一种虚与委蛇的策略,以便在三皇联盟的名目下继续保持奥俄协调的旗号,诱使俄国同意出席欧洲会议。俄土圣斯蒂法诺预备条约缔结后,俄奥德三方会谈即告停止。

近东危机的日益严重化促使奥俄两国都对德国增加了要求支持的压力,但俾斯麦仍然把维持三皇联盟作为在欧洲孤立法国的保证,决不想因为巴尔干争端而与奥俄任何一方决

<sup>①</sup>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221页。

<sup>②</sup> 《德国文件》,第2卷, No. 328

裂。俾斯麦赞成举行三方会谈即表明，他支持以俄奥和解代替俄奥冲突。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拒绝了安德拉西在2月28日通过斯托伯格提出的建立德奥防御同盟的建议。安德拉西再三强调，奥匈二元帝国的荣枯与德帝国利益密切相关，奥国内部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同情德国而斯拉夫人仇视德国，奥国利益若受打击将危及现行的二元体制；斯拉夫民族是罪恶之渊藪，这种特性以俄国人最为显著，他们的真正同情在法国一边；德俄之间的友谊纯粹是当今两国皇帝人为的产物。俾斯麦在解释不能接受建议的理由时说，这个同盟的实际价值是有问题的，如果保守秘密，则既不能使俄国服从奥国要求也不能减少战争危险，如果予以公开，必被沙皇以为针对俄国，促成俄法意联合，挑起战争；此外，目前尚不能肯定安德拉西以后的接班人是否会继续奉行亲德政策。<sup>①</sup>这当然丝毫不意味着俾斯麦无视奥国的利益要求，他所表白的理由明显掺合着对奥国的善意。俾斯麦曾对俄国大使乌布里表示，德国将拒绝被推到在三皇联盟两个盟国之间作选择的境地，俄国想拿下君士坦丁堡，德国不予反对，但俄国应尽可能地满足奥国的要求，德国无意对奥国施加向俄国让步的压力。<sup>②</sup>俾斯麦还鼓励奥国从英国获取经济援助、以增强与俄国打交道时的地位，他不愿出现奥国输在俄国人手里或安德拉西因此而下台的情

<sup>①</sup>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222—224页。这里所揭示的史实是很有意义的，尽管俾斯麦严守中立，但在奥俄关系出现裂痕时，德奥关系比德俄关系要更接近。同时必须看到，威廉皇帝和亚历山大皇帝的友谊是德奥建立同盟的严重障碍。

<sup>②</sup> 参见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440页。

况。<sup>①</sup>尽管如此，俾斯麦认为与俄国这个老朋友翻脸争吵是一项很坏的政策，必须加以防止。他写道：“哥尔查科夫三年来对德国的不信任态度使我们增加了一种责任：务必谨慎地、有节制地妥善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sup>②</sup>英国大使拉塞尔怀疑德国政策是否在本质上有利于俄国，俾斯麦立即作了澄清，说德国“奉行严格中立的立场，目的是为了在一旦出现有利时机时提供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sup>③</sup>

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当时向舒瓦洛夫谈到一个“从未改变的看法”，认为俾斯麦想唆使俄国在对土战争之后再进行一次战争，由于俄奥战争将会在靠近德国边界的地区发生，俾斯麦必然要加以阻止而策动把战争对象确定在英国。<sup>④</sup>不管德比是出于偏见还是有其他动机，英俄战争对俾斯麦来说同样不可取。虽然俾斯麦未必不愿意看到俄国人把对奥国的愤怒转嫁到英国头上，但英俄战争冲突则是另一回事，这样的战争很难是一次局部性战争，同时它对欧洲大国组合引起的连锁反应只能是凶多吉少。按照俾斯麦的看法，任何大国战争都没有必要，东方问题还是要在牺牲土耳其的基础上由列强谋求妥协来解决。2月中旬他向拉塞尔阐述了这种看法：战争的命运和列强的中立已经使俄国占据了土耳其的领土，俄国可能因战争胜利的狂热而设法拖延甚至抵制欧洲会议，但大国维持和平的希望并没有消失，奥国皇帝不一定主张战争。英国也无需把海峡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封锁海峡出口便能保证安全，拥

①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4卷，No. 222

② 《德国文件》，第2卷，No. 310

③ 引自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587页。

④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6卷（1948.4），No. 378

有制海权总比一个条约更有力量；只要英国占领埃及、奥国占领波黑两省，战争危险就可以消除，“东方问题就构不成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假如英奥真的联合对俄作战、并且取代了俄国人现在占有的位置，“苏丹的独立不会因此而重新确立，东方的权力再分配依然不可避免”。<sup>①</sup>

关于德国以后在东方问题上的地位，俾斯麦2月19日在国会演说时提出了著名的所谓“诚实的掮客”的命题。他认为，巴黎条约的改变需要得到签字国同意，这势必会引起“一大堆灾难性的问题”，但欧洲土耳其省份将如何组织，原则上与各方现在持有的想法没多大不同，故而大国方面不具有进行战争的充分理由；鉴于列强已考虑召开欧洲会议来解决分歧，德国希望在争议的各方之间起最谦和的调解作用，就好像一名真正想撮成交易的“诚实的掮客”，德国既可以是奥俄之间，也可是英俄之间最出色的值得信赖的代理商，但是“把德国的底牌摊到桌面上，大家都会知道怎样打赢它，如果我们希望谈判实现和平，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人都想得到一张德国政策的清单，所以德国不能预先表态，否则就起不到那种调解作用。<sup>②</sup> 俾斯麦显然已敏锐地觉察到东方问题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情况，尽管在各种凶猛的竞争力量之间调解可能会使德国吃力不讨好，但大国之间的分赃谈判毕竟是避免大国战争的替代物。“诚实的掮客”的命题不过是新形势下德国坚持以保留态度维护自己地位的翻版。应该承认，俾斯麦的态度

<sup>①</sup>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4卷，No. 225。俾斯麦闻讯英舰驶入马尔马拉海时说，如果他是英国首相，将命令舰队返回，去占领埃及。

<sup>②</sup> M·D·梅特利科特和D·科文内编：《俾斯麦与欧洲》（文件集），第193—104页。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05页。

对于牵制有利害冲突的近东大国不发生战争确实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战争是否发生依然取决于英奥俄方面。

## 二、圣斯蒂法诺预备条约

1878年3月3日,结束俄土战争的“预备”条约在圣斯蒂法诺签订。俄国对土缔和谈判是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俄国已经兵临土耳其京城的大门,决计不肯失去这个百年难逢的重新改造奥斯曼帝国的机会,另一方面,俄国又面对着英奥方面的巨大压力。舒瓦洛夫和诺维可夫频频从伦敦和维也纳发出可能有与英奥发生战争危险的警告。与这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是自从这个危机发生以来俄国内部始终存在的政策分歧。在伊格纳切夫1月下旬离开圣彼得堡前往土耳其谈判后,哥尔查科夫经沙皇同意把战船通过海峡的问题排除出了俄土缔约的范围,并几番向奥国允诺可以占有波黑两省。伊格纳切夫则踌躇满志,不遗余力地想以最苛刻的条件束缚土耳其,他所依恃的力量的基点是,土耳其已对俄国军事威力感到战悚,英奥方面终究不能诉诸于武装抵制。<sup>①</sup>但不管怎样,俄国方面明显意识到时间对土耳其有利,土耳其军队可能得到重新组织的机会,预拟中的欧洲会议也会愈来愈给谈判

---

<sup>①</sup> A·奥诺:《N·伊格纳切夫伯爵的回忆录》(第2部分),《斯拉夫评论》,第10卷(1932.4),第673页。自危机开始以来,伊格纳切夫始终是俄奥协调的反对者,因而他在进行圣斯蒂法诺条约谈判时,仍然未被告知俄奥秘密协定的细节,结果铸成大错。圣斯蒂法诺条约关于波黑两省问题的处理完全违反布达佩斯条约,导致奥俄关系进一步恶化。既然哥尔查科夫已答应奥国取得波黑地区,圣斯蒂法诺条约的规定就起码应该保持一致,这是俄国政策内部分歧造成外交被动的一个例子。

增加困难。为了保证在主要问题上使欧洲面临一个既成事实，哥尔查科夫一再催促伊格纳切夫尽快缔结俄土和约。谈判实际上从2月14日在阿德里安堡时已开始，中间因海峡危机一度中断。萨菲特帕夏是伊格纳切夫的谈判对手，极力试图拖延谈判，但俄方把最后的缔约日期定在3月3日（俄历2月19日）——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纪念日。当圣斯蒂法诺预备条约在这一天签订时，尼古拉大公致沙皇电文说：“值此农奴解放之日，陛下已使基督徒摆脱穆斯林的桎梏而获得了自由。”<sup>①</sup>

圣斯蒂法诺条约共计二十九条。条约承认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独立。塞尔维亚得到尼西(Nich)一带，但不包括皮罗特(Pirot)、弗拉涅(Vranja)、米特罗维察(Mitrovica)；门的内哥罗得到黑塞哥维那的大片领土，其中包括靠近亚德里亚海岸的安蒂瓦里(Antivari)和杜里齐尼奥(Dulcigno)；新帕扎尔地区分配给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但中间隔开，留出一条狭长的通道，以便保持从阿尔巴尼亚到波斯尼亚的连接。罗马尼亚得到多布罗加，作为俄国换取比萨拉比亚南部的补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将根据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大国的最初方案进行改革，伊庇鲁斯、色萨利和欧洲土耳其和其他地区按照1868年克里特组织法实施管理。土耳其战争赔款总数为14亿1千万卢布，实际赔款数为3亿1千万卢布，其余以割让领土方式偿付俄国，因此除了上述多布罗加

<sup>①</sup> 引自B·杰拉维奇：《圣斯蒂法诺条约的谈判》，《东南欧杂志》，1979年，第2期，第182—183页。该文叙述了俄土谈判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情况。(B. Jelavich, Negotiating the Treaty of San Stefano, *Southeastern Europe*)

省外,俄国取得阿尔达罕、卡尔斯、巴统、巴亚济特以及直至萨干洛(Saganlough)的亚洲地区。两海峡则规定“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对来往于俄国港口的中立国商船予以开放”。

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核心部分是保加利亚。条约宣布“保加利亚建成自治的和纳贡的公国,有一个基督教政府和一支民兵武装”。保加利亚的最后疆界将由俄土特别委员会具体划定。条约“考虑到多数边界居民的民族起源,以及地形条件和当地居民交通便利的实际需要”,新边界的轮廓将东起黑海沿岸,西至塞尔维亚新边界。南线包括吕勒布尔加斯(Lule Burgas)地区、莫纳斯提尔地区及含有瓦尔达尔(Vardar)、斯特鲁马(Srtuma)、曼斯它(mesta)三条河流出海口的爱琴海沿岸地区,萨洛尼卡和阿德里安堡不在新边界范围内。该公国拟由数目不超过5万人的俄国军队占领二年,以俟当地建立起一支“足以能够维持秩序、安定和稳定的民兵武装”。条约规定将在十五天内互换批准书。双方“自批准之日起即正式受条约约束”。<sup>①</sup>

圣斯蒂法诺条约是阿德里安堡停战协定的继续。伊格纳

---

<sup>①</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672—2693页。兰格曾指出,圣斯蒂法诺条约的保加利亚是根据当时著名地理学家基伯特地图设计的,反映了当地居民的民族特性。(见W·L·兰格:《欧洲的同盟与阵线》,第139页)。赛顿·沃森则认为,无论从地理原因和民族特性看,这个条约都意味着是一个失败。他举出基伯特本人的评价作为证据,基伯特曾说圣斯蒂法诺绘制的边界“是不很谨慎的,无视了地形条件”。(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335页)。然而,不管两者的说法如何不同,从列强外交斗争的角度来说,边界划分的科学性问题并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泛斯拉夫性质着重体现在它的亲保加利亚倾向,表明俄国企图把保加利亚作为控制欧洲土耳其的据点。正因为此,它不仅为其他近东大国所反对,而且遭到巴尔干地区其他小国的敌视,比如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等。



切夫在谈判中勒索到了除海峡问题以外几乎所有期望得到的东西。3月17日，俄土双方在圣彼得堡如期互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这一城下之约，不仅是对俄国10个多月所进行的艰苦战争的报偿，同时也凝聚着俄国20多年来卧薪尝胆、一心重新称雄近东的梦想。然而，尽管圣斯蒂法诺条约对土耳其来说具有充分的约束力，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不得经过欧洲的同意。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命运如何？预拟中的欧洲会议是否会成为这个条约的祭坛呢？

对于预拟中的欧洲会议的讨论，2月初奥国建议提出后即已在列强间开始。安德拉西最初建议会议的地点是维也纳，会议的规格按当时理解是大使或特使级(Conference)。但哥尔查科夫不赞成会议在其对手的首都维也纳或伦敦举行，而宁愿选择柏林或其他小城市(如巴登·巴登)，同时考虑到他本人将亲自出席这次事关欧洲利益和俄国荣誉的会议，所以主张把规格上升为首脑级(Congress)。俾斯麦虽然并不乐意当东道国，但到3月初局势已经明朗，柏林不可避免将成为欧洲会议的地点。<sup>①</sup>安德拉西3月6日发出照会，接受俄国关于俄土缔和条约涉及欧洲利益的条款将经欧洲会议讨论同意后生效的保证，赞成会议升格和同意柏林作为会址。<sup>②</sup>英国对选择柏林感到犹豫，担心三皇联盟会得到机会重演柏林备忘录的旧剧，因而3月9日发表的声明虽然同意柏林作为会址，但提出俄土缔和条约的所有条款都必须经欧洲会议审议，否

① 《德国文件》，第2卷，No. 333

② 《英国蓝皮书》，第81卷(1878)，“土耳其”第24集，No. 9

则视为无效。<sup>①</sup>此后,对欧洲会议的讨论便从地点、规格的问题转到权限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是在会议是否被赋予批准整个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权利。法意两国方面没有引起障碍。法国要求不讨论埃及、突尼斯、巴勒斯坦、圣地等问题,<sup>②</sup>意大利关心“海峡和地中海地区共同利益的问题”,<sup>③</sup>均与争议焦点无涉。真正的困难是在英俄之间,双方都不愿从已宣布的立场后退,从而使讨论陷入死胡同。

无论从保持俄国的荣誉或战争胜利的成果看,俄国决不肯同意把圣斯蒂法诺的所有条款递交欧洲会议批准,那样无异是将俄国置于屈辱的被判的地位。哥尔查科夫仍然在“欧洲利益的原则”上做文章,指示舒瓦洛夫转告英国,会议上如有代表提出有关欧洲利益的问题,我们不会阻拦,但我们决不能在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些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预先做出接受的承诺。<sup>④</sup>由于俄国坚持圣斯蒂法诺条约要在俄土完成批准手续后才公布于众,英国更加相信俄国企图单方面造成既成事实。英国提出质问:“欧洲利益”的含义是什么?“会议将如何决定哪些条款是或者不是有关欧洲利益的呢?”<sup>⑤</sup>如果说俄国曾以捍卫“欧洲利益”的名义发动了对土战争,又曾以答应日后磋商像海峡地位这样的“欧洲利益”的问题来排除其他大国的干涉,那么英国现在想把全部俄土战争的结果看成是欧洲

---

① 《英国蓝皮书》,第81卷(1878)，“土耳其”第24集, No. 6,《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26页。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4卷, No. 231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4卷, No. 228

④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6卷(1948. 4), No. 390

⑤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4卷, No. 229

利益的问题了。哥尔查科夫继续以模糊而又难以辩驳的外交词令来维护俄国的立场,他说:“我们不存在秘密安排,整个条约将在会议前通知各国,所有参加国都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我们要求有同样的权利”。<sup>①</sup>安德拉西一心想撮成会议,认为英奥对召开会议的利益要比俄国大,俄国既然把整个条约通知各国,其余就是会议的事情,俄国让不让步对会议的决定无损;此外,英奥都已赞成不受会议多数束缚的原则,如何能要求俄国必须事先允诺应受束缚呢?<sup>②</sup>英国不为所动,坚持把俄国的明确答复作为英国考虑是否参加会议的条件。舒瓦洛夫曾设想会议不一定坚持英国参加,但俾斯麦表示反对,说德国遵守严格中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同意出席的情况下才愿意做东道国。<sup>③</sup>3月26日,舒瓦洛夫答复英国政府:俄国允许其他大国在会议上提出问题的自由,但俄国保留有接受和拒绝会议决定的自由。<sup>④</sup>迪斯累里的态度毫不示弱,私下表示如果召开会议的计划不得不放弃,英国将通知俄土两国:不承认圣斯蒂法诺条约,并召回驻俄大使。舒瓦洛夫在致哥尔查科夫信中迪斯累里无视俄土战争结果的态度作了辛辣的讥讽,认为这正如天下过雨后说没下,“即使这场雨已滋润了土壤,地面上长出了新鲜植被,却仍被当作啥也没发生。”<sup>⑤</sup>

①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6卷(1948.4),No.396

②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4卷,No.249

③ 《英国外交事务机密文件》,B集,第4卷,No.238。德国曾建议先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就会议召开的基础取得统一意见,但被英俄两国拒绝。

④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6卷(1948.4)No.407

⑤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6卷(1948.4)No.412。舒瓦洛夫此时因被谴责与英国反对派秘密接触,和迪斯累里的关系搞得很僵。俄国方面主要想把欧洲会议不能召开的责任推到英国头上。

自英俄在欧洲会议权限问题上发生争执起,迪斯累里已在作各种战争准备,以阻止俄国利用圣斯蒂法诺条约制造既成事实。霍恩比的舰队准备随时奉命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威胁黑海出口。3月上旬英国内阁同意,如果欧洲会议开不成的话,为了保障英国的海上利益,必要时以武力在地中海东部攫取一个海军基地。<sup>①</sup>迪斯累里还策划建立一个针对俄国的地中海联盟。<sup>②</sup>3月下旬,由于俄国明确拒绝英国提出的审查圣斯蒂法诺全约的要求(条约已于22日通知英国),同时传闻俄军准备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岸高地、伊格纳切夫已去维也纳活动谋求谅解,英国内阁则在27日作出决定,将召集两个军团的预备队和从印度派遣一支远征军占领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和塞浦路斯,以便控制海域并“抵消俄国在亚美尼亚的势力”。<sup>③</sup>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不能接受这种占领一个未交战国领土和可能导致与俄国战争的冒险措施,终于提出辞呈。

关于德比辞职的原因,他本人在与舒瓦洛夫的谈话中有

---

①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26—1127页。英陆军部官员霍姆上校为防卫君士坦丁堡问题曾去土耳其海峡地区考察地形,其在“关于东方问题之战略方面”的备忘录中提出塞浦路斯是英国选择海军基地的适宜地点。见D·E·李:《一份关于塞浦路斯的备忘录》,《近代史杂志》,第3卷,(1931.6)第236—241页。(D. E. Lee, A Memorandum Concerning Cypru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② 迪斯累里的地中海联盟计划包括意大利、希腊、奥国和法国。但当联盟建议首先向意大利提出时,恰逢当时亲英内阁倒台,新上台的凯罗里内阁无意卷入近东纠纷,予以拒绝。因此,该计划一开始就遭到破灭。(D·E·李:《预拟中的1878年地中海联盟》,《近代史杂志》,第3卷(1931.3),第33—45页。D. E. Lee, *The Proposed Mediterranean Leagu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34—1137页。

所披露,一是因为不赞成政府现在决心采取的措施,二是由于无法打破在欧洲会议权限问题上与俄国相持不下的僵局。德比引咎自责,说作为外交大臣,他应对提出要求审查圣斯蒂法诺全约的政策负主要责任,没有想到因此伤害了俄国。<sup>①</sup> 德比的话里确有实情,可是舒瓦洛夫的评论也许更加直截了当。舒瓦洛夫不无缺憾地写道:“德比勋爵现在离开了,但我相信,正是应该感谢他的努力,才使和平维持到今天而我们能在英国干涉之前打败了土耳其。这种结果恰恰是他下台的真正原因。”<sup>②</sup> 德比对俄国的妥协态度使他无法与迪斯累里“核心内阁”共事下去。造成这个悲剧的根由是,他既不能跳出英国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传统框框,制定出一项明确的保护英国威信与利益的政策,又不能适应危机的严重形势、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但德比毕竟深居内阁要职,还是识得“庐山真面目”的,他在向舒瓦洛夫表示希望英俄今后保留谈判的余地时说,英国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反对集中于两点,一是担心俄国获得主宰君士坦丁堡未来命运的地位;他的同僚也许会接受在土耳其海域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补偿的办法,二是保加利亚范围太大,必须缩小。<sup>③</sup> 而这正是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以后解决危机的努力中予以实现的主要内容。

由于英国坚持欧洲会议有权对圣斯蒂法诺全约进行审议

<sup>①</sup>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365页。

<sup>②</sup> 引自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356页。

<sup>③</sup> 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352页。

与修改,俄国觉得迪斯累里内阁执意要羞辱俄国,与英国取得妥协没有指望。俄国最担心的是英国与奥国的联合,因而哥尔查科夫在给舒瓦洛夫的信件中指出,俄国要注意的问题是“要让对会议的拒绝来自英国方面。这样将使英国在其他愿意和平的大国中受到孤立,同时给我们以机会加强三帝国宫廷的协作”。<sup>①</sup>3月24日,沙皇派伊格纳切夫前往维也纳解释圣斯蒂法诺条约,目的是希望直接与奥国谋求谅解,孤立英国。然而,在圣斯蒂法诺条约签订以后,通常所谓俄国“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要经过维也纳”实际上已很难走通了。如果俄国不作出重大让步的话,奥国不会容忍圣斯蒂法诺条约所制造的俄国在巴尔干的优势。安德拉西此时已从国会获得6千万盾的经济预算,为的是必要时能采取最有力的警戒措施,增强奥国在最后解决近东问题上的发言权。安德拉西一方面继续主张召开欧洲会议而不管俄国是否同意对奥国的利益要求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则利用俄国害怕英奥联合的心理抬高了奥国保持中立的条件。因此在与伊格纳切夫的谈判中,安德拉西不再像一个月前三方会谈时那样只是一味指责俄国背弃秘密协定而是明确提出了关于修改条约的具体意见,力图保证奥国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地位不受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损害。冤家路窄,当危机发展的潮流把这两个争夺巴尔干的老对手卷到一条谈判桌上当面交锋时,圣斯蒂法诺条约的缔造者在维也纳大遭厄运,伊格纳切夫在4月初返回圣彼得堡时相信,除非设法使安德拉西下台,否则奥国不会承认圣斯蒂法诺条约的

<sup>①</sup>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8卷(1949.11),No.425

现实。<sup>①</sup>

奥国对圣斯蒂法诺条约提出的修正包括下述内容：(1)奥国将在通知土耳其政府后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新帕扎尔地区。占领日期待预拟中的欧洲会议开过以后确定；如果不举行欧洲会议，占领措施将立即实行。(2)门的内哥罗不得获取新帕尔地区，斯库塔里湖(Skutari)至波亚纳(Bojana)河口一带的海岸领土归属奥国。(3)塞尔维亚不得向西南方向获得领土，东南面可获得弗拉涅。(4)保加利亚的东南边界不得包括吕勒布尔加斯地区和一部分黑海沿岸地区，西南边界不得包括瓦尔达尔河流域。从弗拉涅以南到萨洛尼卡构成一个名为“马其顿”的新自治省，与保加利亚完全脱离。(5)俄国对保加利亚的占领不超过六个月，军队人数限制在二万人以下。此外，奥国承认俄国有权收复 1856 年失去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上述建议被奥国视为是继续忠于三皇联盟的条件。假如俄国同意奥国的修正意见，奥国将在预拟的欧洲会议上支持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其余部分，并且答应在出现英俄战争时对俄国保持“善意中立”。<sup>②</sup>

从奥国的修正意见看，它现在除了决定占领波黑两省外，还计划占领新帕扎尔。占领新帕扎尔的意义，不仅是为了阻止塞门两国利用圣斯蒂法诺条约获得该地区而具备结成大斯拉夫国的便利的地理条件，而且可通过筹措中从新帕扎尔的米特罗维察到萨洛尼卡的未来铁路线，将奥国的势力从波斯尼亚伸展到马其顿地区。如果说圣斯蒂法诺条约无视了布达佩

<sup>①</sup> 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 494 页。

<sup>②</sup> 《德国文件》，第 2 卷，No. 393

斯秘密条约关于奥国对波黑地区的要求,那么奥国提出占领新帕扎尔同样无视了这个秘密条约原来的安排。安德拉西的理由是俄土圣斯蒂法诺条约后出现了新的形势,无论要求缩小保加利亚的东南、西南边界的范围或要求占领新帕扎尔,都是为了使奥国利益与新的形势相协调。安德拉西决不肯让俄国在巴尔干独占鳌头,奥国至少要平分秋色。正如德国驻奥大使斯托伯格向国内政府指出的,安德拉西提出的条件超出了过去的要求,目的是在把整个巴尔干半岛西部以及亚德里亚海岸置于奥国势力的控制之下。<sup>①</sup>俄国对安德拉西的“不断增长的兼并野心”深恶痛绝,一面要求俾斯麦使用一切手段保持奥国的中立,一面向罗马尼亚境内调遣军队以备奥国的不测。伊格纳切夫赴奥使命的失败,表明三皇联盟的基础已经风雨飘摇了。

综上所述,随着结束俄土战争的圣斯蒂法诺条约的谈判与签订,大国在近东的力量平衡受到了严重扰乱。从2月英俄海峡危机及德俄奥三方调解性会谈失败,到3月英国内阁决心采取针对俄国的备战措施和伊格纳切夫出使维也纳碰壁而返,无一事件不预示着俄国与英、奥的关系濒于破裂的边缘。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斯指出,整个圣斯蒂法诺条约“等于是摧毁欧洲土耳其,等于是在俄国的保护下由斯拉夫人瓜分土耳其”。<sup>②</sup>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大保加利亚是主要受攻击的目标,有“小俄国”之称。欧洲普遍认为它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设置的一个被保护国,其地理范围之大、战略位置之重要将

<sup>①</sup> 《德国文件》,第2卷, No. 377

<sup>②</sup>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419—420页。



使俄国未来在土耳其事务中发挥优势的影响。英国谴责大保加利亚边界打破了海峡地区和爱琴海地区的“均势”而主张将其推回巴尔干山脉以北，<sup>①</sup> 奥国要求占领波黑两省、新帕扎尔及另辟马其顿省，其原因盖出于抵制建立大保加利亚给俄国带来的这种好处。另一个特别为英国所敏感的是圣斯蒂法诺条约的亚洲条款。俄国割取亚美尼亚人居住的领土被怀疑是南下征服计划的前兆，同时俄国若在亚洲土耳其获得优势，牵涉到英属印度的安全。索尔兹伯里给莱亚德信中指出：“俄国在欧洲土耳其省份的势力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远的间接祸害，而俄国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势力则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麻烦了，这种势力必然通过巴格达与孟买之间的联系，给我们对印度的统治带来更多的困难。”<sup>②</sup>

自从土耳其参加欧洲协调以后，大国建立在维持近东现状基础上的力量平衡是由 1856 年巴黎条约和 1871 年伦敦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加以保证的。无论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的三国保护体制还是 1873 年兴勃隆协定开始的奥俄合作，都不能代替列强以欧洲协调方式处理东方问题的传统和任何现状的变化必须经欧洲六强批准的原则。圣斯蒂法诺条约按俄国意志把俄土战争引起的近东地区现状的变化确定下来，明显侵犯了国际条约，背弃了处理东方问题的传统与原则，俄国因此而成了孤家寡人。正是基于此，哥尔查科夫给圣斯蒂法诺条约策略地冠以“预备”二字，显示俄国准备考虑其他大国有

<sup>①</sup> H·坦佩尔利和 L·彭森编：《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文件集），第 365—366 页。

<sup>②</sup> K·伯恩编：《维多利亚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第 414 页。

关“欧洲利益”的意见。从俄英对欧洲会议权限问题的争执中可以看出,俄国力图尽量使预拟中的欧洲会议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官样文章,1871年废除黑海中立化条款不是已有了一个成功的先例吗?但是,欧洲不会再按照伦敦会议的模式处理圣斯蒂法诺条约,承认这个从根本上推翻近东大国力量平衡的条约的合法性。在无法恢复俄土战争后近东已被破坏的现状的情况下,问题集中演变为如何谋求建立圣斯蒂法诺条约之后的新的平衡。这里呈现了历史的多样性,一方面圣斯蒂法诺条约反映了危机的严重性质,孕育着发生大国战争冲突的危险,另一方面它又为列强通过修改这个条约,结束三年来因彼此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造成的混沌局面提供一块可能的阶石。

百川归海。不管影响近东危机发展的各种因素和力量是怎样的错综交叉、纷繁复杂,恩格斯所讲的引起历史事变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此时聚合到一个方向:近东大国在瓜分奥斯曼帝国利益基础上的权力再分配是不可避免了。

## 第六章 冲突与妥协的十字路口

### 一、英俄协定与英土塞浦路斯条约

近东大国的权力再分配将经过怎样的途径实现呢？欧洲在冲突与妥协的十字路口徘徊。

欧洲会议的地址虽然已预拟放在柏林，但由于列强不能就这次国际性会议的权限问题达成意见，会议召开的时机并不成熟。圣斯蒂法诺条约加剧了危机的深度，战争冲突的危险促使近东大国进一步调整政策，其中以英俄出现的变化最为瞩目。自1878年4月份起，英、俄、奥转向通过双边谈判来保障自己在最后安排近东事务中的地位。英俄奥三角之间的双边谈判，跌宕起伏，是柏林会议前夕列强围绕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展开的外交角逐的中心环节。正是三角双边谈判及其他有关谈判折冲的结果，勾勒出了近东权力再分配的主要轮廓，为柏林会议奠定了基础。这些谈判几乎是同时交错进行的，为了对各国政策有个比较连贯的叙述，这里着重讨论英俄谈判与英土缔结的塞浦路斯条约，而后再分析英奥谈判及奥俄德三国关系。

3月底索尔兹伯里于危机高潮之际接替德比担任外交大臣，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结束了长期以来由于内阁分歧而形成的动摇与不稳定的状况。索尔兹伯里曾批评

英国政策像一条缓慢地在河里飘流的船只，“偶而伸出船篙以避免碰撞”，<sup>①</sup>说它“缺乏勇敢的主动性和确定的计划”。<sup>②</sup>君士坦丁堡会议期间，索尔兹伯里试图通过与俄国就改善基督徒命运的问题取得一项谅解来阻止俄土战争爆发，可是因土耳其的反对和英国政策本身的两面性，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战争发生以后，他在内阁中保持了和德比的联合，这种联合的基础是两人都不赞成采取那些可能导致与土耳其军事合作或结盟、导致与俄国冲突的措施。但随着阿德里安堡停战协定的签订，索尔兹伯里越来越对德比政策优柔寡断、软弱无力的一面感到不满，认为它既不能遏制俄国的野心也不能保障英国的利益，他指出：如果“政府由于笨拙无能而使欧洲陷入本世纪最大的一次战争，我们将因此而受到历史的谴责”。<sup>③</sup>迪斯累里在危机过程中致力于恢复和增强英帝国的国威和影响，但他的政策是游移不定的，从不惜以对俄战争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到建议攫取其领土作为英国的海军基地。而这后一种含有瓜分奥斯曼帝国意图的政策倾向，构成了索尔兹伯里在危机后期与迪斯累里合作的基础。历史学家彭森曾谈到，对于1878年索尔兹伯里和迪斯累里两人的政策，很难加以辨别。<sup>④</sup>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从这两人的文件性传记中还是有两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一是在对奥斯曼帝国

①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130页。

② K·伯恩编：《维多利亚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第410页。

③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11页。

④ L·M·彭森：《索尔兹伯里勋爵对外政策的原则与方法》，《剑桥历史杂志》，第5卷，第1期（1935），第95页。（L. M. Penson,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Lord Salisbury'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生存能力的估计上,索尔兹伯里比迪斯累里要悲观,二是在争取避免对俄战争与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上,索尔兹伯里比迪斯累里要乐观,虽然他此时赞成采用军事威胁或必要时以武力遏制俄国在近东获得优势。<sup>①</sup>

索尔兹伯里上任之初发表的4月1日通告,全面地阐述和捍卫了英国对于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反对立场,是危机史上的一个著名文件。它对圣斯蒂法诺条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指出这个条约把“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政治独立压迫到了完全屈从的地步”而代之以俄国在近东地区的独家控制,是与英国在海峡、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的利益不相容的,强调“这种后果与其说是由条约个别条款的用语引起的,不如说更多是由整个条约的作用所引起的”。欧洲会议的讨论如“限于某一国选择的条款,丝毫也无补于消除这个条约确立的事务安排给英国利益与欧洲持久和平带来的危险”。<sup>②</sup> 4月1日通告在欧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毁誉不一,可英国政策已表明有了一种积极、果断的性质。关于这个通告,舒瓦洛夫与索尔兹伯里在4月3日进行过一次谈话。舒瓦洛夫认为,英国倘使想否定整个圣斯蒂法诺条约,通告便是一个“战争文件”;

<sup>①</sup> 1907年1月英国外交部克劳备忘录的一条注释中提到,索尔兹伯里任期的官方“外交记录令人遗憾,非常不完整,所有重要事务的处理都是在‘私人’通信的名目下进行的”。(G·P·古奇和H·坦佩尔利编:《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伦敦,1922年版,第4卷,第321页,第774—776页附录2。G. P. Gooch and H. Temperley edit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4—1914.*)因而除了英国私家收藏的索尔兹伯里的文书以外,他女儿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的《索尔兹伯里传》特别有史料价值,其中辑有索尔兹伯里的一些重要的通信。

<sup>②</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698—2706页。

如只想修改条约中的部分条款,则可看作是一个“和平文件”。索尔兹伯里对“战争文件”的看法表示惊讶,说通告是一个“和平文件”,并含蓄地指出:“条约必须修改,但也许我们所要求的比你感兴趣的要多。”<sup>①</sup>

英国对于圣斯蒂法诺条约后的近东危局将采取怎样的政策?显然4月1日通告并没有被赋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任务,但从索尔兹伯里当时的一些重要通信中可以看出,他明确为英国规定了近东利益的目标之所在和保护这些利益的途径,而不再墨守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英土伙伴关系的传统。索尔兹伯里在给莱亚德的信件中指出:“土耳其(防止俄国优势)的堤坝现已毁坏,洪水正汹涌而出。必须在它的后面筑起另一道堤坝。我们很不喜欢增加领土的想法……但维持均衡的计划不能不以损害土耳其作为代价”,“然而我们在海上的力量越强,土耳其抵制进一步侵略的力量也就越强。”<sup>②</sup>索尔兹伯里所考虑的,不单是应如何正视俄国已经占有土耳其大片领土这个现实,并且怀疑土耳其在俄国军队撤出之后是否有能力重建有效的统治。在土耳其将来并无把握保持它的领土的情况下,英国为了把俄国从占领地区驱逐出去而进行一场战争的价值大可商榷。因此,虽然索尔兹伯里并没有放弃战争准备,但他的政策立足于通过“寻求补偿”来修筑所谓的“另一道堤坝”。在欧洲土耳其方面,斯拉夫保加利亚的边界退到巴尔干山脉,土耳其将保持“在已缩小的

<sup>①</sup> 两人分别向女王和哥尔查科夫报告了谈话的情况。《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611页。《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8卷(1949, 11),No. 445

<sup>②</sup>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64—265页。

版图范围内的独立”，奥国在巴尔干西部得到补偿，而俄国优势的削减则以允许其保留亚洲的部分收获作为交换。在亚洲土耳其方面，英国将攫取一处海军基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以此抵消俄国在亚洲取得的收获；作为土耳其失去领土的回报，英国对亚洲土耳其提供“实质性的保护”。<sup>①</sup> 新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给英国驻德大使拉塞尔的信中写道：“在欧洲划分保加利亚，在亚洲为英国取得补偿，是打开目前困难之锁的两把钥匙。”<sup>②</sup> 索尔兹伯里所设计的上述这一个互为依存的补偿圈，是4月1日通告发表以后英国与奥、俄、土三方谈判中遵循的主线。英国政策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与过去的决裂，按索尔兹伯里的看法，以往那种“过时的政策”是建立在土耳其的愚顽、英国的孤立以及不能在俄国扩张面前保证取得补偿等缺陷之上的，因而完全不能适应保护英国利益的需要。索尔兹伯里的女儿塞西尔夫人后来夸奖说，柏林会议前欧洲外交的主动权在她父亲担任外交大臣后落到了唐宁街手里。<sup>③</sup> 莫利在其《外交史研究》中也指出，这是索尔兹伯里一生成就最辉煌的时期之一。<sup>④</sup> 可索尔兹伯里本人当时并不“希望以1878年的行动作为评判他的外交政策”的依据，认为他“只是捡起了德比摔破的瓷器”，“不得不在三个月里完成三年中应做的事情”，他的行动“代表了那种为重新获得本来不该失去的地盘所需要的

①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13—214页，第229页。

②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44页。

③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31页。

④ J·H·莫利：《外交史研究》，伦敦，1930年版，第203页。（J·H·Morley, *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孤注一掷的斗争”。<sup>①</sup> 应该看到，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的失败和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出现，给索尔兹伯里上台实行他的政策提供了客观条件。

4月，欧洲仍面临着英俄战争与大国会议两种可能性。英国为了加强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武力抵制，从印度调遣7000名远征军进驻马耳他；俄国则有几百名海军官兵前往美国购取船只，以便在发生英俄战争时袭击英国的海上商船。而实际上，俄国财政与军事方面的情况已不允许它再经受一次大国战争。俄国虽然取得了对土战争的胜利，但长期的艰苦战争动摇了它的经济，财政告急。战争每天要耗费200万卢布，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不得不靠大量发行纸币填补亏空，总额达10亿卢布。到1878年，“俄国的财政已回到克里米亚战争后的状况”。<sup>②</sup> 图托尔本将军此时接替尼古拉大公担任前线总司令，他在从圣斯蒂法诺给沙皇的报告中指出军事形势的严重性：博斯普鲁斯海岸一带无险可据，俄国不可能阻挡英国舰队威胁黑海；土耳其重新调集了8万军队守卫君士坦丁堡，俄军要进攻已很困难，倘然进攻导致失败的话，俄国将前功尽弃；建议俄国采取防御战略，把军队撤回到阿德里安堡重点守护保

<sup>①</sup>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31—232页。

<sup>②</sup> M·S·安德森：《东方问题》，第202页。



加利亚,以备奥国边界出现事端。<sup>①</sup>这种财政与军事形势的黯淡前景,再加上国内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sup>②</sup>给圣斯蒂法诺条约后俄国的外交地位造成了致命的弱点。索尔兹伯里4月1日通告发表以后,俄国很难在圣斯蒂法诺条约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否则就不可能有欧洲会议。并且,俄国如不能与英国或奥国达成事前的修约安排的话,欧洲会议即使召开的话也不免破裂,而战争只会使俄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问题是怎样妥协、与谁妥协,俄国才能够既避免战争冲突,又尽量把让步保持在最低限度。从英奥两国利益关注的侧重点不同看,俄国并非一定没有可加以利用的条件。比如,俄国可以与英国达成某种妥协来保证圣斯蒂法诺条约关于新帕扎尔和门的内哥罗问题的内容,与奥国达成某种妥协来保证亚洲土耳其方面的主要收获。可是,俄国外交此时缺乏一个统筹全局的中心,哥尔查科夫不具有足够的胆识同时打破与英、奥关系的僵局。伊格纳切夫赴奥使命表明,俄国为了阻止奥国倒向英国,仍一味地实行与奥国谋求谅解的路线。4月中旬以后,俄国出现寻求与英国妥协的新趋向。促使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一是俄奥谈判的失败。伊格纳切夫4月初从维也纳回国

<sup>①</sup>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397—398页。此外俄国与罗马尼亚的关系这时因比萨拉比亚归属问题发生危机。罗马尼亚在俄国与其他大国发生战争冲突时,与其说是俄国的盟国,不如说很可能是它的对手。由于罗马尼亚的战略位置,这对俄国军事形势显然是个不祥之兆。俄罗关系状况参见R·V·伯克斯:《罗马尼亚与1875—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第2部分),《中欧事务杂志》,第2卷,第3期(1942.10),第310—320页。(R. V. Burks, Roumanian and the Balkan Crisis of 1875-1878.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sup>②</sup> 德国驻俄大使施魏尼茨在日记中写道:“对俄国来说,比巴统和安蒂瓦里是否割给俄国和门的内哥罗更重要的问题是,伴随着战争而来的将是国内的和平还是混乱。”参见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510页。

后，俄奥曾继续就奥国关于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要求交换意见。安德拉西利用俄国的困境玩两面派手法，一面与英国谈判，企图利用英国的支持遏制俄国，一面与俄国谈判，依然把接受奥国方案当作奥国在英俄战争冲突时保持中立的条件，以便索取最高的价钱。结果俄奥谈判始终不能取得突破，双方在新帕扎尔的归属和门的内哥罗获得海岸线的问题上卡壳。<sup>①</sup>二是德比的下台使英国减少了对战争准备的阻力，俄国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统一而又坚定的英国内阁。索尔兹伯里4月1日通告态度强硬，若俄国不作出妥协，英国势必断然拒绝参加欧洲会议。如果说奥国没有英国支持、单独进行对俄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那么英国现在的战争威胁就无法等闲视之了。因此，随着与奥国达成谅解的希望渐趋减弱，直接与俄国最有力的对手英国取得某种安排的想法开始在圣彼得堡占上风。沙皇虽然对英国是否会在亚洲土耳其问题上妥协抱有怀疑，但赞成朝与英国和解的方向努力。他在给图托尔本将军的信中写道：“与奥国谈判迄无积极成果，东方问题拟予近期内放在伦敦解决。如果这种设想变成现实，奥国就不可能作出单独进行战争的决定。”<sup>②</sup>舒瓦洛夫曾在与俾斯麦的谈话中解释谋求与英国谅解的理由，他说：“和大气中最有决心向我们宣战的国家进行谈判，明显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个国家的舰队已做好了准备。此外，对我们获得卡尔斯和巴统有争议的是英国而不是奥国，俄国公众舆论要求兼并这两地的情热与1870年

① D·麦肯齐：《塞尔维亚人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第275—277页。

② 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512页。

德国要求兼并阿尔萨斯一样强烈。”<sup>①</sup>显然，俄国试图通过与英国直接谈判来避免战争危险，并使奥国方面的外交砝码减轻份量。

俄国政策的新趋向同时也表现在外交人事的沉浮上面，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取代伊格纳切夫成了这场危机中升起的新的明星。伊格纳切夫不可能是圣斯蒂法诺条约的真正修订者，但又无法在奥国面前捍卫他的立场，说服安德拉西同意这个条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政策因使俄国面临进退维谷、欲摆不能的困境而走上了穷途末路。伊格纳切夫于5月回家乡基辅养病，其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职位为洛巴诺夫所接替，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对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sup>②</sup>打开与英国关系僵局的是舒瓦洛夫，他认为伊格纳切夫的大保加利亚“毫无意义”，哥尔查科夫的政策囿于说教而缺少变通，谋求与英国谅解是使俄国免除战争与屈辱的正确政策。舒瓦洛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总是喜欢困难的情况，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使自己承担起巨大的责任。当时我主动向索尔兹伯里勋爵提出谈判要求，这一要求改变了事情的面貌，决定了柏林会议的命运。”<sup>③</sup>舒瓦洛夫在伦敦的关键性岗位，熟悉英国的情况以及与俾斯麦的个人友谊，是他在解决危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利条件。

<sup>①</sup> S·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413页。

<sup>②</sup> 伊格纳切夫念念不忘他为沙皇帝国建立的两件“殊勋”。一是1860年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一是1878年的“圣斯蒂法诺条约”。据说在他死后的墓碑上镌刻了两个字“北京——圣斯蒂法诺”。

<sup>③</sup> 引自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364—365页。就个人仕途而言，舒瓦洛夫正在觊觎年迈的哥尔查科夫的首相职位。他希望以取得与英国谈判的成功，作为自己的晋升之阶。

英俄谈判进入实质性交换意见的轨道并非易事,一方面两国都试图摸清对方关于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具体想法,另一方面它们实现谅解的决心,谋求妥协的范围与程度,同时受到英奥、俄奥、英土等其他谈判的影响。4月9日哥尔查科夫对索尔兹伯里的公告作了答复,重申“每一个大国在欧洲会议上都有作出判断和行动的充分自由”,强调“英国政策应讲明希望什么”,以便双方“就局势达成明确的谅解”。<sup>①</sup>但索尔兹伯里此时关心的是缓解君士坦丁堡周围地区一触即发的军事形势,主张两国就双方武装力量同时撤离该地区达成协议,并要求俾斯麦出面调停。<sup>②</sup>俾斯麦立即同意,建议俄国军队退回阿德里安堡和英国舰队撤出马尔马拉海。俄国接受了德国调停的建议,可是并不想轻易放弃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地位。舒瓦洛夫的指导思想是力图把谈判引导到政治问题的讨论,认为在和平解决危机的前景尚无保证的情况下,撤退军队对俄国不利。<sup>③</sup>双方关于军事撤退的安排,纠缠在确定双方武装力量撤离后恢复原有位置需用多少时间等困难的技术性问题上,始终没有能够完全解决。俾斯麦不堪谈判的拖延,中途退出调停。舒瓦洛夫向索尔兹伯里提出谈判不应由于俾斯麦退出而停止,强调英俄“达成一项协定的最好机会是在相互了解彼此打算坚持和让步的主要之点”。<sup>④</sup>俄国政府曾指示把土耳其必须先撤离苏姆拉(Shumla)、瓦尔纳、巴统三地作为俄军退到原来停火线的附加条件,舒瓦洛夫劝告暂压,以免谈判

①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707页。

②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613—615页。

③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8卷(1950.4),Nos.466—467。

④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52页

破裂。<sup>①</sup>英俄紧张对立的气氛在交涉过程中逐渐有所改善。4月下旬,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斯向英国政府报告说,俄国大臣会议已同意由舒瓦洛夫在伦敦讨论圣斯蒂法诺条约的问题,以通过两国政府的直接谅解来保证欧洲会议的召开。<sup>②</sup>

4月底至5月初,舒瓦洛夫和索尔兹伯里在会谈中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就希望达成谅解的大致范围交换了意见。<sup>③</sup>英国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重点是以巴尔干山脉为界划分保加利亚,圣斯蒂法诺条约的边界线被坚持要求脱离爱琴海地区和马其顿一带,以保证土耳其在欧洲的独立继续存在。对于俄国在亚洲的兼并,英国表示忧虑但不排除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此外,在保加利亚的组织管理及俄军占领期限、比萨拉比亚的归属、土耳其的战争赔款等问题上,英国持有异议。索尔兹伯里还主张把海峡作为“开放水域”,无论战船或商船在任何时候都可通行无阻,但如果对此不能取得一致,英国保留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sup>④</sup>舒瓦洛夫在会谈中谨慎地暗示,俄国无意在获取巴统、卡尔斯、比萨拉比亚以及门的内哥罗获取安蒂

① 《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8卷(1950.4),Nos,490—491

②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483页。

③ 舒瓦洛夫曾在给哥尔查科夫的通信中记述了会谈时的一些情景:索尔兹伯里要求舒瓦洛夫先提出俄国不愿意让步的是哪些条款,舒瓦洛夫答:“亲爱的勋爵,你是在开玩笑。你知道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因为条约已经在你手里。现在轮到你来讲,你们不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同意讨论条约这一事实本身已证明,我们准备承认某些修改,但人们不能要求我们作失去理智的忏悔。”索尔兹伯里说,“这是一个例外,是你们激起了我的最后通牒!”舒瓦洛夫答:“不!正是你说的,如果两国不能取得初步安排,会议必然导致破裂,战争将会来临,因此该由你提出‘绝对必要的条件’(Sine qua non),而由我们来作出研究和答复。”于是,索尔兹伯里不再坚持,同意提出英方的修约意见。见《俄英关系文件》,《斯拉夫评论》,第28卷(1950.4),No. 495。

④ 参见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附录文件8,第635—640页。

瓦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俄国可能会同意划分保加利亚,条件是南部保加利亚地区要保证充分的行政自治的地位。<sup>①</sup>5月8日,舒瓦洛夫离开伦敦,返国磋商英方提出的修约要求。据舒瓦洛夫回忆,临行前他与索尔兹伯里对欧洲会议召开的基本原则初步统一了想法。舒瓦洛夫询问:倘然俾斯麦以东道主身份建议,会议将保证各参加国有讨论圣斯蒂法诺条约的自由,英国是否还坚持把条约所有条款都需经过批准作为会议召开的基础。索尔兹伯里表示,只要英国的修约要求得到满足,英国不会加以为难。<sup>②</sup>显然,英俄能否克服通向柏林会议道路上的障碍,系取决于舒瓦洛夫圣彼得堡之行的结果。

英国此时虽然没有放弃战争准备,<sup>③</sup>但既立足于补偿政策,也采取了争取与俄国就修约问题达成一项初步安排的方针。这种态度与英奥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的进展有关。自4月初开始,英奥之间通过两国大使一直在交涉巴尔干问题的解决办法。索尔兹伯里的目的是想拉奥国看守欧洲土耳其,使之成为抵制俄国势力的一个盟国,但安德拉西一面要求英国支持奥国关于波黑两省归属和门的内哥罗问题的立场,一面又不想轻易与英国签订单独的协定。安德拉西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圆滑、隐晦的态度以及他的两面派手法,使索尔兹伯里对奥国政策的可靠性抱有怀疑。形势是严重的:俄国正在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它按圣斯蒂法诺条约规定把军队撤出苏姆拉、瓦尔纳、巴统三地,而在英俄战争的情况下,德国势必保持

①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54—255页。

② 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369页。

③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64—1165页。

中立,奥国将趁火打劫谋取自己的利益,英国仍有孤立之虞。索尔兹伯里在谈到谋求英俄直接谅解的动机时说:“我极不希望与奥国弄僵,迫使它投入俄国怀抱。但尽管博伊斯特一再保证,我仍怀疑是否有任何文字协定能束缚安德拉西,我担心某个时候俄国将出高价收买他。他的计谋是利用英国作为吓唬俄国的鬼怪,倘使不能通过外交达到目的,他就试图把英国推向与俄国单独进行战争,并在俄国筋疲力尽时敲诈勒索。因此我感到,拘泥于只同奥国作交涉的狭隘范围是危险的事,而在所有同俄国达成一项和解的希望消失之前,宁可避免这种危险。”<sup>①</sup>显然,为了避免被动,索尔兹伯里不愿因英奥谈判的拖延而失去与俄国取得谅解的机会。在舒瓦洛夫逗留圣彼得堡期间,索尔兹伯里指示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斯明确转告舒瓦洛夫,如俄国同意英方关于划分保加利亚等修约要求,英国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问题上将不提出反对意见。<sup>②</sup>

舒瓦洛夫的圣彼得堡之行是成功的。俄国政府曾在5月2日向奥国提出了最后一次达成谅解的建议,但仍然没有结果;而舒瓦洛夫带回的英国准备在卡尔斯、巴统及门的内哥罗等问题上作妥协的信息是具有吸引力的。5月15日俄国大臣会议基本上同意了英方的修约要求,沙皇声称,“出现两个或三个保加利亚,在我看来都没有关系,只要组织设置的安排能够保证它们不再发生我们见到过的那类恐怖事件。”<sup>③</sup>为了争取俾斯麦对英俄谅解与召开欧洲会议的支持,舒瓦洛夫往返

①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58页。

② 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434页。

③ 引自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373页。

途中曾在德国停留。对德国来说,奥俄谅解比英俄谅解更有价值,但俾斯麦向舒瓦洛夫承认,英俄谅解对于避免战争是可取的,条件是这种谅解不能以损害奥国的利益为前提,否则不会有持久的和平。舒瓦洛夫和俾斯麦商定了德国邀请召开柏林会议的基本原则,即各参加国均有讨论圣斯蒂法诺全约的充分自由。<sup>①</sup>舒瓦洛夫取得德国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以来,俾斯麦视哥尔查科夫为改善德俄关系的障碍,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憾,因而希望舒瓦洛夫和平努力的成功能够使他取代哥尔查科夫的俄国首相职位。

5月22日舒瓦洛夫回到伦敦后,英俄在柏林会议前的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在英俄协定的问题上,分歧现在集中表现在土耳其苏丹是否被允许有权向南部保加利亚地区派驻军队,结果双方同意把它留待欧洲会议时解决。对于俄国获取卡尔斯、巴统等地,索尔兹伯里5月24日会谈中向舒瓦洛夫暗示:“兼并亚美尼亚本来应予坚决反对,它造成了对亚洲土耳其未来安宁的威胁,不可忽视,但女王陛下政府认为,采取不诉诸于武力的其他办法,能更有效地保护奥斯曼帝国免遭那种危险。”<sup>②</sup>英国显然表明了打算在英俄协定之外采取补偿措施的意向。在欧洲会议的问题上,英国要求在会议召开前双方各自将武装力量撤离君士坦丁堡周围地区,舒瓦洛夫仍强调军事问题应从属政治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不愿丧失强迫土耳其按照圣斯蒂法诺条约交出苏姆拉等地的威胁手段。索尔兹

<sup>①</sup> 《德国文件》,第2卷, No. 410

<sup>②</sup>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附录文件8,第645页。



伯里考虑到舒瓦洛夫可能因此而无法保持对圣彼得堡的影响,最后没有坚持把军事撤退作为欧洲会议召开的先决条件。<sup>①</sup>谈判期间,舒瓦洛夫担心英方态度生变和奥国趁机利用分歧率先与英国达成损害俄国的安排,曾数次电催沙皇政府授权签约,以免拖延。<sup>②</sup>5月30日和31日,舒瓦洛夫和索尔兹伯里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英俄协定。

英俄协定由三个文件组成,分别记录了双方达成妥协的内容、英国对若干问题的保留和俄国对亚洲土耳其问题的立场。双方同意保加利亚按巴尔干山脉划分成两部分,北保加利亚“政治自治”,南保加利亚“行政自治”,南部边界完全脱离爱琴海地区,东部边界划在瓦尔达尔河以东,尽可能不包括非保加利亚人居住地区。土耳其在南部保加利亚遭到侵略或发生叛乱时如何采取防卫措施的问题将由欧洲会议解决。关于伊庇鲁斯、色萨利及其他仍在土耳其统治下基督徒省份的组织办法,大国一律有参加意见的权利。俄国获得比萨拉比亚,但如果罗马尼亚拒绝,多布罗加则并不因此而归属俄国。土耳其战争赔款不得损害英国债权人的利益,俄国也不应将其转为一种变相的领土扩张。在亚洲方面,俄国同意把巴亚济特与阿拉西科特谷地(Alashkert,含有一条通往波斯的重要商路)还给土耳其,但保住了包括卡尔斯、巴统在内的大部分领土收获;俄方承诺不再继续在亚洲土耳其兼并领土,英方表示不以武力抵制俄国现已取得的地位。除上述形成协议的各点以外,

<sup>①</sup> 《德国文件》,第2卷, No. 427

<sup>②</sup> R·W·赛顿-沃森:《英国与东方问题》,第417页。迪斯累里在致女王信中写道,如果不在战场上给俄国一顿教训的话,很难取得一项持久的英俄安排。见《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622页。

英国声明对两保加利亚的组织管理，俄军占领保加利亚的期限和海峡体制等问题仍保留充分自由，但不反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其余条款。<sup>①</sup>

英俄协定的签订为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大保加利亚唱了挽歌。这是当时英、奥、俄三角双边谈判中首先获致成功的一项妥协性的安排。英国实现了对俄修约谈判的主要目标：划分保加利亚并使其南部边界完全脱离爱琴海地区。俄国依然保留了一些重要收获：收复比萨拉比亚和对卡尔斯、巴统等亚洲领土的兼并，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的问题没有触动。索尔兹伯里曾向驻奥大使埃利奥特分析了英俄签约时的形势：奥国不可能为比萨拉比亚和亚美尼亚问题作战，英国对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问题不感兴趣，因此英国面临的实际形势是，“我们是否准备仅仅为卡尔斯和巴统进行战争”，结论只能是以亚洲方面相对的妥协来换取俄国在欧洲大保加利亚问题上的让步。<sup>②</sup>当然，英俄协定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两国围绕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斗争的结束，协定内容中已可窥见这样的因素，但它确系两国避免战争的关键一步，并且使柏林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为了取得对俄国在亚洲土耳其方面领土收获的平衡，英国通过与土耳其缔结一个秘密条约来保障英国的东方利益。自4月起，索尔兹伯里和驻土大使莱亚德不断在通信中就酝酿一项新的对土政策交换意见。当舒瓦洛夫即将启程回国磋商英俄协定事宜时，索尔兹伯里5月2日

①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附录文件8，第646—649页。

②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60—261页。

通知莱亚德准备缔结英土条约。他指出,俄国对卡尔斯等地的兼并会促使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倒向他们而形成一股摧枯拉朽之势,土耳其的亚洲省份将成为俄国的属地,“英国在那里的出现是唯一能够阻止这种崩溃过程的补救方法。我们可能要及时地进入与土耳其政府缔结一项防御联盟。……这样的安排能防止俄国接二连三的蚕食,同时也能牵制西亚居民不向俄国寻求保护。”“但是,为了使这项谅解具有力量和价值,在地中海地区得到某处港口是绝对必要的”。<sup>①</sup> 莱亚德赞成他上司的看法,主张通过英国的支持把亚洲土耳其变成对抗俄国的堡垒,认为这种政策要比听任奥斯曼帝国崩溃而发生一场瓜分遗产的大角逐要强得多,途径是建立一项包括英国取得东地中海某处港口在内的“利益真正相一致的谅解”。<sup>②</sup>

5月24日,英俄协定谈判已接近告成,英国内阁决定立即要求土耳其同意签订让出塞浦路斯岛的条约。索尔兹伯里在给莱亚德的指示中解释获取塞浦路斯岛的必要性:“除非英国在靠近海岸的地区占有一个据点,否则就不可能对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施行必要的保护,及时集结所需要的军队和战争物资抗御侵略。”<sup>③</sup> 莱亚德被要求向土耳其政府转告,这样的安排有利于保护亚洲土耳其的安全,土耳其如果希望保持英

①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66—267页。

② 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428—429页。

③ L·彭森:《1878—1880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对外政策,奥斯曼帝国问题》,见A·科维尔和H·坦佩尔利编:《对于英法历史的研究》,剑桥,1937年版,第131页。(L. Pens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Lord Salisbury 1878—80. The Problem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Corille and H. Temperley edited, *Studies in Anglo-French History.*)

国的善意,应予立即接受,不然英国将没有力量继续为维护土耳其利益而努力,拒绝这项安排的直接后果是“君士坦丁堡的被占领和帝国遭到瓜分”。<sup>①</sup>莱亚德的对土谈判并没有多大困难。一方面土耳其指望英国成为它摆脱战争之祸的救星,帮助它收回圣斯蒂法诺条约失去的省份,另一方面当时土耳其刚好发生一起阴谋拥立前苏丹的未遂的政变,政治动乱加上军事、经济上的困难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不能不依靠英国的支持。土耳其政府于5月26日同意接受英方缔约要求,这就是说,英国在5月30日签订英俄协定时,实际上对保证在亚洲土耳其方面取得补偿已经胸有成竹了。6月4日,英土签订了塞浦路斯条约,内容是:如果俄国得到巴统、阿尔达罕、卡尔斯并企图进一步占领亚洲领土,英国方面答应以武力保卫土耳其;土耳其方面允诺在亚洲臣民中实行必要的改革,同意把塞浦路斯岛让给英国占领与管理,作为英国履行条约义务的前提条件。<sup>②</sup>

塞浦路斯条约是对与俄国协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补充。英俄协定着重于解决欧洲土耳其方面的问题,土耳其失去了多瑙河边界但保住了巴尔干山脉边界,对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基督徒居住地区的控制依然是土耳其主权存在的象征。用索尔兹伯里对奥国大使博伊斯特讲的话来说,为了使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能延长一段时间免遭俄国来自欧洲方面的威胁,我们“给土耳其留下了充分的权力以保证其政治独

<sup>①</sup> 《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集,第2卷,第623-624页。

<sup>②</sup>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722-2723页。7月1日,英土签订了一个附加条约,其中规定如俄国归还亚美尼亚地区,英国将撤出塞浦路斯岛(参见同一文件集第4卷,第2724-2725页)。

立与战略安全。”<sup>①</sup> 英俄协定虽然也涉及亚洲土耳其的处理，例如俄国同意让出巴亚济特和通往波斯的某些地区、表示不向条约规定以外的领土作新的征服等，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何抑制俄国势力在亚洲扩张和确保英国在整个东方影响的问题。签订英土塞浦路斯条约用意即在于此。英国的主要利益是在亚洲。莱亚德曾在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谈到：提供对亚洲土耳其的保护不仅有助于防止俄国势力南下，朝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流域和波斯湾方向渗透，而且可以增强从亚洲土耳其到英属印度之间的帝国联络系统的安全，通过建筑一条从伊斯凯特朗(Iskanderun)经巴格达到卡拉奇的战略铁路来保证英国在整个亚洲南半部的地位；同时，小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将会给英国商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sup>②</sup>至于获取塞浦路斯岛，英国外交部有一份文件《关于小亚、幼发拉底铁路之备忘录》，着重强调它对保证英国本土到印度的海上枢纽畅通，把俄国封锁在海峡内的战略作用，新增加塞浦路斯海军基地，“将提供一个世界上第一流的战略位置，使英印军队同英国军队能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力量合作行动，保卫那个英

<sup>①</sup> L·彭森：《1878—1880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对外政策。奥斯曼帝国问题》，见A·科维尔和H·坦佩尔利编：《对于英法历史的研究》，第127页。

<sup>②</sup> D·E·李：《大不列颠与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哈佛，1934年版，附录文件4，第192—193页。(D. E. Lee, *Great Britain and The Cyprus convention Policy of 1878*)关于英俄这个时期在中亚方面角逐的情况，可参见J·L·达西：《实用主义外交还是帝国主义侵蚀？1874—1879年英国对阿富汗的政策》，《国际史评论》，第4卷(1983. 11)，第475—495页。(J. L. Duthie, *Pragmatic Diplomacy Or Imperial Encroachment? British Policy towards Afghanistan, 1874-1879.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国对其进步与巩固感到关切的国家。”<sup>①</sup> 在这方面，塞浦路斯较之马耳他具有地理上接近亚洲土耳其和海峡的优越性，索尔兹伯里想把英国在塞浦路斯岛的良好管理作为亚洲土耳其实施“好人政府”统治、杜绝弊政的样板，增加英国影响的感召力，认为“这对维护英国的威信要比去进行半打战争更有效”。<sup>②</sup>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塞浦路斯条约与具体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内容无涉，但却构成了索尔兹伯里那个解决近东问题补偿圈的重要一环。索尔兹伯里政策的不落窠臼之处是，第一，把欧洲土耳其问题与亚洲土耳其问题区别开来处理。奥斯曼帝国版图辽阔，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在各地相殊甚远，因而不可能采取划一的模式来抵制俄国的侵略。在索尔兹伯里看来，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大部分基督徒的统治迟早要分崩离析，缓解的办法主要是给苏丹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提供一条相对“合理的”巴尔干山脉边界，以及让奥国在那里起某种“保护”作用，而支持亚洲土耳其则比支持欧洲土耳其重要，并且具有可能性，英国准备置亚洲土耳其于自己的直接“保护”下。索尔兹伯里的“保护”与克里米亚体制时代的“保护”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大国集体保护，而是根据大国的不同利益需要对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部分分别保护。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决不是在原地作螺旋状的重复。索尔兹伯里的政策更清晰

<sup>①</sup> D·E·李：《大不列颠与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附录文件7，第197—198页。

<sup>②</sup> C·J·洛：《勉为其难的帝国主义者》，伦敦，1967年版，第1卷，第32—33页。（C. J. Lowe,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

地反映了英国东方利益的重点之所在。第二,把瓜分土耳其领土与提供对土耳其的保护熔为一炉,纳入捍卫英国利益的轨道。“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雷池,索尔兹伯里在致莱亚德信中坦率地承认:“我愈是思考土耳其未来的命运,就愈是相信:由于土耳其边界的缩小与力量的衰竭,回复到1856年条约的位置只能导致整个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谈论‘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sup>①</sup>通过攫取塞浦路斯岛,英国在地中海东端安上了一块向亚洲发展自己势力的跳板,不过这种做法给裹上了一层保护土耳其免受俄国侵略的糖衣而已。迪斯累里对签订塞浦路斯条约推崇备至,致女王信中不无溢美之词,称“塞浦路斯是西亚的钥匙”,“假如这项政策付之实现,女王陛下就不必害怕帝皇们的联合,它将把英印帝国与大不列颠结成一体。”<sup>②</sup>没有塞浦路斯条约作铺垫,很难说迪斯累里是否会接受英俄协定的妥协性安排。然而,不管这项条约以后的实行情况如何,索尔兹伯里现已在寻求危机出路的过程中,把捍卫英国的利益变成了一项明确而具体的计划;相比之下,德比1877年5月6日照会关于英国利益范围的申述未免显得过于空泛、笼统了。

## 二、英奥协定和三皇联盟

在柏林会议前夕英、奥、俄围绕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所平

<sup>①</sup> 索尔兹伯里致莱亚德原件(1878.4.18),引自H·坦佩尔利:《迪斯累里与塞浦路斯》,《英国历史评论》,第46卷(1931.7),第274—279页。(H. Temperley, *Disraeli and Cypru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sup>②</sup> K·伯恩编:《维多利亚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第413—415页。

行进行的三组双边谈判中，英奥谈判比英俄谈判起步早但达成协议迟，俄奥谈判自始至终没有获致结果，而英俄谈判却异军突起，成了影响当时局势发展的主流性谈判，两国达成的妥协性安排结束了在召开欧洲会议问题上万马齐的沉闷僵持局面，洞开了通向柏林会议的道路。可是，如果说俄奥谈判因其在巴尔干利益的不可调和性而无法取得成功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英奥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自从1877年夏英奥谅解谈判以来，两国之间曾多次秘密商量共同反对俄国扩张野心的问题，按理说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出笼应该给两国迅速确立合作关系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新起点，但直到柏林会议召开的前一周，安德拉西才与英国驻奥大使埃利奥特签订了一份内容有限的“君子协定”。当然，英奥在最后一刻携手合作对于近东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大国阵线的组合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说明它们的联合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圣斯蒂法诺条约以后，奥国已明确决定了在近东追逐包括占领波黑地区在内的目标，这从安德拉西在伊格纳切夫使奥期间提出的修约方案可以看出。伊斯兰教法律禁止奥斯曼帝国割让未经战争失去的领土。既然奥国并不能通过战争攫取这些领土，最有利的办法就是使欧洲其他大国和土耳其承认奥国在俄国巴尔干势力得以扩大的情况下有权获得补偿，安德拉西认为，“一次成功的战争只意味着我们仅取得了一次胜利，而实行补偿原则则可证明俄国不能在东方恣意妄为。”<sup>①</sup>奥国外交此时的主要意图是设法保证奥国对巴尔干半岛西部

<sup>①</sup>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246页。



的利益要求具有“欧洲委托”的性质。这种想法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基于奥匈帝国内部政治上的需要。奥国皇帝以及军方是主张取得波黑两省的，可国内一部分社会舆论特别是匈牙利方面存在着阻力，他们不希望斯拉夫成分的增加破坏二元体制本来已极其微妙的平衡而使其导致三元体制。安德拉西在这次危机前期之所以采取尽量维持近东现状的政策不能说不与这个原因有联系。但是俄土战争以后的形势意味着一个无情的现实：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已摇摇欲坠，除非奥国取得波黑两省并通过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保障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地位，这些地区终究将落到斯拉夫国家手里，从而对奥匈帝国构成斯拉夫人汪洋大海般的包围的威胁。因此，为了保持奥国政策的国内的信誉和安抚匈牙利方面的不满，安德拉西极力想把他的占领（不是兼并）计划建立在欧洲意志的基础上，以示欧洲赞成奥国在近东起秩序保卫者的作用。贝克元帅指出奥匈帝国对外政策“在国内遇到的困难并不亚于在国外”，<sup>①</sup>当是一种痛砭奥国外交弱点的自白。

英国索尔兹伯里4月1日通告的发表实际上不确定地推迟了奥国最先倡议的欧洲国际会议，而英俄战争冲突的危险却具有触发的可能。正是上述奥国希望获得“欧洲委托”的意图促使安德拉西外交在英俄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方面，他力图利用英俄矛盾使两国分别作出对奥国利益的支持。如果俄国接受奥国关于在英俄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的条件，那么即使欧洲会议不能召开奥国也准备占领波黑等地区，但同时安德拉西又想使这种占领具有英国支持的形式，把它作为英

<sup>①</sup> G·H·普普：《动摇的友谊》，第528页。

奥共同迫使俄国军队撤出保加利亚地区的保证。另一方面,安德拉西又无意受英俄任何一方的束缚而被拖入它们可能发生的战争冲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英俄冲突将迫使双方都有求于奥国,奥国将由此而加强在近东事务最后安排中的地位。正如安德拉西对其内阁同僚指出的,“奥国既不必毫无代价地被迫跟着俄国走,也无需为了那些遥远的与奥国不怎么相干的利益而同英国站在一起。”<sup>①</sup>安德拉西这种企图左右逢源的曲折手法自有其隐晦的动机,但却失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形势发展的变化之快出乎他的意料,英俄首先在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问题上实现了妥协。无怪奥国外交部官员施韦格尔批评说“奥国总是太迟才获得一种新的思想。”<sup>②</sup>索尔兹伯里后来曾写道:“假如奥国在早些时候同意全面合作,(英国)本来就没有必要与俄国专门搞一项安排。但是我们不得不准备应付奥国把我们一脚踢开的情况……倘使那时我们能得到任何一个大国的帮助的话,事情也许会全然不同。”<sup>③</sup>英国是否有了同奥国的合作就不再与俄国达成某种妥协,这倒未必;可是英国起码在开始时确实希望先同奥国取得一项联合反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安排。

英奥谈判从4月3日索尔兹伯里授意英国驻奥大使埃利奥特与奥方谈判一项正式协定即已开始。英国的目标是使奥国就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保加利亚边界线采取共同立场。鉴

①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253页。

② W·N·梅特利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之后》,伦敦,1938年版,第16页。  
(W. N. Medlicott, *The Congress of Berlin and After,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ern, 1878-1880*)

③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255页。

于历次英奥谈判的教训以及奥国3月份在讨论欧洲会议权限问题上的态度,索尔兹伯里要求埃利奥特“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安德拉西表明政策”,“务以公开答应采取某种行动而不是以遮遮盖盖的含糊语言”。<sup>①</sup>索尔兹伯里向奥国驻英大使博伊斯特指出:“安德拉西现在实行的那种单独行动的方针,并非明智之策。当我们有共同利益时,不采取联合行动却去追求一种平行的行动,无疑是浪费力量。”<sup>②</sup>安德拉西的谈判重点是想取得英国支持奥国有关巴尔干西部诸问题的立场,极力强调奥国占领波黑等地区对于土耳其和欧洲利益具有双重可取性。他在4月21日致英国的备忘录中指出:奥斯曼帝国已证明没有能力使基督徒臣民文明化,合理的削减其领土决不是对这个帝国稳定与巩固的损害;圣斯蒂法诺条约规定波黑两省自治无异是养痍遗患,那里的社会矛盾和宗教分歧是触发一下轮东方问题的根源,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保加利亚将因此形成反土联合,其结果是土耳其失去所有欧洲领土,并使俄国为首的斯拉夫集团获得有损于欧洲利益的优势;因此由奥国这样非斯拉夫性质的保守主义大国占领波黑地区,不仅能够使土耳其避免将来的危险,而且可以阻止巴尔干斯拉夫化,对俄国影响的扩大起一种平衡作用。<sup>③</sup>安德拉西当时正在通过驻土大使齐西用这套同样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劝告土耳其政府让出两省,他要求英国政府能在此问题上对君士坦丁堡施加影响。关于保加利亚问题,安德拉西注重于

①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45—246页。

② R·米尔曼:《英国与东方问题》,第424页。

③ 《德国文件》,第2卷, No. 400

组织体制管理及俄军占领期限、人数等方面,虽然同样主张限制保加利亚的范围但无意提出英国所要求的按巴尔干山脉为界划分保加利亚的建议,理由是这与奥国已向俄国提出的修改方案有矛盾(奥国要求缩减圣斯蒂法诺条约保加利亚的范围没有英国要求的大,参见本书第五章)。安德拉西坚持,两国如果设想采取联合行动的话,限制保加利亚范围的问题必须与波黑两省占领、塞门两国边界安排等巴尔干西部诸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sup>①</sup> 索尔兹伯里对波黑问题并不感兴趣,但疑心安德拉西企图把它作为与俄国实现全面谅解的第一步,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毕竟是一项富有魅力的政策,“在那种情况下,安德拉西会把我们完全抛弃”,“而他的路线只要能克服匈牙利人的反对就很容易实现。”<sup>②</sup> 5月4日,索尔兹伯里在致安德拉西的答复中指出,虽然圣斯蒂法诺条约引起的各种问题对于英奥并非都一样重要,可是以巴尔干山脉一线限制保加利亚边界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假如两国对此达成一项正式协议,英国准备把巴尔干山脉这条线作为构成“宣战理由”的条件,并愿意声明不反对奥国关于波斯尼亚等问题的其他计划。<sup>③</sup> 其时,英国已在谋求直接与俄国就保加利亚边界问题取得谅解,索尔兹伯里有意识地尽量避免在巴尔干西部诸问题上受奥国的约束,以便为英俄谈判留下余地。

舒瓦洛夫5月彼得堡之行预示着英俄可能以某种妥协代

①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252—253页。

②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48页。

③ W·A·高尔德:《1878年英奥协定》,《英国历史评论》,第41卷(1926.1),第110页。(W. A. Gauld, *The Anglo-Austrian Agreement of 1878.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替战争冲突的前景，俄国5月2日对奥建议又断了奥国在新帕扎尔和门的内哥罗问题上索取俄国让步的希望。安德拉西成了惊弓之鸟。他一面求助俾斯麦向伦敦方面施加支持奥国利益的影响，指出英俄谅解将造成奥国孤立和危及德奥友谊，俾斯麦在英俄之间曾作过调停一事使奥国感到自己利益有已被牺牲之嫌。<sup>①</sup>一面则企图阻挠英俄达成谅解。他甚至向英方泄露俄国对奥谈判建议的内容，以资证明俄国阴谋离间英奥，认为两国只有精诚团结才能粉碎俄国的罪恶意图。<sup>②</sup>5月16日，安德拉西正式同意英国以巴尔干山脉一线限制保加利亚边界的方案，但继续要求英国支持奥国占领波斯尼亚及有关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边界问题的立场。索尔兹伯里并没有消除对奥国政策的怀疑，奥国允许自己与俄国进行秘密谈判，据何理由不准英国与俄国进行谈判呢？英国决心等待舒瓦洛夫将从圣彼得堡带回的答复。假如俄国在保加利亚范围问题上同意让步，英国毫无必要仅为了奥国限制门的内哥罗等要求而同俄国发生战争；假如俄国拒绝让步，则另当别论，门的内哥罗等巴尔干西部问题也许会包括在英奥的一项一揽子安排中。5月27日，当俄国协议基本就绪、英土条约已有保证时，索尔兹伯里致电埃利奥特按下述内容与奥国达成协议：(1)斯拉夫保加利亚南部边界线为巴尔干山脉，西部边界线抵摩拉瓦河(Morava)；(2)苏丹将在巴尔干山脉以南地区保持适当的政治、军事优势以防止侵略与骚乱，由欧洲会议确定那里的

<sup>①</sup> 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524页。

<sup>②</sup> 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415—416页。俄国对奥建议保加利亚的范围与英俄正在协议中的保加利亚范围不同。参见本节下文关于俄奥谈判的部分。

体制设置；(3)俄军占领多瑙河以南地区的期限为6个月，人数不得超过2万人，在罗马尼亚过境的期限为9个月；(4)英国应允在欧洲会议上支持奥国关于波斯尼亚的任何建议。<sup>①</sup>安德拉西仍想在英奥安排中插入有关塞、门边界的问题，但埃利奥特指出，英国对塞、门问题的态度与奥国对亚洲问题的态度并无二致，两国在这些问题上谁也帮不了谁。<sup>②</sup>安德拉西此时除了与英国联合外别无他途，于是在6月6日签署了英奥协定，其内容仅在索尔兹伯里电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俄国不得占有多布罗加地区”一条。

英奥协定的谈判过程反映了两国对于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具体目标并不完全相同，这一点从根本上说是由英奥在近东问题上地位和利益侧重点的差异所决定的。索尔兹伯里曾向德国驻英大使明斯特埋怨奥国的谈判态度，认为“奥国对于门的内哥罗问题固执己见是既不公平而又缺乏政治家风度的。……英国在保加利亚边界问题上忠实地支持奥国利益，可奥国在亚洲边界问题上却丝毫也没有表示对英国愿望的支持。”<sup>③</sup>其实，在当时激烈进行的英奥俄三角竞争中，英奥双方都不想轻易地为纯对方利益承担义务而减弱自己在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斗争中与俄国交涉的份量。这是笼罩英奥谈判的一层阴影。奥国无视圣斯蒂法诺条约的亚洲问题，英国则把奥国提出的塞、门边界问题从属于英俄在保加利亚问题上谈判的结果，而正是在以巴尔干山脉作为保加利亚边界的问题

① W·A·高尔德：《1878年英奥协定》，《英国历史评论》，第41卷，第111—112页。

② 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525页。

③ 《德国文件》，第2卷，No. 417

上,较多地体现了英国在欧洲方面对于保证土京城和海峡安全的关注。尽管如此,圣斯蒂法诺条约毕竟给英奥两国树立了一个共同之敌,它们签订协定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协定本身的内涵。英奥协定的条文并不新奇,英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得到的东西,实际上已在与俄国的协定中达成安排,奥国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得到的东西,俄国多次表示不持异议。但重要的是,英奥两国通过签订这个协定从平行抑制俄国的路线走上了联合抑制俄国的路线。从英国方面看,它使奥国成了反对圣斯蒂法诺条约大保加利亚的一个盟国,塞浦路斯条约是在亚洲方面对英俄协定的补充,英奥协定则是在欧洲方面对英俄协定的补充。从奥国方面看,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安德拉西最后终于停止了游移而同英国实行联合。尽管安德拉西对英奥协定内容的有限性不满意,可他希望以此作为扩大英国对奥支持范围的起点,安德拉西向埃利奥特评述道,该协定“具有君子协定的性质,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在柏林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与谅解。”<sup>①</sup>因此,英奥协定加强了两国在即将召开的柏林会议上的外交地位。

同英奥携手合作适成对照的是俄奥传统谅解的结束。俄奥谈判比较起来是最无生气的一组谈判,实际上伊格纳切夫维也纳使命的失败已预示两国关系陷入死胡同。俄国无意在塞门两国划分新帕扎尔和门的内哥罗取得海岸线的问题上作让步,因为奥国若获得这些地区将使其势力较为容易地直抵爱琴海沿岸,并进而把马其顿地区置于控制之下。4月底安德拉西再次要求俄国对奥国关于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方案重

<sup>①</sup> W·N·梅特利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之后》,第26页。

新进行考虑。俄国政府于5月2日致奥国一份备忘录,建议以下述内容为奥国继续保持中立的条件:(1)保加利亚的边界范围依然与圣斯蒂法诺条约的规定相同,但按君士坦丁堡会议的双省制计划将其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各部分均享有藩属自治地位,俄国军事占领将在最短时期内撤离;(2)奥国可以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3)奥国有权与塞尔维亚、西保加利亚缔结商务条约,允许修建米特罗维察至萨洛尼卡的铁路,并可经塞尔维亚与奥匈铁路干线连接;(4)新帕扎尔地区仍在塞、门两国之间分配,安蒂瓦里等海岸一带归门的内哥罗。<sup>①</sup>俄国政府的建议如泥牛入海,奥国不愿再作理会。既然俄国在塞、门边界问题上顽固不化,奥国又何必守株待兔?它宁可在保加利亚边界问题上同意英国意见以换取其在反对圣斯蒂法诺条约基础上的联合。安德拉西曾向德国驻奥大使斯托伯格表示了对俄方备忘录的强烈愤怒:建立东、西保加利亚“无非是以斯拉夫联盟代替大斯拉夫国家”,塞、门两国瓜分新帕扎尔地区等于是“封闭奥国通往东方的边界”,奥国本来就有权缔约商务条约,无需俄国恩赐。<sup>②</sup>就俄国方面来说,它即将在保加利亚边界和亚美尼亚领土兼并问题上与英国达成安排,英奥联合对俄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已没有必要在塞、门边界问题上向奥国作出让步承诺。舒瓦洛夫5月下旬途经德国时告诉俾斯麦,俄奥分歧的有关问题将在柏林会议上解决。<sup>③</sup>鉴于俄奥谈判无成,三皇联盟内这两个盟国的协调关系实质

① 《德国文件》,第2卷, No. 404, 附录3。

② 《德国文件》,第2卷, No. 405

③ 《德国文件》,第2卷, No. 410



上已处于瓦解状态。

随着圣斯蒂法诺条约之后奥俄裂痕的扩大,两国对德国的态度呈现出不同变化:奥国向德国进一步靠拢和俄国对德国增加了不满。奥国现在把与德国的亲密合作视作是有关帝国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博取俾斯麦的青睐与好感,奥国在两件事情上帮了德国的大忙。一是取消1866年布拉格条约第5条款。这是普鲁士王朝战争时代留下的存案,条款规定石勒苏益格北部地区的最终归属将在当地居民中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德国无意把该地区归还丹麦,拒不履行普奥之间的这项条约义务,久存废约之心。安德拉西在4月13日与斯托伯格签署了一项协定将此条款取消,并规定保守秘密一年,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公开,以避免奥国曲意行贿的嫌疑。二是拥立对德态度温和的利奥十三世为天主教教皇。1878年2月素与俾斯麦有仇隙的庇乌九世崩殁以后,教皇位子空缺待补。奥国红衣主教奉奥皇御旨在罗马积极活动,推选利奥十三世当上了新教皇。此举缓和了自俾斯麦开展“文化斗争”以来德国与天主教教廷之间势不两立的关系,奥国为德国打开通往梵蒂冈的道路助了一臂之力。安德拉西认为德国在近东事务最后安排中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向德国证明奥国的友谊将收到投桃报李之效,他对奥皇指出:“在目前这种大国组合的情势下,来自德国方面的酬报显然会价值倍增。”<sup>①</sup>同奥对德关系的情况相反,俄国虽然承认与德国继续保持外交合作的重要性,俄

<sup>①</sup>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231页。俾斯麦深知安德拉西的用意,他后来告诉毕洛夫:若奥国外交不遇上窘迫的需要,他也许不能获得取消布拉格条约第5款的收获。

德两国皇帝的友谊也未见消退,但由于德国拒绝向维也纳施加压力,圣彼得堡怨言丛生。4月中旬俄国驻德大使乌布里与俾斯麦的一段交涉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俄德关系的状况。俾斯麦在会见中指出,俄国允许奥国势力进入巴尔干并不一定是坏事,冒险对奥战争代价过于昂贵,倘若俄奥发生战争,“德国将保持中立,因为交战任何一方失败对德国都是灾难”。当乌布里要求德国支持圣斯蒂法诺条约时,俾斯麦竟然答复说:“我想你们所需要的是几面缴获的帕夏旗帜和在莫斯科举行一次礼炮轰鸣的庆祝胜利的盛典。”乌布里在给哥尔查科夫信中气愤地写道,“如果俾斯麦再重复这些话,我要毫不迟疑地提醒他回顾最近十年的当代史,其中包含着对这种反唇相讥的最好回答。”<sup>①</sup> 亲则疏,俄国对德不满的历史与心理背景是指责俾斯麦欠债未还:假如1866年和1870年俄国不抱友善态度,区区普鲁士能打败奥国和法国成为今日之德意志帝国吗?俾斯麦自诩当一名“诚实的掮客”在俄奥之间作公平交易,被认为远不足以报答俄国昔日的恩情。从上述奥俄传统谅解的结束和它们对德关系的不同变化不难看出,近东危机的发展已使奥俄与1873年三皇联盟建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圣斯蒂法诺条约之后的情况对俾斯麦来说并不乐观,相当程度上是福祸相依。英俄奥虽已深深陷入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角逐并造成了权力再分配的趋势,但三皇联盟的结构却极可能因近东矛盾激化和战争危险而导致破坏。对危机的结局,俾斯麦1877年6月在俄土战争期间写于基辛根的一份备忘录中曾提出若干对德国有利的设想,概括起来是:(1)俄奥利

<sup>①</sup> 引自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518—519页。

益重心转向东方,它们的分歧使两国难以形成反德联合;(2)俄国被迫在东方采取防卫立场,需要保持与德国的联盟;(3)对立的英俄在东方各有一个满意的现状,它们对维持得到的地位将与德国抱同样兴趣;(4)英法因埃及等问题保持分离。备忘录写道,“如果健康状况允许我继续工作的话,我可以来完成这幅萦绕脑际的画面的具体细节:不是描述领土怎样瓜分,而是要表述一种综合的政治局面,其中除法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从而消除这些大国由于彼此关系的性质而具有结成反对我们的联合的可能性。”<sup>①</sup>这表明,俾斯麦所理想的是危机能在英俄奥等有关大国的分赃性安排中结束,列强在近东保持一定的势力但又处于相互牵制的状态,它们就无力干涉欧洲方面的事务。大致上讲,英俄(或包括英法)在欧洲侧翼相持,奥俄在巴尔干相持,而在欧洲则保证一个由德国支配下的三皇联盟,因此从德国利益的角度考虑,较之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本身,围绕修约这场斗争对大国关系状态及其格局引起的影响更为重要。

英俄之间达成安排虽然可以缓和和大国战争的危险,但不能解决奥俄关系的问题。危机的发展已排除了奥俄变得过于亲密的可能性,然而问题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德国这两个盟国的关系的破裂。德国本质上不能够在奥俄之间作出抉择,否则不是有俄法携手联合使德国面临两线受敌的威胁,就是

<sup>①</sup> 《德国文件》,第2卷, No. 294

奥法可能结成复仇同盟、削弱德国的中欧霸权。<sup>①</sup>俾斯麦需要控制的奥俄关系的“度”是使他的两个盟国能达成某种安排而在巴尔干形成并立之势，同时又都需要德国的友谊。俄国势力既在近东取得重大进展，奥国势力应在不与俄国破裂的情况下立足于巴尔干西部。俾斯麦建议安德拉西迅即派兵占领波黑地区以造成既成事实，<sup>②</sup>鼓励英国就修约问题与奥国实现谅解以加强奥国的外交地位，<sup>③</sup>对俄国5月2日备忘录不愿向奥国要求让步表示不满<sup>④</sup>等等，原因均在于此。当时德俄两宰相之战已具雏型，俾斯麦把俄奥不能达成协议的责任归之于哥尔查科夫，想借助舒瓦洛夫来完成这个使命。<sup>⑤</sup>5月下旬英俄协议将成之际，俾斯麦接受了舒瓦洛夫关于召开欧洲会议和平解决危机的要求，并随即向巴黎条约签字国发出了定于6月13日举行柏林会议的正式邀请。<sup>⑥</sup>他指示斯托伯格告诉安德拉西，奥俄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争议的细节宜在会议上解决，“俄国的舒瓦洛夫将充分理解三皇联盟对于未来的价

① 据舒瓦洛夫回忆录记载，俾斯麦曾向他吐露：假如德国牺牲奥国利益，全面支持俄国主宰巴尔干的话，奥国将倒向法国，“德国会很快落到依赖俄国的地步”。此外，俾斯麦1877年3月对伊格纳切夫说过，德国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合法利益，但只要俄国仍保留大国战争发生时在法德之间作选择的自由，德国就不能以答应对俄国作进一步的支持来束缚自己。这些谈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在奥、俄之间的地位。（参见G·H·鲁普：《动摇的友谊》，第522页。）

② 《德国文件》，第2卷，No. 415

③ 《德国文件》，第2卷，No. 418

④ 《德国文件》，第2卷，No. 405

⑤ B·沃勒：《俾斯麦在十字路口》，伦敦，1974年版，第74—75页。（B. Waller, *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 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

⑥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721页。

值”。<sup>①</sup>英俄奥三角的双边谈判中，唯奥俄谈判没有结果，俾斯麦希望柏林会议能为德国两个盟国的妥协铺平道路，以弥补这个并非只是杞人忧天的遗憾的空白。由此可见，俾斯麦之愿意作为发起柏林会议的东道国，一方面固然是可以炫示德国的优越地位，但另一方面也是形格势禁，出于上述力图控制近东事务最后安排中大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需要。当然，德国没有卷入近东直接的利益纠纷这一点给俾斯麦充当“不偏不倚”的欧洲仲裁者的角色提供了可能。

欧洲由于面临战争冲突的危险而终于选择了妥协的道路。列强在寻求保证圣斯蒂法诺条约之后新的力量平衡的争夺过程中重又回复到欧洲协调的轨道：大国将在柏林的国际会议上而不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疆场上决定这场危机的结局。柏林会议前一系列双边谈判及交涉活动并没有解决危机引起的所有问题，关于南保加利亚的苏丹控制权、塞门两国的边界划分（包括新帕扎尔地区的归属）、海峡的管理体制等安排有待进一步的较量和澄清，即使是已达成协议的某些争端也可能在会议上重新提出，因此和平之途仍然充满荆棘。但是不难看出，柏林会议前大国穿梭外交的结果对于危机的整个结局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其一，俄国企图确立的对土耳其事务“独家经营、别无分店”的控制已是一枕黄粱，圣斯蒂法诺条约不可能代替巴黎条约和伦敦条约的安排成为近东的新现实。19世纪70年代下半叶东方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一个英、俄、奥三股大国势力鼎足而立的局面，尽管其中只有俄国经过了一次胜利的对土战争。其二，近东的大国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sup>①</sup> 《德国文件》，第2卷，No. 410

化,标志是奥俄传统谅解的结束和英奥联合的开始。英俄协定与英奥协定在性质上不一样,前者是妥协而后者是合作。英俄协定促成了通向柏林会议的形势但并不表明奥国的孤立,英奥协定后来居上意味的却是两国共同抑制俄国的联合。近东大国关系的变化使作为欧洲外交结构主体的三皇联盟的存在发生困难,问题在俾斯麦是否能够力挽狂澜、维持三皇联盟大厦之不被倾覆。

## 第七章 大结局：柏林会议

1878年夏季，欧洲列强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解决近东危机和圣斯蒂法诺条约引起的有关问题。这次柏林会议同1815年维也纳会议、1919年巴黎和会并列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国际关系史上三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它们是各自所处特定时代的外交风格与外交方式的典范，并且都成为国际政治发展中的历史性源流。柏林会议与上述两次国际会议相比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不是欧洲经历了一次像拿破仑战争或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国战争之后的产物，而恰恰是为了避免这类可怕的全面战争的发生而促成的结果。因此柏林会议面临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加严峻的紧迫性与复杂性。这就是说，会议要在保证不因某项争端破裂的情况下，对近东权力的再分配作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安排。有利害冲突的大国之间并无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区别，谁也无法使自己成为铁锤而把对手当做铁砧。倘然会议谈判失败，大国战争仍不免有被触发的危险。事实上欧洲几个月来始终在这种战争危险的边缘徘徊，要是没有会前那些纷繁交错的谈判与交涉，柏林会议是否能够召开也显然是个问号。会议开始时圣斯蒂法诺条约之被部分否定已确凿无疑，俄国虽以一次局部的对土战争推进了其近东势力，但由于英、奥中立大国的反对而不能不吐出一

部分果实。然而，不论是已达成协议的与尚未达成协议的问题都将由这次欧洲会议给以庄严的决定，所以柏林会议的谈判实质上是围绕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斗争的继续。6月13日至7月13日，列强在协调外交的帷幕下经过紧张、激烈的讨价还价，<sup>①</sup>产生了一个重新描绘近东地图的柏林条约，共计64条。<sup>②</sup>是为持续三年的近东危机的终结。

列强派出参加会议代表团的组成阵容反映了他们对于这场近东危机结局的重视程度。各国在会议上的态度不仅为维护自己大国地位、荣誉及有关利益的需要所决定，而且受到国内局势、社会舆论、与会代表个人气质和倾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东道国首席代表俾斯麦担任大会主席。他曾建议把会议主席职务让给法国外交部长沃丁顿，<sup>③</sup>既是想表明德法关系在法国温和共和派掌权后已转缓和，避免在欧洲面前捅开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的伤疤，同时也是对会议能否成功不抱幻想，无意承担会议破裂的责任。他担心会议谈判失败将使德国面临一大堆灾难性的选择，并给国内形势带来麻烦，<sup>④</sup>因而希

---

① 迪斯累里描述会议情况时说，“所有问题都是公开提出，私下解决。”（《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94页。）法国首席代表、外交部长沃丁顿在给国内政府报告中指出，“每一方都企图从它希望寻找的盟国或准备反对的国家那里获得某些想法”，称会议是“最壮观的名利场”（见P·R·马歇尔：《法国与柏林会议》，第116页。博士论文，196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P·R·Marchell, *France and the Congress of Berlin*）

② E·赫茨尔特编：《欧洲疆域沿革条约与地图集》，第4卷，第2764—2798页。

③ P·R·马歇尔：《法国与柏林会议》，第118页。

④ 俾斯麦正在大力开展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活动，他想利用最近发生的两起谋杀威廉皇帝的事件下令解散国会，打击反对派。俾斯麦对局势十分敏感，据目击者说这一时期在他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两支左轮手枪。



望能使有关大国迅速就近东事务达成一项全面妥协。俾斯麦的主要目的是在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问题上尽量克服对奥、俄两个盟国的要求的障碍,维护三皇联盟的存在。他打着“德国在巴尔干无直接利益”的旗号,策略上的精明灵活与作风上的雷厉风行兼而并施,在会议中起了实际的领导作用。要是没有这位叱咤风云的德国宰相的主持,会议的工作很难设想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土耳其代表事后抱怨,俾斯麦是以鞭子催赶谈判速度,会议的许多决定只是在他的压力下才被接受的。<sup>①</sup>

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同时赴欧陆参加会议是历史上罕见的举动。迪斯累里被称做会议上的“雄狮”,他不循国际会议使用法语的惯例而用英语发言,表现了一种不妥协的姿态。迪斯累里在欧洲心目中是大英帝国不可侮的象征,他的莅临增加了英国代表团的份量。由于处事果断、注意大的问题而不重细节,会议后期他与俾斯麦的个人关系处得相当不错。<sup>②</sup> 索尔兹伯里乐意由他的上司来率领代表团,以便有利于平息国内反俄主战舆论的风潮,<sup>③</sup>但他担当起了繁重的谈判任务。英国的意图主要是在英俄协定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因此在保加利亚、巴统等问题上形成了对俄国的严重挑战。俄国代表团是受人瞩目的另一个中心。首相哥尔查科夫抱疾前往柏林参加会议,他不甘心在这次外交盛会上消声匿迹,想以赢得体面的和平作为自己纵横欧洲政坛数十年外交生涯的璀璨总结。他的目

①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253页。

②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505—506页。

③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88页。

标是争取从会议获得比英俄协定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并将俄国不可避免要作出某些让步的责任推诿给他的第二代表舒瓦洛夫和德国的俾斯麦。他的虚荣与固执、好高骛远的言词使与会代表对这位久经沧桑的老资格政治家不敢恭维。<sup>①</sup> 从事实谈判工作的舒瓦洛夫因受掣肘，一度想要求沙皇更换首席代表的人选。<sup>②</sup> 舒瓦洛夫估计俄国将遇到困难，会议开幕那天对安德拉西说，“圣斯蒂法诺条约对我们是个不幸，对你们却不是。……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不得不在整个欧洲面前撕毁这个条约。伊格纳切夫制造的保加利亚荒谬透顶。哥尔查科夫以为欧洲不会暴跳如雷，那是自欺欺人。”<sup>③</sup> 然而他决意在不使会议破裂的情况下据理力争，为俄国保持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sup>④</sup> 舒瓦洛夫的妥协态度和谈判能力博得了会议共事者的称赞，连迪斯累里也说他是“以惊人的才干进行一场困难的正在输掉的战斗。不愧为第一流的议会辩论家，从不作笔

---

① 据说哥尔查科夫曾纠缠为柏林会议作画的画师安东·冯·维尔纳，要求把自己的肖像画得更青年漂亮一些。俾斯麦用俏皮话“警告”这位艺术家，说如果不使哥尔查科夫看上去多几分魅力，德俄友谊就要处于破裂的边缘了。哥尔查科夫也常使会议出现一些难堪的场面，有一次竟手指着迪斯累里说锡安山的子孙（犹太人）是害群之马，“人类的灾星”。参见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接近》，第 241—242 页。

② 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 403—404 页。

③ 安德拉西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电报（1878. 6. 13），奥国档案，引自 W·N·梅特里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之后》，第 40 页。

④ 据说，沙皇在柏林会议前夕召见舒瓦洛夫时要他以脑袋担保获得和平。舒瓦洛夫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俄陆军大臣米柳亭告诉他：“捍卫您认为可能捍卫的立场，让步总比放弃一切强，务不要破坏会议”。参见 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 392—393 页。

记,但回答总是颇得要领。”<sup>①</sup>与英国代表团的决心和俄国代表团的不睦相对照,奥国代表团的特点是谨慎。首席代表安德拉西衣着华贵,温文尔雅、不露锋芒的谈吐经常使会议的社交场合增色。由于国内原因及未能如英俄那样与土耳其达成一个协定,奥国的主要意图是设法让欧洲会议授权占领波黑地区。德国在这方面的支持不成问题,俾斯麦甚至嫌其行动磨蹭,责备没有在会前造成占领的既成事实,“我只听说人们不愿亲自打死和烘烤鸽子吃,可从未听说有人因为怕张口而拒绝吃到嘴的鸽子”。<sup>②</sup>可是英国的支持比来自盟国的帮助更具有欧洲委托的性质,安德拉西在会议上的地位明显因英奥协定的签订而大大改善。法、意两国的代表团分别由其外交部长沃丁顿和科蒂率领。他们保持了自危机发生以来一贯的中立态度,避免不必要地卷入近东大国纠纷成了维护自身欧洲地

---

<sup>①</sup> 泽特兰勋爵编,《迪斯累里致布雷德福与切斯特菲尔德两女士通信集》,伦敦,1929年版,第2卷,第175页。(Marguis of Zetland, *The Letters of Disraeli to Lady Bradford and Lady Chesterfield.*)

<sup>②</sup> W·L·兰格,《欧洲的同盟与阵线》,第152页。

位的安全之策,限于会议上起调解作用。<sup>①</sup>

除了上述六大国外,具有正式代表资格的还有土耳其。土耳其代表团的成员选择看来是个错误,首席代表卡拉提奥多里出身希腊血统,刚提升为帕夏,而第二代表穆罕默德·阿里是位改奉伊斯兰教的普鲁士人,这加剧了俾斯麦的轻蔑。据 R·H·戴维森利用土耳其档案揭示,卡拉提奥多里因不堪俾斯麦的粗暴无礼曾向苏丹要求辞去代表资格。<sup>②</sup>土耳其代表团的权威性值得怀疑,他们赴会前对英土塞浦路斯条约竟一无所知。按理说土耳其可以借助英、奥的力量有效地抵制圣斯

<sup>①</sup> 沃丁顿无意接受俾斯麦推荐的会议主席一职,认为法国的地位不允许来主持这样一个注定要推翻 1856 年巴黎条约大部分内容的会议,否则法国可能被迫背离中立的立场。7 月 8 日,英土塞浦路斯条约在报刊上被透露。而沃丁顿在 6 日获知这项秘密安排的内容时即十分惊慌,法国作为一个地中海大国,对此不能不感到关注。但他的不安很快为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口头保证所缓和,法国若在突尼斯发展自己的势力取得补偿,英国将不对此提出反对。俾斯麦也对沃丁顿表示,突尼斯属于法国扩张范围,占领这块地方有利于保障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和在地中海的影响,“如果法国认为取得突尼斯是合适的话,它将拥有德国的支持。”(参见让·加尼阿热著《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1861—1881 年》,中译本 1975 年版,第 461—47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由于会议规定只讨论圣斯蒂法诺条约引起的问题,突尼斯问题并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引起争端。关于法国在柏林会议期间的政策,可见上面引述的 P·A·马歇尔的博士论文,特别是第 7 章。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者对奥国向巴尔干半岛西南方面扩张抱敌视态度,但凯罗里内阁上台后对此问题较为谨慎,因为俾斯麦曾明确表示德国坚决反对意大利与奥国发生冲突,意大利可在阿尔巴尼亚或其他地方取得补偿。科蒂赴会的立场是,他将不反对奥国“暂时占领”波黑地区,只有在会议授权奥国“兼并”该地区时,他才提出寻求补偿的要求。见 C·洛和 F·马扎利:《意大利对外政策》,伦敦,1975 年版,第 20 页。(C. J. Lowe and F. Marzari, *Italian Foreign Policy*, 1870-1940)

<sup>②</sup> R·H·戴维森:《奥斯曼帝国与柏林会议》,见 R·梅尔维尔和 H·施罗德编:《1878 年柏林会议》,威斯巴登,1982 年版,第 215 页。(R. H. Daviso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gress of Berlin*, R. Melville and H. Schroeder edited, *Der Berliner Kongress Von 1878.*)

蒂法诺条约,但它的可悲困境是英奥落井下石,都提出了索取领土的要求。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这使奥斯曼帝国在这次会议上成了列强宰割的对象。巴尔干小国在会议期间也纷纷派代表前往柏林,可是除个别偶而得到向大会陈述情况的机会外,一概被拒之于会议门外。虽然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的独立得到了大会承认,但对于列强来说,它们不过是大国外交棋局中的小卒并被看作是大国均势的干扰者。土耳其和巴尔干小国在会议内外的待遇,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强权政治时代的本质,柏林会议是这种弱肉强食政治的历史见证。

圣斯蒂法诺条约的大保加利亚是根据俾斯麦建议在会上首先讨论的主要问题。<sup>①</sup> 俾斯麦之提议首先讨论保加利亚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想集中精力解决主要困难以保证会议成功,二是照顾奥国的处境,安德拉西无意在会议一开始就使占领波黑两省问题成为众目所睽,他需要在大国代表中做工作并争取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关于以巴尔干山脉作为南北保加利亚的分界线在英俄协定中原已取得妥协,可这条边界的具体走向及苏丹对南保加利亚的控制权问题并没有达成安排。讨论一开始便为英俄对立的不祥气氛所笼罩。迪斯累里在6月13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来了个下马威,谴责俄国

---

<sup>①</sup> 柏林会议于6月13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对程序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其中包括:(1)问题讨论的次序将按其重要程度进行;(2)在主要问题上,少数意见不受多数意见的束缚,但在次要问题上会议将接受多数意见;(3)某国如准备提出讨论新的问题,必须在前一次的全体会议预先说明,两次会议之间留出一段时间供有关代表商榷,交换意见。此外,大会秘书长由德国的拉多维兹担任,每一次全体会议的议定书由法国驻柏林使馆一秘莫伊组成的班子负责发布。见《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6, “柏林会议第1号议定书”。

军队依然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构成了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对会议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讨论是否适宜提出质疑。俾斯麦以不属会议权限为理由挡住了迪斯累里的横炮,把撤军问题排除出会议讨论的范围。<sup>①</sup> 6月14日《环球报》登出英俄协定内容,鉴于塞浦路斯条约当时还未公布,英国反俄舆论哗然,认为政府让步过多。英俄出席会议代表互相怪罪对方不守秘密。迪斯累里声称会议主要目的是“巩固和恢复土耳其的权力与稳定”,<sup>②</sup> 决心要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占上风。哥尔查科夫则甚至表示不准备承认英俄协定。<sup>③</sup> 6月17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英国提出两点建议:(1)藩属自治的保加利亚必须限于巴尔干山脉以北;(2)苏丹在巴尔干山脉以南地区必须拥有真正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舒瓦洛夫回答说,俄国参加会议是为了使圣斯蒂法诺条约与欧洲普遍利益相协调,不是为了“取消”它已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的结果。<sup>④</sup> 俾斯麦见状不妙,建议问题由英俄代表私下解决,此时奥国要求参加。这样,保加利亚问题的谈判实际上转到了由英俄奥三方进行。形势中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奥国对英国的支持,奥国参加三方谈判一则是基于自身对削减保加利亚范围(特别是西南

<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6, “柏林会议第1号议定书”。

<sup>②</sup>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207页。

<sup>③</sup> 据索尔兹伯里透露,哥尔查科夫和舒瓦洛夫曾拜访索尔兹伯里洽谈保加利亚问题,哥尔查科夫声言准备废除英俄协定,索尔兹伯里指出这意味着会议的完结,哥尔查科夫“愤怒地掉头就走出房间”。舒瓦洛夫立刻对惊愕的索尔兹伯里说“请等一下,我马上回来,这简直是胡来”。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卷,第284页。

<sup>④</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8, “柏林会议第2号议定书”。

部)有利益,二则是以此博得英国在会议讨论巴尔干西部问题时的帮助。舒瓦洛夫对形势的评论颇切中要害,说“如果他不得不锯掉一条腿的话,那么手术由一位外科医生还是由两位外科医生来做都无关紧要了”。<sup>①</sup>但他知道沙皇不愿意在组织保加利亚的体制上作让步,于是派人星夜赶回圣彼得堡面陈形势的严重性,请求指示。

三方谈判是一场不亚于战场上金戈铁马之争的真正较量。据迪斯累里致女王的信件和舒瓦洛夫回忆录透露,这是他们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sup>②</sup>争论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关于划线问题,俄方坚持北保加利亚包括索菲亚行政区,英方要求黑海沿岸的瓦尔纳脱离北保加利亚,奥方提出曼斯它河与斯特鲁马河上游同其他南部省份一样完全归土耳其。关于苏丹在南保加利亚的地位问题,英奥坚持土耳其可在边界驻军并具有进入该地区维持秩序的权利,俄国则要求对这种权利加以限制。舒瓦洛夫在逆境中保持了对问题的部分控制权,使英奥方面同意让俄国在有关方案中进行选择,同时又造成了一种危机感:俄国的答复将决定会议的成败。迪斯累里视英国两点建议是“最后条件”,放出空气说如果俄国不接受,英国对会议破裂在所不惜。据说迪斯累里在21日早晨已通知秘书安排回英国的专车。<sup>③</sup>俾斯麦深恐迪斯累里扬长而去,要求双方作及

① 见 W·N·梅特里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之后》,第52页。

② 《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96页。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401页。

③ A·N·卡明斯:《柏林条约秘史》,《十九世纪评论》,第86—88页(1905.7) (A. N. Cumming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treaty of Berlin. Nineteenth Century Review*)

时退却。舒瓦洛夫的策略是把讨价还价的余地保持到最后一刻,其实他此时已得到沙皇让步的指令。21日晚的三方会议是决定性的,俄方明确了自己的选择:同意巴尔干山脉为分界线和把马其顿地区的曼斯它河与斯特鲁马河流域交给土耳其,索菲亚行政区和瓦尔纳留在北保加利亚范围内,并对苏丹在南保加利亚边界拥有驻军权等有关问题作了有保留的原则性让步。22日,英俄奥三方妥协结果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宣布。虽然还有不少争议,但难关终于度过。<sup>①</sup>保加利亚问题的谈判直到6月26日第七次全体会议才告段落,划界的细节交专门委员会讨论。南保加利亚根据英奥意见更名为东鲁米利亚并继续受苏丹的政治和军事的管辖,以防止被保加利亚合并。<sup>②</sup>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组织管理分别由欧洲委员会负责。俄国对该两地区的占领人数仍保持不超过5万人,期限为9个月,俾斯麦在这个问题上帮俄国作了干预,没有赞成奥国要求进一步削减占领人数和期限的意见。<sup>③</sup>有关修改圣斯蒂法诺大保加利亚的条款在柏林条约中占了22条,该地区实

<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15,“柏林会议第4号议定书”。索尔兹伯里颇后悔事先同意给了俄国选择权,以致丢了索菲亚行政区。但总的说来,英国认为保加利亚这一仗取得了胜利,迪斯累里得意洋洋给女王写信说:“俄国人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让步了”。(《迪斯累里传》,第6卷,第1196页)。舒瓦洛夫回忆录中认为俄国能同时保全索菲亚行政区和瓦尔纳是原来未估计到的收获,曼斯它和斯特鲁马的马其顿地区即使划进东鲁米利亚(南保加利亚),仍属土耳其控制,因此不如增加北保加利亚的地盘有利。哥尔查科夫在几次关键性的会议上缺席,企图把俄国对保加利亚问题让步的责任归于舒瓦洛夫。(G·R·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402页,第408页。)

<sup>②</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10

<sup>③</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18,“柏林会议第5号议定书”。



际上被一分为三：藩属自治的保加利亚公国，行政自治的东鲁米利亚省以及依旧在土耳其直接统治之下的马其顿地区。

继克服保加利亚的主要障碍以后，会议便进入对巴尔干其他问题的讨论。<sup>①</sup> 这些问题的安排与奥国的利益辅车相依，安德拉西在前一段的表现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打下了有利的基础。对于波黑两省问题，安德拉西主张由英国而不是德国出面倡议奥国占领，主要有两种意义：一、使奥国政策尽量减少反土色彩，便于土耳其接受。他在致皇帝信中指出：“苏丹视德国为俄国的代理人”，由德国倡议“可能加剧土耳其的抵制态度，并引起我们社会舆论的不满”。<sup>②</sup> 二、表示一种三皇联盟瓦解的迹象，拉英国作帮助奥国抗衡俄国的主力。安德拉西在与索尔兹伯里谈话中提到英奥德三国的联合是“未来事件发展的预兆”，明显含有欲使英国代替原三皇联盟中俄国地位的想法。<sup>③</sup> 俄国其实对奥国占领波黑两省并不持异议，1877年春的布达佩斯秘密条约已予以允诺，圣斯蒂法诺条约无视该问题是伊格纳切夫政策影响的结果。现在这个案重新翻了过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奥国占领计划鸣锣开道的已非俄国而是英国和德国了。6月28日第八次全体会议讨论波黑问题的情景恰如一出预先排演好的戏剧。先是安德拉西发言，对波黑地区状况表示悲观，催促会议采取某种解决办法；接着索尔

<sup>①</sup> 由于保加利亚问题用了几乎半个月时间，俾斯麦不堪会议拖延，建议会议程序作了两个调整，一是成立了以法国第三代表德普雷为主席的条约起草委员会，着手工作，二是由各国派出一名代表组成边界委员会，协助处理边界问题。《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No. 18，“柏林会议第7号议定书”。

<sup>②</sup> W·N·梅特利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之后》，第72页。

<sup>③</sup> N·D·巴格丹萨里亚：《奥德的重新接近》，第246页。

兹伯里建议,土耳其聪明的政策是将给自己惹麻烦的两省地区交给奥国占领和管理;然后俾斯麦附议,说所有这一切对欧洲和平的干扰都发端于波黑地区,同意奥国承担起恢复秩序的任务。大国中唯有意大利作了一点形式上的抗议的表示。<sup>①</sup>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说土耳其在保加利亚问题上虽然被排除出三方谈判但由于英奥对俄国的抵制收复了圣斯蒂法诺条约失去的将近三分之二的地盘的话,那么它现在面对的是英奥合伙抢劫的局面。俾斯麦的态度则更像法庭上握着惊堂木的审判长,对于卡拉提奥多里提出尊重土耳其主权的请求,俾斯麦说,“欧洲已经讲话了。土耳其应该感谢会议为它收复了若干失去的省份,现在必须接受大国的所有决定而不是挑挑拣拣。大国达成的协议是不可改变的。”<sup>②</sup>英国在会议内外加强了压力,迪斯累里指责土耳其代表的态度把英国置于无法捍卫奥斯曼帝国的地位,莱亚德奉命在君士坦丁堡劝说苏丹予以认可。7月4日,卡拉提奥多里在第12次全体会议上声明接受会议意见,但表示土耳其将与维也纳内阁就有关事宜取得直接谅解。<sup>③</sup>

关于奥国占领新帕扎尔的要求并不如波黑问题那样容易

---

①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18及No. 20,“柏林会议第8号议定书”。会上意大利科蒂蒂奥说明一下占领意图,安德拉西望着他的眼睛说,“先生,对于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国拥护欧洲的观点,我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

② 见R·W·赛顿-沃森:《迪斯累里,格拉斯顿与东方问题》,第452页。

③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27,“柏林会议第12号议定书”。由于土耳其方面的坚持,柏林条约关于奥匈占领波黑问题的第25条在最后敲定时,插入了奥、土两国保留就具体细节达成谅解的内容。同时,为使土耳其代表在柏林条约上顺利签字,安德拉西7月13日声明,奥对两省占领具有暂时性质,主权仍属土耳其,有关事宜将由两国另订协议。

处理,障碍自然是在俄国方面。这块地区的重要性在前面第五章中已作论述,主要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分隔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的作用,并且是奥国势力利用铁路线向马其顿地区发展的重要通道。但由于英、德对奥国要求的支持以及害怕奥国对俄国换取比萨拉比亚地区的问题提出挑战,俄国在根本上不能够予以抵制。据俄国聂里多夫记载,他在会期曾被派回俄京请示,沙皇答复该问题取决于奥国对比萨拉比亚归属的态度。<sup>①</sup>安德拉西对政策作了有节制的调整,土耳其保持对新帕扎尔的统治,但奥国允许有在那里驻扎军队和保证商业通道安全的权利。经过若干交锋,舒瓦洛夫在7月1日第10次全体会议上接受奥国要求,可是说明门的内哥罗南部边界必须包括安蒂瓦里。<sup>②</sup>为了防止对方毁约,奥俄于7月13日会议结束那天签订了一个协议,俄国声明不反对奥国必要时驻军新帕扎尔,奥国答允支持柏林条约的执行。<sup>③</sup>关于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的边界与领土变动问题,一般是经大会提议后交边界委员会讨论。大国代表根据自己利益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塞尔维亚失去圣斯蒂法诺条约规定朝米特罗维察方向的地区,取得皮罗特和弗拉涅;门的内哥罗获安蒂瓦里但该港口水域不准战船通行,而另两个海岸地区斯皮齐(Spizza)归了奥匈帝国的达尔马提亚,杜里齐尼奥还给土耳其;罗马尼亚把比萨拉比亚西南部交给俄国,以多布罗加地区

<sup>①</sup> 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408—409页。

<sup>②</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26, “柏林会议第10号议定书”。

<sup>③</sup> B·H·萨姆纳:《俄国与巴尔干》,第532页。

及多瑙河三角洲一带为补偿。<sup>①</sup> 这里必须附带指出,俄国取得比萨拉比亚是以剥夺曾作为盟国在普列夫那战场上付出过血的代价的罗马尼亚实现的,沙皇所谓“帮助巴尔干民族的解放”只是一种神话。

会议最后讨论的是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亚洲条款的问题。根据英俄协定,俄国同意归还巴亚济特和阿拉西科特谷地,英国应允不以武力反对俄国取得巴统在内的小亚领土;按照英土谅解,只要俄国一旦取得这些地区,塞浦路斯条约中规定的内容即告成立。问题看来似乎在会前已经摆平,可是在会议上却卷起了一场新的风暴。英俄这两个亚洲地区的老对手除为澄清俄国所获领土的界限而进行了一些混乱的令人目眩的争吵外,主要分歧集中在巴统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于海峡规则的解释上。巴统的重要性对俄国来说一目了然,不仅可以沟通里海至黑海的交通网,使之成为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是建设黑海军事力量和在美索不达米亚方面实行扩张的基地。未雨绸缪,随着报刊上披露出英俄协定内容,割让巴统已成英国反俄舆论愤怒攻击的目标。为了挽回俄国黑海地位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索尔兹伯里力图利用英俄协定中对海峡问题的保留,改变海峡对战船关闭的规则,并以此作为迫使俄国放弃巴统或同意巴统地位非军事化的威胁手

---

<sup>①</sup> 见柏林条约第36条、第29条、第45—46条。会议还讨论了希腊边界,多瑙河航行管理等问题。关于希腊向色萨利、伊庇鲁斯方向扩大领土的问题,会议规定由土耳其和希腊另订协议解决,如果双方不能就修改疆界达成安排,六大国保留进行调停的权利(“柏林会议第13号议定书”及柏林条约第24条);关于多瑙河航行管理问题,主要强调该河航行自由的“全欧洲利益”性质及保证欧洲多瑙河委员会的权力与作用(柏林条约第52—57条)。

段。6月15日他曾向君士坦丁堡要求缔结一项安排，“不反对英舰在任何时候通过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保护土耳其的利益。<sup>①</sup>这实际上是取消1871年伦敦国际条约规定的战船通过海峡必须由苏丹召请的程序，土耳其未敢贸然应诺。6月29日英国国内政府根据索尔兹伯里的建议决定，英国将保留必要时战船通过海峡的权利，而且指出：如果俄国“为攫取巴统采取好战行为的话，英国内阁认为会议的大目标——和平遭到了破坏并出现了5月30日备忘录（按：指英俄协定）所始料不及的情况，这使英国避免干涉变得极其困难。”<sup>②</sup>英俄双方从6月下旬起已在会议期间的谈判中短兵相接。索尔兹伯里威胁“巴统地位若不能达成某种中立性的安排”，英国有权使其舰队通过海峡驶进黑海；舒瓦洛夫认为英国在巴统问题上的挑衅是对英俄协定的不忠诚，俄国的答复需经沙皇批准。<sup>③</sup>由于问题并不是俄奥之争，俾斯麦站在俄国方面进行调停。他向迪斯累里指出，德国在会前被双方正式告知英俄协定内容，正是基于此才同意召集会议，不能因为拒绝履行协定义务而导致会议的失败。<sup>④</sup>

俄国对巴统问题事实上不能不作必要的退却。其原因一

① 格温多伦·塞西尔夫人：《索尔兹伯里传》，第291页注。

② D·E·李：《英国与1878年塞浦路斯条约的政策》，第96页。

③ B·杰拉维奇：《英国与俄国获取巴统》，见《斯拉夫与欧洲评论》，（1970.3），第51—52页。（B. Jelavich,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Acquisition of Batum, 1878-1886. Slavonic and European Review*）索尔兹伯里谈到，英俄协定关于巴统问题的处理损害了他在国内的地位，如果问题不能解决，他将因此辞职。哥尔查科夫针锋相对地表示，愿让出俄国大臣的职位以待索尔兹伯里来补选。这一插曲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谈判双方相持不下的情景。

④ R·G·威克斯：《俄国国务活动家彼得·安德里维奇·舒瓦洛夫》，第412页。

是巴统此时仍由土耳其占领,倘使土耳其倚仗英国的态度拒绝交出巴统,俄国的占领可能冒新的战争冲突的风险。二是俄国在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存在着致命弱点,当时它还没有一支可以阻挡英国舰队进入黑海的海上力量。俄国在对土战争后期设想的关于海峡在对外国战船关闭的情况下允许俄国战船单艘通过的局部开放的办法纯粹脱离现实(参见本书第四章),而海峡全面开放的好处明显在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方面。俄国现在回到了一个现实:如果英国以战舰通过两海峡相逼的话,俄国只有徒唤奈何。从吉尔斯致热米尼(随同哥尔查科夫出席会议)的信件可以看出,沙皇当局并不想使巴统问题危及整个和局。<sup>①</sup>沙皇对来自会议请示的答复是:巴统防卫困难,会上可以表明不设防的意向,但条约中不要含有限制俄国领土权益的字句。<sup>②</sup>7月6日,俄国代表团为了保证获得巴统,已在接到沙皇答复前一天的第14次会议上声明巴统将成为自由港。索尔兹伯里对此不持异议,并表示英国愿维持海峡现状。<sup>③</sup>两天之后,塞浦路斯条约即被《每日新闻》报抢在政府预定的日期前公诸于世。巴统地位的性质于7月9日才最后酌定,索尔兹伯里曾要求把“主要是”商业性自由港的提法换成“专门的”商业性自由港的提法,可是哥尔查科夫成功地坚持

<sup>①</sup> 查尔斯·杰拉维奇和巴巴拉·杰拉维奇编:《俄国在东方》,第147—148页。

<sup>②</sup> B·杰维拉奇:《英国与俄国获取巴统》,《斯拉夫与欧洲评论》(1970.3),第53页。

<sup>③</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32,“柏林会议第14号议定书”。俾斯麦曾小心地在议定书上记录下会议一致同意维持海峡地区现状的内容。

说这两个词是同样意思。<sup>①</sup>一字之差反映了双方的意图,英国要束缚俄国使巴统非军事化,俄国想为巴统地位保留回旋余地。可是在巴统争端和其他亚洲领土的划界纠纷基本解决后,索尔兹伯里重又回到英国内阁已予同意的关于海峡问题的立场。他在7月11日第18次全体会议上宣布,英国政府对保持海峡关闭承诺的义务仅限于对土耳其苏丹而言,这是“与现有条约尊重土耳其独立意志的精神相吻合的”。舒瓦洛夫翌日在第19次全体会议上声明:俄国政府认为“海峡关闭的规则是一个欧洲原则。……无论从现有条约的文字或精神看,它对所有大国互相之间都具有约束力而不只是指对土耳其苏丹方面。”<sup>②</sup> 鉴于会议的全部工作已陆续完成,海峡问题没有展开讨论,英俄两国对海峡规则截然不同的解释被记录在会议的议定书中,柏林条约第63条则根据7月9日大会的意见郑重声明,凡巴黎条约和伦敦条约未经本约“废除或修改的条款仍旧有效”。<sup>③</sup> 海峡体制之争虽然在柏林会议上是有有关巴统问题争端风暴中的一个插曲,但在英俄近东对峙史上引起了久远的回响,俄国从此把索尔兹伯里声明看作是英国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海峡体制的证明,是一种对俄国利益的真正威胁。然而就巴统问题来说,俄国毕竟在有节制的让步中保住了这个黑海港口,并于8年之后宣布重新设防。

<sup>①</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36,“柏林会议第16号议定书”。

<sup>②</sup> 《英国蓝皮书》,第83卷(1878),“土耳其”第39集, No. 40,“柏林会议第18、第19号议定书”。

<sup>③</sup> 会议还决定了土耳其在亚美尼亚实行改革、设立外国财政专家委员会以维护土耳其债权人持有者的利益,土耳其赔款留给俄、土双方善后处理等问题。

柏林会议于1878年7月13日下午举行条约签字仪式后正式闭幕,柏林条约所做出的安排被认作近东地区的新现实。从会议谈判的主要问题及其结果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柏林会议提供解决危机的最后方案实质上是在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基础上的一种权力再分配,英奥俄三股大国势力在近东各占据一定的位置,相对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欧洲土耳其呈现出一个奥俄瓜分势力范围的状况,亚洲土耳其保持了一个英俄对峙的局面,而英国另外攫取塞浦路斯岛和重新解释海峡规则表明了它在东方问题上持有最强音所依靠的力量之所在——海上优势。正如斯托杰诺维克所指出的,“尽管那里已经发生变化,但列强在东方的力量平衡仍然不得不加以维持。基督徒的命运,以及土耳其的命运,所有这一切其他利益都从属于该原则”。<sup>①</sup>关于柏林会议的是与非历来褒贬不一,但从谋求圣斯蒂法诺条约之后的近东力量平衡的角度衡量,会议完成的工作代表了强权政治时代的一次外交成就;大国战争冲突的危险被避免了。当然,如果没有有关大国在会前调整政策过程中所经历的那种剧烈的阵痛,柏林会议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作为这场近东危机的大结局是不可思议的。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近东危机的大结局并不意味着东方问题的消失。黑格尔曾从东方不死之鸟的传说中领悟出关于人类社会绵延不断,王朝兴衰更替不已的现象,这里面包含着被马克思称之为“合理内核”的某些思想。近代外交史上的东方问题也是如此。只要形成东方问题主客体环境仍然存在,一次危机的结局只是新一轮矛盾与斗争的开始,因而柏林会议在东方问题发展

<sup>①</sup> M·D·斯托杰诺维克:《列强与巴尔干》,第273页。



史上起的也只能是一种分水岭的作用。保加利亚问题紧接着在 80 年代中期重新出现危机,而像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所引起的矛盾竟在 1914 年因萨拉热窝事件而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柏林会议时期近东大国关系变化对欧洲外交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皇联盟的名存实亡。在近东英奥俄这个大三角中,奥国的跳槽已使奥俄协调被英奥联合所代替。柏林会议为英奥抑制俄国的联合提供了一个实践的舞台。正是由于英奥在以巴尔干山脉为界削减保加利亚范围和在奥国占领波黑两省并对新帕扎尔拥有驻军权的问题上的互相支持,两国实现了各自修改圣斯蒂法诺条约的主要目标。俾斯麦虽然促使柏林会议获致了成功,但他未能改变三皇联盟内部分离的局面。随着奥俄协调的破裂,德俄关系因柏林会议蒙上了不祥的恶化的阴影。俄国在柏林会议上的挫折与其说在实际收获方面,不如更应该说在大国地位的荣誉、威信方面。其实柏林条约所提供的东西并不少于俄国外交当局在对土战争初期提出的“小和平”方案的内容,俄国依然取得了比萨拉比亚西南部和包括巴统、卡尔斯等在内的亚洲领土。问题是前面已经有一个闪烁着大俄罗斯泛斯拉夫神圣光环的圣斯蒂法诺条约作对照,柏林会议的裁决使它在欧洲面前扮演了可悲的角色,虽然悲剧真正的主角是它的侵略对象土耳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哥尔查科夫一心想从会议上赢得的“体面的和平”无可挽救地被迪斯累里捧回伦敦去了。英国用几只军舰在海峡作了游戈,奥国未动一兵一卒,却都在会议上达到了目的。俄国随后把愤怒泻到德国“诚实的捐客”的身上,要是俾斯麦真心实意全面支持俄国的话,俄国何至于功败垂成?沙皇指责柏

林会议是“一次欧洲在俾斯麦领导下的反俄大联合”。俄国即使从安抚国内的不满计,也需要有这么一条推卸外交挫折责任的渠道。俾斯麦在会议上的态度已见前述,尽管他与哥尔查科夫的关系已江河日下,但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确实帮俄国作了干预(特别如在索菲亚行政区、巴统等问题上),甚至称自己是“俄国的第四代表”。俾斯麦把维持三皇联盟的宝押在舒瓦洛夫身上,希望通过对舒瓦洛夫的支持能使俄国意识到应该保持与德国的友谊。然而俾斯麦的支持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德国不愿损害奥国的根本利益和与英国导致决裂。这一点是由他力图促使会议成功,继续保证德国的欧洲仲裁者的地位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加剧了对俾斯麦的不满,而舒瓦洛夫则终于昙花一现,成了德俄关系恶化和俄国在会上不可避免的那些让步的牺牲品。对于俾斯麦来说,柏林会议所确立的英奥俄三大国将在近东长期相持的态势给德国主宰欧陆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无一大国能够单独问津柏林占据的欧洲政治中心的地位,但另一方面,近东危机的结果证明,德国以在奥俄之间采取保留态度的政策来维持三皇联盟的存在已经捉襟见肘。柏林会议第二年,俾斯麦改弦更辙,建立了德奥同盟,是为欧洲结盟体系的开始。当1881年三皇同盟出现时,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松散的政治结构,而是受条约义务束缚,成了俾斯麦精心罗织的同盟体系的一部分了。假如说柏林会议是对三皇联盟的一种否定,那么1881年的三皇同盟则是对这种否定的再次否定,但其性质已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了。

汤因比在论到1875—1878年近东危机时曾说,索麦洛可夫使命是一个“历史本来该转弯而没有转弯的关头”。诚然,历

史学家还可以从危机编年史上找到不少同样令人扼腕兴叹的例子,然而历史却不解人意地在各种客观力量和因素的聚合作用下径自走完每一段必经的路程。近东危机历尽曲折在柏林会议得到了归宿,但欧洲三皇联盟结构却因无法包容近东的大国关系变化而维持不下去了。在柏林会议的整个成因过程中,本书第一章《对历史背景的一种整体性分析》提出的关于近东的大国关系结构和欧洲均势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随处可见。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并继续对东方问题和欧洲政治的演变起作用。

## 本书参考书目

### 1. 外交文件及档案性资料、议会文书、条约与地图集、回忆录、传记、书信

*Accounts and Papers, State Papers*, Vol. 84 (1876), Vol. 90 (1877), Vol. 91 (1877), Vol. 81 (1878), Vol. 83 (1878)

Blake, R., *Disraeli* (London, 1966)

Bourne, K. and Watt, D. C.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 B Series*, Gillard, D. (ed.),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1859-1914*, Vol. 3, 4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84)

Bourne, K., *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Document Collection* (Oxford, 1970)

Buckle, G. E., (ed.),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Series 2, Vol. 2 (London, 1926)

Cecil, Lady G., *Life of Robert of Marquis of Salisbury*, Vol. 2 (London, 1921)

*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Vol. 2 (Berlin, 1922)

Gooch, G. P. and Temperley, H.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4-1914*, Vol. 4 (London, 1929)
- Hertslet, E. (ed.), *The map of Europe by Treaty*, Vols. 2, 4 (London, 1875, 1891)
-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eds), *Russis in the East, 1876-1880* (Netherlands, 1959)
- Lee, D. E., Unprinted Documents, The Anglo-Austrian Understanding of 1877, *Slavonic Review*, Vol. 10 (1931. 7, 1931. 12)
- Medlicott, W. N. and Coveney, D. K. (eds), *Bismack and Europe, Document Collection* (London, 1971)
- Meyendorff, A., Unprinted Documents, *Slavonic Review*, Vol. 8 (1929. 6)
- Monypenny, W. F. and Buckle, G.,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Vol. 6 (London, 1929)
- Onou, A., Memoirs of Count N. Ignatyev, *Slavonic Review*, Vol. 10(1931. 12, 1932. 4), Vol. 11(1932. 7)
- Pribram, A. F., *The Secret Treaties of Austria-Hungary, 1879-1914* (Cambridge, 1921)
- Ramm, A. (ed.), *Th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of Mr. Gladstone and Lord Granville, 1868-1876* (London, 1953)
- Seton-Watson, R. W. (ed.), *Russo-Brit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Eastern Crisis, Slavonic Review*, Vols. 3-6(1924, 1925, 1926, 1927), Vol. 25 (1947. 4), Vol. 26 (1948. 4), Vol. 28 (1949. 11, 1950. 4)
- Taffs, D. W., Unprinted Documents, *Slavonic Review*, Vol. 8

(1930.3)

Temperley, H. and Penson, L. (eds), *The Foundation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London, 1938)

Zetland, Marquis of, *The Letters of Disraeli to Lady Chesterfield and Lady Bradford* (London, 1929)

## 2. 专著、博士论文及其他论文

Aderson, M. H., *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 (London, 1966)

Albrecht-Carrie, R., *The Concert of Europe* (New York, 1968)

Bagdasarian, N. D., *The Austro-German Reapproachment, 1870-1879* (New Jersey, 1976)

Bridge, F. R., *From Sadowa to Sarajevo* (London, 1972)

Burks, R. V., Romanian and the Balkan Crisis of 1875-1878,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Vol. 2 (1942. 10)

Clayton, G. D., *Britain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Misolonghi to Gallipoli* (London, 1971)

Craig, G. A.,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1978)

Craig, G. A. and George, A. L., *Force and Statecraft* (Oxford, 1983)

Cummings, A. W.,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Treaty of Berlin, *Nineteenth Century Review* (1905. 7)

Damianov, S.,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astern Crisis of 1875-1876, *Southeastern Europe*, Vol. 4, No. 2 (1977)

- Davison, R. H. ,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Princeton, 1963)
- , The Attitudes Concerning Christian-Muslim Equal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9, No. 4 (1954)
- ,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ongress of Berlin, in Melville, R. and Schroeder, H. (ed.), *Der Berliner Kongress Von 1878* (Wiesbaden, 1982)
- Dehio, L. , *The Precarious Balance, English Edition* (London, 1963)
- Duthie, J. L. , Pragmatic Diplomacy or Imperial Encroachment? British Policy Towards Afghanistan, 1874-1879,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4 (1983. 11)
- Gauld, W. A. , The Dreikaiserbündnis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1871-1876,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40 (1925)
- , The Anglo-Austrian Agreement of 1878,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 (1926)
- , The Making of Bulgaria, *History*, Vol. 10 (1925)
- Gladstone, W. E. , *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s in the East* (London, 1876)
- Harris, D.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Balkan Crisis of 1875-1878, *The First Year* (Stanford, 1938)
- Hegedus, R. , The Foreign policy of Count Julius Andrassy, *Hungarian Quarterly*, Vol. 3, No. 4 (1937)
- Jelavich, B. , *The Ottoman Empire,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Straits Question, 1870-1887* (Bloomington, 1973)

- , Great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Acquisition of Batum, 1878-1886, *Slavonic and European Review* (1970. 3)
- , Negotiating the Treaty of San Stefano, *Southeastern Europe* (1979. 2)
- Jelavich, C., *Tsarvich Russia and Balkan Nationalism* (Berkeley, 1963)
- Kennan, G. F.,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 1875-1890* (New Jersey, 1979)
- Kennedy, P. M.,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1982)
- Langer, W. L.,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1871-1890* (New York, 1931)
- Lee, D. E., *Great Britain and the Cyprus Convention Policy of 1878* (Cambridge, 1934)
- , A Memorandum Concerning Cyprus, 187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 (1931. 6)
- , The Proposed Mediterranean Leagu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 (1931. 3)
- Lowe, C. J.,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 (London, 1967)
- Lowe, C. J. and Marzari, F., *Italian Foreign Policy, 1870-1940* (London, 1975)
- Mackenzie, D., *The Serbs and Russian Pan-Slavism, 1875-1878* (Ithaca, 1969)
- Marshall, P. R., *France and the Congress of Berli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9)



- Medlicott, W. N. , *The Congress of Berlin and After,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ern Settlement, 1878-1880* (London, 1938)
- , The Near Eastern Crisis of 1875-1878 Reconsidere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7 (1971. 1)
- , Bismarck and Beaconsfield, in Sarkissian, A. O. (ed. ), *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61)
- Millman, R. , *British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1875-1878* (Oxford, 1979)
- Morley, J. H. , *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London, 1930)
- Mosse, W. E. , *The European Powers and German Question, 1848-1871* (Cambridge, 1958)
-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1871* (London, 1963)
- Penson, L. M. ,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Lord Salisbury'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 No. 1 (1935)
- , The Foreign Policy of Lord Salisbury, 1878-1880. The Problem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Coville, A. and Temperley, H. (eds. ), *Studies in Anglo-French History* (Cambridge, 1937)
- Rich, N. , *Friedrich von Holste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Bismarck and William I* (Cambridge, 1965)
- Robert, H. , The Congress of Berlin, in Hazen (ed. ), *Three Peace Congress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 1917)
- Rupp, G. H. , *A Wavering Friendship, Russia and Austria, 1876-187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 Richstadt Agreemen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0(1925. 4)
- Seton-Watson, R. W. , *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Norton Library, New York, 1972)
- Schroeder, P. W. , Lost Intermediaries: Impact of 1870 on the European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6, No. 1(1984. 2)
- Shannon, R. T. , *Gladstone and the Bulgarian Agitation, 1876* (London, 1963)
- Show, S. J. , and Show, E. K. ,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2 (New York, 1979)
- Stojanovic, M. D. ,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lkans, 1875-1878* (London, 1939)
- Summer, B. H. , *Russia and the Balkans, 1870-1880* (Oxford, 1937)
- Taylor, A. J. P. ,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Oxford, 1954)
- Temperley, H. , The Bulgarian and Other Atrocities, 1875-1878,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17, (1931)
- , Disraeli and Cypru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46(1931. 7)
- Waller, B. , *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 The Reorientation of*

---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 1878-1880* (London, 1974)

Weeks, R. G. , *Peter Andreevich Shuvalov, Russian Statesma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7)

# 人名译名对照表

(以汉语拼音为序)

## (A)

|            |                    |
|------------|--------------------|
| 阿伯丁        | Aberdeen, G. H. G. |
| 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 | Abdul Hamid II     |
| 阿卜杜勒·拉齐兹   | Abdul Aziz         |
| 阿克萨可夫      | Aksakov, Ivan      |
| 阿尼姆        | Arnim, Harry       |
| 埃德姆        | Edhem Pasha        |
| 埃利奥特       | Elliot, Henry      |
| 安德拉西       | Andrassy, Julius   |
| 奥尔布雷克特     | Albrecht, Archduke |
| 奥斯曼        | Osman Pasha        |
| 奥诺         | Onou, Alexander    |

## (B)

|         |                     |
|---------|---------------------|
| 巴林      | Baring, Walter      |
| 巴林顿     | Barrington          |
| 贝克      | Beck, Friedrich     |
| 彼得·舒瓦洛夫 | Shuvalov, Peter     |
| 毕洛夫     | Bulow, Bernhard von |

|      |                                   |
|------|-----------------------------------|
| 俾斯麦  | Bismarck-Schonhausen,<br>Otto von |
| 庇乌九世 | Pius IX                           |
| 博伊斯特 | Beust, Friedrich von              |
| 布坎南  | Buchanan, Andrew                  |

## (C)

|       |                                                 |
|-------|-------------------------------------------------|
| 查尔斯亲王 | Charles of Hohenzollern-<br>Sigmaringen, Prince |
|-------|-------------------------------------------------|

## (D)

|      |                    |
|------|--------------------|
| 德卡兹  | Decazes, Duc de.   |
| 德里奥  | Dehio, L.          |
| 德普雷  | Desprez, H.        |
| 迪斯累里 | Disraeli, Benjamin |
| 杜普伊  | Dupuis, Hutton     |

## (F)

|           |                |
|-----------|----------------|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 Franz Joseph I |
|-----------|----------------|

## (G)

|       |                          |
|-------|--------------------------|
| 冈多一别朗 | Gontaut-Biron            |
| 哥尔查科夫 | Gorchakov, Alexander M.  |
| 格拉斯顿  |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
| 古尔科   | Gurko, I. V.             |

## (H)

|      |                   |
|------|-------------------|
| 赫尔岑  | Herzen, Alexander |
| 霍恩比  | Hornby, G.        |
| 霍恩劳埃 | Hohenlohe, C.     |
| 霍姆   | Home              |

## (J)

|     |                           |
|-----|---------------------------|
| 基伯特 | Kiepert                   |
| 吉尔斯 | Giers, Nicholas Karlovich |

## (K)

|        |                    |
|--------|--------------------|
| 卡拉提奥多里 | Caratheodory Pasha |
| 卡利斯    | Calice, Baron      |
| 卡罗尔依   | Karolyi, Alois     |
| 卡纳文    | Carnarvon          |
| 卡特索夫   | Kartsev, M.        |
| 克劳     | Crowe, E.          |
| 科蒂     | Corti, Luigi       |
| 科里     | Corry, Montagu     |
| 凯恩斯    | Cairns             |
| 凯罗里    | Cairoli, Benedetto |

## (L)

|      |                     |
|------|---------------------|
| 拉多维兹 | Radowitz, J. M. von |
| 拉塞尔  | Russell, Odo        |

|       |                                  |
|-------|----------------------------------|
| 莱夫洛   | Le Flo                           |
| 莱亚德   | Layard, Henry Austen             |
| 朗格瑙   | Langenau, Ferdinand Baron<br>von |
| 利奥十三世 | Leo XIII                         |
| 洛巴诺夫  | Lobanov, Prince                  |
| 洛夫特斯  | Loftus, Lord Augustes            |

## (M)

|         |                    |
|---------|--------------------|
| 麦哈茂德    | Mahmud Nedlm Pasha |
| 麦哈姆德二世  | Mahmud II          |
| 迈克尔大公   | Michael, Prince    |
| 蒙特格拉斯   | Montgelas          |
| 米哈德     | Midhat Pasha       |
| 米兰大公    | Milan, Prince      |
| 米柳亭     | Miliutin, D. A.    |
| 明斯特     | Munster, Georg von |
| 明希      | Munch, Baron       |
| 莫伊      | Mouy, Comte de     |
| 穆罕默德·阿里 | Mehemed Ali Pasha  |
| 穆拉德五世   | Murad V            |

## (N)

|       |                      |
|-------|----------------------|
| 尼古拉亲王 | Nicholas, Prince     |
| 尼古拉大公 | Nicholas, Grand Duke |
| 聂里多夫  | Nelidov, A. I.       |

诺维可夫 Novikoff, Eugene Petrovich

## (P)

帕默斯顿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 (Q)

齐西 Zichy, F.  
切尔尼雅也夫 Chernyaev, M. G.

## (R)

热米尼 Jomini, A. H.

## (S)

斯蒂尔曼 Stillman, W. J.  
斯凯勒 Schuyler, Eugene  
斯托伯格 Stolberg  
施韦格尔 Schwegel, Baron J. von  
施魏尼茨 Schweinitz, Lothar von  
苏里曼 Suleiman Pasha  
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Robert  
索麦洛可夫 Sumarakov-Elston

## (T)

坦特登 Temterden  
梯也尔 Thiers, Adolphe



图托尔本

Todleben

## (W)

韦尔德

Werder, Anton von

韦尔斯利

Wellesley, F.

维尔纳

Werner, Anton von

威廉一世

William I

沃丁顿

Waddington, M.

沃瑟

Werther, Baron.

乌布里

Oubril, M.

## (Y)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伊格纳切夫

Ignatyev, N. P.

埃文斯

Evans, A.